

俄 国 在 中 亚

〔美〕迈可尔·刘金著

陈尧光译

内部读物



目 录

原编者序.....	1
第一章 历史背景	3
最初三百年(自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3
征服	10
沙皇的政策	14
第二章 革命	19
两场革命	19
争取生存的斗争	23
革命的扩展	29
第三章 巴斯马奇起义	35
第四章 经济生活	47
集体化和畜牧业	47
棉花和粮食	50
工业.....	52
战争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兹别克斯坦)	54
第五章 移民	58
第六章 文化政策	68
语言政策	68
文化上的同化政策	73
教育.....	81
第七章 干部、优秀分子和人民	85
三十年代的清洗	85
四十年代时党的优秀分子	88
本地的穆斯林党员	97

第八章 党的机构（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	104
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	104
四十年代	104
五十年代	105
政府和党	107
四十年代	109
五十年代	114
州的党机构	115
结构	115
活动	121
地方上的党机构——区和市一级	127
第九章 结论	136
英文书目	145
索引	147



原 編 者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改变，使人们空前地渴望了解苏维埃领土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报刊、广播和电视都在报道当前情况的进展，可是由于它们本来的性质，它们对于为了解苏维埃政策和俄国事件的特殊转变所必需的因素，只能提供随时发生的一些片断。而且，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国家，虽然它的文化成就最早不过溯自十八世纪末或十九世纪初，即使苏维埃人还不像目前这样恶名昭彰，然而值得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事却还是浩如烟海。

一个民族的生命和政策是由无数因素形成的，我们对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知道得愈多，我们就愈有可能正确地了解它。直至不久前，西方还非常疏于研究俄国，这一事实值得引起注意，也值得引以为憾。在一个世代以前，对俄国感兴趣的还只限于比较少的一部分专家和知识分子；今天，对于有关沙皇俄国和苏联的权威性的、翔实可靠的、脉络分明的材料，已有了愈来愈多的、广泛的需求。用英文出版的论述俄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就有很多种，其中也有些水平很高，可是俄国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情况尚未有人探索或需要重新探讨。

考立尔图书公司出版俄国文明丛书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一需要。这套丛书既涉及革命前时期，也涉及苏维埃时期。每一册都是由各该领域的专家特为考立尔图书公司撰写的。这些研究力求保持高度学术水平而又不过分流于技术性，同时又力求用引人入胜、行文流畅的风格来提供材料。丛书中的每一册都自成格局，都能单独加以利用。珍贵的原本著作在

过去或许只有少数人能读到,现在,凡是想备有一册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书售价低廉,因而广大公众都能购阅——而并不有损其科学标准和文学价值。

俄罗斯中亚这块苏维埃统治下的辽阔的次大陆,近年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同莫斯科在那块边远地区上进行工业化和开发处女地的宏大计划联系起来看时更是如此。这些计划的成败,看来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对苏联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莫斯科的亚洲政策和西方政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关组成俄罗斯中亚的几个共和国的英文出版物很少,而且,论述最近发展情况的难得见到。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迈可尔·刘金博士是纽约市立学院的副教授,在1962至1963年时曾是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曾在中亚住过四年,是美国现下对该地区具有充分第一手知识的少数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只对帝俄的向东扩张描画了一个简要的轮廓,而主要是论述苏维埃时期,并对苏联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地区推行的治理方面、社会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各项政策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根据苏维埃的宪法安排,俄国的亚洲领土都是主权共和国,因为殖民主义当然是和苏维埃的政治理论不相容的。然而,实际上,各中亚共和国是被克里姆林有效地控制着的。刘金博士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莫斯科政府用来把彻底的集中控制同关于地方主权的谎话结合起来的方法,作出了透彻的叙述。作者所说的情况已越出了本书标题所指出的范围,事实上已成了对共产党人对不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的彻底揭露。

迈可尔·T. 弗洛林斯基

《俄国文明丛书》总编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5

最初三百年(自十六世纪五十年代至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俄国远在十六世纪时就试图同中亚细亚建立联系。第一个渗入中亚的莫斯科代理人(1558—1559年),是一个替沙皇伊凡雷帝效劳的英国商人简根生。1565年以后,有几个俄国的使团前往布哈拉、基发和萨马尔罕。俄国人同时还开始渗入幅员广大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苦难年代”的中绝期(1605—1613年)并没有延缓俄国东进西伯利亚的行动,不过,它也没有促成在中亚开辟新的外交通路。莫斯科重新建立了秩序以后,布哈拉埃米儿的特使于1619年来同新王朝的第一代沙皇米海依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谋求接触。为了酬答,1621年,有一名俄国特使伊凡·霍赫洛夫被派往布哈拉。

可是,由于共同利益极其有限,来往交通又极不便,很难保持稳定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中亚之间的接触仍然是时继时续的。直到俄国人东进西伯利亚已到达太平洋后,才派了俄国里海阿斯特拉罕海港的一名“波雅尔”(贵族称号)伊凡·费多托夫前往基发(1669年),派了帕祖辛兄弟前往布哈拉和巴尔克。1675年,另一个俄国密使华西里·达乌多夫偕同所率人员又到达了布哈拉。

彼得大帝在位时,俄国进行了表面上的西方化,这时候俄国 16 对中亚的兴趣增加了。这位新沙皇的天生的好奇心,渴望同一切可能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的热情,甚至他对西欧国家的剥削

殖民地的知识，都影响了他的行动。因而他想对中亚采取一项更主动的政策。这时候，在1695年，一个名叫塞门·马林基的俄国商人经由中亚抵达了印度，可是却在归途中死去了，这就无法同他的航海的前辈阿法那西·尼基丁的功绩（1469年）媲美了。1700年这一年有两件新事情进一步增加了彼得对中亚的兴趣。第一件是谣传中亚阿姆河一带有金矿；第二件是，基发的尼亚兹王当时由于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封建战争，弄得那个地区经常民不聊生，竟来要求俄国给予保护。彼得那时正同瑞典和土耳其打仗，只得暂缓采取行动。可是，到了1715年，他就派遣一个远征队到哈萨克草原的额尔齐斯河和埃尔克特（Erket）河一带，1716年，在额尔齐斯河上筑起几个碉堡。最后在1717年，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亲王率领一支远征队来到了基发。这支拥有六千六百五十五人的队伍是花了二十五万卢布装备起来的。给他们的指示是勘查阿姆河的水流，可能的话，使河流改道流回里海，并在阿姆河岸筑一座碉堡。除此之外，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还奉命劝说基发和布哈拉的统治者接纳对俄国友好的哈萨克牧民为他们的随身警卫。那些基发人对俄国人并不热情，他们也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以前提出的要求，因为那是在内部斗争期间提出的。他们假托要为俄国人安排适当的住处，把

17 俄国人三三两两地拆开，然后全杀掉了。逃脱的俄国人也大都死在沙漠里了，只有少数几个人找到道路回到了家。唯一剩下的只有筑在里海东岸的一座小碉堡，两年后这座小碉堡也放弃了。对基发的这场冒险所带来的悲惨结局并没有使沙皇沮丧；1718年，他的特使弗洛里奥·别涅维尼来到了布哈拉，并在那里一直驻留到1725年沙皇逝世。

随着彼得大帝的逝世和俄国军队随后撤离里海的波斯海岸

(1732年),俄国暂时终止了渗入中亚的一切尝试,集中力量扩张它在哈萨克草原的势力;哈萨克草原是一片位于西伯利亚和中亚本土之间的地广人稀的土地。哈萨克的“小儒兹”^①原在乌拉尔河东南的草原上游牧,1731年名义上接受了俄国对它的主权,这是俄国在那里扩张势力的第一步。1735年,又在乌拉尔河上筑了一连串的碉堡,正对着那些新归顺但仍难驾驭的“属臣”。俄罗斯哥萨克人在这些碉堡以及过去在额尔齐斯河上筑的碉堡附近定居下来。后来,住在乌拉尔河碉堡附近的就被称作乌拉尔和奥伦堡哥萨克人,住在额尔齐斯河碉堡附近的就被称作西伯利亚哥萨克人。被用碉堡同俄国领土隔离起来的“小儒兹”哈萨克人,仍然保持着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中儒兹”在1740年接受了俄国对它的主权,可是随后在1742年又转而接受了中国对它的主权。然而,不久以后,两方面又都拒绝了。自此以后,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保持了七十五年的稳定。那时俄国并不想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和沙漠上进行任何新的冒险。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和碉堡附近的哥萨克人都同碉堡里的那些维持和平和秩序的俄国驻军保持着勉强的休战状态。哥萨克人的不友好态度,比俄国人名义上对它的主权更使哈萨克人烦恼。甚至“中儒兹”也终于逐渐接受了俄国人对它的主权。俄国人对哈萨克事务的第一次重大干涉发生在世纪更迭的时期,当时保罗一世批准了“小儒兹”的西部领土分离出去成立一个新集团,称作“布凯耶夫帐”。同时,保罗一世按照他同拿破仑新缔结的同盟,

^① “儒兹”或译“朱孜”,亦有译“奥尔达”或“斡耳朵”的,按沙皇的行政名称则为“帐”,是当时哈萨克在政治上瓦解时出现的、几个游牧部落组成的联盟。有“大儒兹”、“中儒兹”和“小儒兹”之分,分别位于哈萨克草原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北部。
——译者

组织了一支两万二千五百人的顿河哥萨克远征队，由华西里·奥尔洛夫将军率领，远征奥伦堡，其任务是经由布哈拉和基发开往印度。远征队的主要目标虽然是攻打在印度的英国人，但奥尔洛夫却得到指示，要占领布哈拉并解救在基发的俄国奴隶。这并不是什么新计划，早在1791年，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就曾玩弄过类似的计划。保罗一世被刺后，俄国外交政策有了改变，远征也就停下了。

在俄国战胜了拿破仑，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在欧洲之后，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政策又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改变俄国同“小儒兹”和“中儒兹”的关系。他的不够开明的顾问斯别让斯基在1822年起草了一部特殊的哈萨克法典。“中儒兹”的汗被废除了，它的拥有约五十万人口的领土也被分成了许多俄国行政单位，进行混合管理。一切刑事案件以及涉及二十卢布以上的民事诉讼都得由俄国军法部门受理。禁止在哈萨克人中再获得奴隶。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已经不再是名义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了。两年之后（1824年），“小儒兹”的五十万牧民也受到同样改革的影响，不过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保留在19三名本地“苏丹”手中，每人负责一部分地区。同时，哥萨克人在哈萨克人自己的土地上追赶结伙的难以驾驭的哈萨克人时，又被准许采用“穷追猛赶”的办法。靠近俄国碉堡的哈萨克牧场也被征用，给了哥萨克人。

哈萨克的独立的猝然告终，导致了许多次暴动。“小儒兹”的一位前可汗的儿子凯普·加利亚·伊希莫夫在1818年至1820年起义反抗俄国人，在1827年至1829年又再次起义。他想以接受中亚的浩罕汗国对自己的主权的办法，来重建自己的汗国。伊萨达伊和马哈姆巴特于1836年至1838年在布凯耶夫

帐领导了起义，沙德什安于 1832 年至 1836 年在“中儒兹”领导了起义。同时(1834 年)，俄国奥伦堡当局在里海的东海岸修筑了诺沃·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碉堡，正修筑在自从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那时候以来就被放弃了的那块地方^①。

为了要在从事农业的哥萨克人和传统上一向从事畜牧业的哈萨克牧民之间“鼓励贸易来往”，哈萨克被禁止耕种他们的土地。这一歧视政策迫使哈萨克人以高价买进俄国面包而以低价售出他们的牲畜，在十九世纪整个三十年代里一直强制执行了这一政策。

俄国政府为了要从“小儒兹”的哈萨克人那里增收捐税，1837 年制订了一种一个半卢布的茅屋税，而且过去经由哈萨克当局之手来征收捐税的办法也取消了。

对俄国政策的不满，于 1838 年在西部和北部哈萨克斯坦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特别是在阿克摩林斯克地区更为猛烈。哈萨克人在一位勇猛的领袖盖涅萨勒的领导下，在 1845 年之前一直使这一地区动乱不安。盖涅萨勒想回复到 1822 年以前的那种关系，即俄国保持纯粹名义上的主权。在无法迫使俄国同意的情况下，盖涅萨勒就去从土尔克斯坦的三个汗国那里寻求合作，并试图击毁俄国的碉堡和哥萨克人的居留地。在终 20

^① 作为导言的这一章大半取材于马萨夫斯基 (V. I. Massalski) 的历史资料《俄罗斯—我们祖国的地理详志》(Rossiia, polnoe geograficheskoe opisanie nashego otechestva) 中的“土尔克斯坦地区”(“Turkestaniski Krai”) (圣彼得堡: 达夫连 [A. F. Davrien] 版, 1913 年) 第 13 卷。并见玛丽·霍兹沃思 (Mary Holdsworth) 著的一本小书《十九世纪的土尔克斯坦》(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牛津: 中亚研究中心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9 年。有关俄罗斯之前那段时期, 见巴铎尔 (W. Barthold) 著《中亚土耳其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巴黎: 昂德里恩-梅宋内夫 [Andrien-Maisonneuve]), 1945 年。

于失败后，他就到南方进入了“大儒兹”的领土，那里当时还不受俄国人的控制。在那里，他在一次地方上的冲突中死去。

同时，俄国仍在打算同哈萨克草原南部的浩罕、布哈拉和基发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1803年，由加维尔多夫斯基中尉率领的一个武装商队试图从西伯利亚到达布哈拉，可是在遇到了哈萨克人的敌对行动后就折回了。

1820年，一名为俄国服务的外国人奈格利到达了布哈拉，进行搜集珍贵情报的工作。1824年又派遣了一个商队，试图建立贸易关系，可是把所带的商品全都丢失了。

1833年，一位精力非常充沛的将军彼罗夫斯基担任奥伦堡的总督，于是对中亚的政策又开始更加积极主动起来。1835年，一位曾经参加过1830年波兰起义、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军官维特凯维奇，被俄国政府派到了中亚。维特凯维奇期望能获赦免，因而雄心勃勃。他到达布哈拉后，又从那里前往阿富汗，从1837年呆到1839年，并成功地击败了一个名叫本斯的英国间谍的阴谋。本斯是自从马可波罗以来第一个到达帕米尔山区的西方人。1839年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英国军队攻占了坎大哈和喀布尔。俄国对此极为不悦，认为有理由获得补偿，便命令彼罗夫斯基将军开往基发，把可汗撵下台，代之以一个较听话的人，并取得贸易特权和释放俄国囚犯。这支六千人的远征队伍中包括了一百五十名巴什基尔和一千名哈萨克后援部队，并有一万二千头骆驼。可是，彼罗夫斯基并没有能到达基发，他在沙漠中折损了一千多人以及几乎全部骆驼之后就折回了。未蹈一百二十年以前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的复辙，已属幸运。

英国人在阿富汗也并不比较顺利。初期胜利之后，接着就是 1841 年的失败。俄国和英国虽然都出师不利，却都不肯罢手。英国继续对阿富汗进行渗透，俄国也重派使团分赴布哈拉（布捷涅夫少校）和基发（尼基富罗夫上尉）。一群渴望摹仿成绩卓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俄国商人，1847 年也组成了“莫斯科对亚洲交易的贸易行”。沙皇政府由于不习惯于这样大规模的私人事业，不愿意支持这家新公司的殖民计划。这家公司便在 1854 年关闭了，一事无成。

在盖涅萨勒起义之后两年，即 1817 年，俄国人感到有足够把握向中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了。当地的俄国司令官奥布鲁契夫将军在锡尔河北岸筑起了雷姆堡（阿拉斯克）。从陆地上运了两只船到咸海，集结在那里。这一碉堡就成了俄国进一步渗入中亚的主要基地。后来数年内，锡尔河的岸上又筑起了几个新碉堡，这一来就消除了乌拉尔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饥馑草原”上的保护性的无人地带，而把俄国人向土尔克斯坦各汗国更带近了五百哩。为了对浩罕的哈萨克牧民袭击俄国的雷姆堡进行报复，1853 年占领了浩罕的阿克·美切特（彼罗夫斯克），就此完成了碉堡防线。

俄国的大规模拓荒运动的另一支胳膊，是从西伯利亚沿着中国边境南进，经过“中儒兹”的土地，越过巴尔喀什湖。这一行动使俄国人成功地迫使“大儒兹”的哈萨克人把他们与浩罕的同盟转变为与俄国的同盟（1847 年）。进一步往南推进之后，他们又筑起了凡尔诺堡（即今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这是俄国人为了封锁浩罕的北部边境而修筑的新的碉堡防线上的第一个碉堡。在俄国人后方各地蜂起的哈萨克牧民的起义，诸如 1850 年至 1854 年在“中儒兹”地区发生的伊色特和贝克特的起

义,都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①。

因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基发、布哈拉和浩罕这几个落后的、中世纪的汗国已失去了哈萨克草原这块保护性的缓冲地带,而同一个准备并渴望轻易地取得殖民地的强大的欧洲大国——俄国,面面相对了。

1854年和1855年,俄国人入侵印度的旧梦又复现了。在圣彼得堡制订了两项关于可能远征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然而,由于俄国1855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致使这些计划未能实现。

征 服

三个面临俄国殖民征服的土尔克斯坦汗国都没有明确的边境线。布哈拉的埃米儿统治着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除了威海以南的大片沙漠地带以外的广大领土。他的国家的中心是拥有历史名城布哈拉和萨马尔罕的富庶的泽拉夫善谷地。这个国家的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半数是乌兹别克人,三分之一是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约占十分之一。

基发的可汗所占有的土地位于威海的南面,阿姆河的两岸,而以基发绿洲为其中心。人口约有七十五万,包括卡拉-卡尔巴克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

23 浩罕占有位于锡尔河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大片领土,而以富饶的费尔干纳谷地及塔什干绿洲为其中心。它拥有约三百万人口,绝大多数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它还拥有

^① 俄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哈萨克起义,另一方面于1855年鼓动哈萨克人去劫掠和奴役那些在巴什基利亚的巴提尔夏起义中遭到镇压后逃到草原的巴什基尔人。

中亚最大的城市塔什干(有十万居民)。

里海和阿姆河之间的土库曼牧民以及在北方草原的那些尚未处于俄国保护之下的哈萨克人，只是时断时续地承认可汗们的权力。

这三个汗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都是中世纪式的。土地主要分为三类——国家的、私有的和教权的。种地的多半是贫困的佃户，他们只能够得到收成的一半至五分之一。经济活动主要仍是本地性质的。奴隶制度到处都存在。这些汗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极落后，只有基发，由于领土狭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布哈拉和浩罕的一些边远省份经常不服从中央当局。乌兹别克在一种多民族局面下的政治优势，导致了民族冲突。而且，三位可汗也时常彼此争吵不休。

俄国人一面避免与布哈拉和基发进行直接的敌对接触(1858年还向基发派遣了一个使团)，另一方面却在浩罕的边界上发动了一系列的地方性行动。他们沿着锡尔河南移，朝着吉尔吉斯山进发，1860年占领了托克马克和匹希别克，1861年占领了居列克和亚内-库尔干，1864年又占领了土尔克斯坦城、奥利-阿塔，最后占领了奇姆肯特。驻扎在奇姆肯特的俄国地方司令官契尔涅亚耶夫将军，企图突袭塔什干，结果失败了。被激怒了的浩罕政府，不甘心不战一死就放弃它的中心塔什干和费尔干纳谷地。俄国人已准备就绪。他们在1865年建立了一个由遥远的奥伦堡总督管辖的单独的土尔克斯坦省。6月间，契尔涅亚耶夫将军带领了一千九百五十名士兵和十二尊炮，开往塔什干，强行攻占了塔什干。拥有六十三尊炮的三万名穆斯林防卫者竟未能予俄国人以重创。这次胜利对本地人产生了一种瓦解士气的影响，提高了俄国人的威信。布哈拉的埃米儿对俄国

人的胜利感到惊恐，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他要求俄国人撤出塔什干，并将俄国人派驻布哈拉的使团加以拘留。同时，浩罕的懦弱的可汗也由布哈拉所支持和推选的胡多雅尔可汗所替代。布哈拉的武装队伍还对远至塔什干的俄国人的运输线进行骚扰。1866年，俄国人又转过头来打布哈拉，在额尔德加打击了布哈拉军队。他们占领了霍德金特和乌拉秋贝，并且再一次在亚内-库尔干击败了布哈拉人。接着就对征服了的领土进行改制。这个土尔克斯坦省改为单独隶属于一个总督管辖，而以塔什干为首府，后来又划分为两个省，即锡尔河省和谢米列奇耶省(1867年)。(哈萨克草原在1868年也曾被划分成俄国式的行政单位，隶属于军人总督)这一地区的俄国侵略军司令考夫曼将军被任命为土尔克斯坦的第一任总督。1868年1月，考夫曼同浩罕签订了一项和约，可是对布哈拉仍继续进行战斗。5月间，他以三千五百人的兵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历史名城萨马尔罕，然后顺着泽拉夫善河直达卡塔-库尔干。拥有将近五万人之众的布哈拉军队从两翼包抄了俄国人，并攻打萨马尔罕，可是沒有击破六百五十八名俄国驻军的抵抗。6月间，布哈拉被迫签订和约，使这个汗国成了俄国的属国。布哈拉还被要求割让萨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

也是在这个时候(1869年)，俄国的高加索军队渡过了里海，修筑了克拉斯诺伏斯克港口和碉堡。这为后来跨越土库曼沙漠的进军提供了基地。只有基发仍未受干扰；它受到贫瘠沙漠的保护，仍然很难接近。

可是在1873年，尽管俄国人声言要和平，考夫曼将军仍向基发进军，进入了基发城，并强迫可汗接受充当俄国的保护国(1873年8月)。和约条款中还包括割让基发的西部领土，以及

交纳贡款。同一时候，俄国军队还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进兵，平定了里海沿岸（1870年至1873年）。

这样，在塔什干陷落后八年，土尔克斯坦所有的三个汗国都变成了俄国的属国，它们领土的大部分也被改为属于考夫曼将军督领的一个俄国省份。

对新局面的普遍不满导致了一次反对浩罕的胡多雅尔可汗的起义。他的儿子纳司雷丁被宣告为可汗，一次反俄国的神圣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在斯科别列夫上校的率领下迅速应战。斯科别列夫在麦克拉姆击败了本地人，进入了费尔干纳谷地，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了谷地的全部主要城市——纳曼干、安集延、浩罕、马尔格兰。为了对这次起义进行报复，俄国把浩罕汗国并入了俄国土尔克斯坦，并放逐了不幸的胡多雅尔可汗（1876年）。斯科别列夫上校因功受赏，晋级将军，并被任命为土尔克斯坦新建的费尔干纳省省长。

同一年中，俄国军队在东部平服了吉尔吉斯部族，1877年又在土库曼尼亚的特克绿洲占领了克孜尔-阿尔瓦特。居功自傲的斯科别列夫向考夫曼将军呈递了一份入侵印度的计划。然而，刚在中亚立住脚的俄国并不愿意按照斯科别列夫的侵略计划去冒同英国作战的风险。英国的行动也很迅速：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告为“印度女皇”（1877年），这明显地表示英国打算在那个地方扎根。这一行动并没有阻止俄国人在阿富汗边境上试探英国的耐性。1878年，俄国外里海部队的斯托里托夫将军偕同一个外交使节团，一起被派往喀布尔。1879年，俄国军队向特克的土库曼部族进兵，可是后来在盖奥克-特贝遭到了失败。俄国军队在整个地区都在调动。只有柏林会议才能够叫俄国人停止前进。然而，对土库曼尼亚的平服仍在继续。1880年，俄国人

开始从里海建筑一条通往内地的战略铁路，而由斯科别列夫将军统率的一支新的远征部队又被派去进攻顽强的特克土库曼人了。一万一千人攻打盖奥克-特贝堡，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之后，于1881年1月攻占。这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

1881年，俄国人在土库曼的领土上建立了外里海省，并把外里海铁路从里海海岸推进到克孜尔-阿尔瓦特。

亲眼看到自己的政策取得成就的考夫曼将军一年后便去世了。1884年，本地抵抗力量的最后堡垒——玛里和捷真这两个土库曼的绿洲也承认了俄国的权力。一年之后，外里海铁路通到了玛里。征服中亚遂告完成。俄国提议要同英国统治的阿富汗标划边界。为此，成立了一个英俄混合委员会。正当委员会尚在筹组时，1885年^①3月间，俄国人同由英国顾问率领的阿富汗人却在克希卡河发生了冲突。可是没有让冲突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1887年，阿富汗同俄国的中亚细亚之间的边界，终于最后确定了下来。

到了1886年，土尔克斯坦总督的统辖范围分成三个部分：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和泽拉夫善区（1887年以后改为萨马尔罕省）。铁路于1888年通到萨马尔罕^②。中亚细亚全部平定，中亚的穆斯林人民被迫接受了俄国人统治的现实。

沙皇的政策

沙皇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打算用维持住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秩序，而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的方法，

^① 原书作1855年，疑误。——译者

^② 萨马尔罕-塔什干-安集延段建于1895—1899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建于1900—1905年。

来保证持续的统治。可是，不久就产生了后来对该地区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尔克斯坦的植棉业的勃兴。俄国和波兰的纺织工业对廉价的内产棉花的需要，费尔干纳谷地的丰饶土地的肥沃，以及在当地移植美国棉花(约在1884年)所获得的成功，都使棉花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产品。第二个问题是哈萨克草原和吉尔吉斯的所谓“剩余土地”问题。那里牧民们的土地，只要适宜于耕种，就被俄国人买去、抢去或征用去。俄国移民的人数迅速增加，而本地人却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被迫迁移到较差的地区去。第三个问题是对土尔克斯坦和草原区域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中亚已成了俄国制商品的良好市场。这三个因素——棉花、剩余土地和市场——在后来的年代里都是焦点所在。种植美国棉花的土地，从1886年到1890²⁹年，总面积增加了六倍。进口棉在1878年以前都是免税的，1878年那一年也还只征收每公担二点四卢布的税，在1887年却遭到了六卢布的进口税、1903年遭到了二十四卢布的课税的打击。俄国纺织工业在1886年时要进口俄国对棉花全部需要的百分之九十六，而到1914年只进口百分之四十八点七了。其余的需要都由中亚供应，中亚的植棉地区也从1886年的一万三千二百公顷发展到1914年的五十九万七千二百公顷^①。

植棉业的勃兴对其他地域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棉产量的增长同时使粮食越来越缺少。过去粮食自足的中亚，如今不得不日益依赖从俄国输入粮食。工业也是围绕着棉花而发展。事实上全部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二都受雇于棉纺厂，

^① N. V. Arkhipov: *Sredne-Aziatskie respubliki* (阿希波夫:《中亚共和国》),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pp. 86—87.

中亚的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以上也来自棉纺厂。中亚一面输出棉花，一面又增加从俄国输入棉织品。

植棉业的勃兴为货币经济创造了真正的基础。中亚市场向俄国工业品开放了。俄国的制造商由于无法在平等条件下同西方的制造商展开竞争，就需要有一个保护性市场，以关税壁垒来制止外国的竞争。在这方面，中亚正合理想。到了1907年，中亚就成了来自母国俄罗斯的谷物、糖、木材、钢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的**重要买主**^①。

土地剩余问题是个最复杂的问题。在俄国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唯一移居到哈萨克土地上的俄国人是那些自由哥萨克人，而且他们只沿着碉堡线定居在哈萨克草原的边缘上。农奴解放之后，来自托姆斯克省和托勃尔斯克省的农民开始移居到北哈萨克斯坦。接着，来自萨马拉、萨拉托夫、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基辅、奥勒尔、坦波夫、契尔尼哥夫以及顿河等省的农民也接踵而至，特别是在1891年饥荒之后。到了1893年，新来到的人总数已达二十万^②。

到了这个时候，俄国当局决定要使殖民运动更有秩序地进行。1891年颁布的指令加强了俄国在行政上对草原的控制，对于以后的殖民化的管理也发布了一项特别规定。俄国的下一个步骤是向哈萨克草原派一个远征队(1895年)，以便从多半是牧民的本地人所“不需要”的土地中为新到的移民筹划一笔“土地

① G. Safarov: *Kolonialnaia revoliutsiia (Opyt Turkestana)*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 Moscow: Gosizdat, 1921, p. 42.

② E. B. Bekmakhanov: *Prisoedinenie Kazakhstana k Rossii* (华克马哈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Institut istorii, 1957, p. 168.

基金”。这是剥夺本地人的第一个有组织的步骤。委员会在区别“需要的”土地和“不需要的”土地时并不审慎。为了使本地人放弃“剩余的”土地，还施加了压力。俄国移民增加了。年年春天，一辆辆满载着疲惫的农民的大车驶过乌拉尔山，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上寻求新生活。

1902年，一个新的委员会又被派到了土尔克斯坦。这个委员会发现，在谢米列奇耶草原上有大片土地是本地人所“不需要的”，因而可以列为剩余的土地。同时还了解到，俄国人的农场比本地人的农场需要多得多的土地，因为俄国农民用的是粗放的耕作方法，种的主要是谷物^①。

在那时以前，谢米列奇耶的俄国哥萨克人和农民为数甚少（1883年才二千五百人）。那里还有一些在修筑运河之后留在当地的工人，以及1891年至1892年俄国闹饥荒时逃来的难民。委员会的发现以及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农民的大批来到，导致了对当地土地的加速征用。1908年，由帕伦伯爵领导³¹的第二个委员会又被派到了草原。这个委员会又进一步推进了俄国的殖民化。因而在1903年至1911年之间，谢米列奇耶的俄国农村人口从九万五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而俄国在锡尔河地区的农村移民人数也达到了四万五千名。对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土地征用，也由于一项立法措施而变得更容易了。这一措施所根据的假定是极不可靠的，即草原上的全部土地过去都属于可汗所有而不是属于私人所有，因此，在俄国征服之后，沙皇就成了土地的一切合法权益的当然继承者^②。

^① A. A. Kaufman: K voprosu o russkoj kolonizatsii Turkestanskogo Kraja (考夫曼：《关于俄国在土尔克斯坦地区殖民的问题》), St. Petersburg: MZ i G. I., 1903, pp. I—VII.

^②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24页。

对“剩余土地”的接管，多半是用粗暴的行政压力来完成的，结果是强迫本地人离开自己的土地。不仅牧民，甚至定居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遭到这样的对待。当斯托雷平总理于1910年巡访这一地区之后，对“剩余土地”的接管就更加速进行了。据估计，在十月革命之前这段时期里，被接管的哈萨克土地约在四千万至四千五百万公顷之间。被劫夺的土地主要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而在1905年以后，又包括了谢米列奇耶和锡尔河地区的土地。土地征用的结果是，在1910年到1913年之间，穆斯林年年遭受饥荒^①。一般俄国农场的年度收入要比同一地区的一般哈萨克农场的年度收入多一倍。而且，哈萨克人的绝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只占全部本地人口不到百分之四的部落贵族手中，因而俄国人和哈萨克在收入方面的真正差距还不止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剩余土地”仍在继续征用。1916³²年，沙皇政府由于急需人力，决定征募在传统上一向不承担征兵义务的中亚穆斯林参加劳动队。这就突破了容忍的最后限度。哈萨克燃起了起义之火，领导者是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阿卜都·加法尔·詹姆波辛和喀西姆·奥斯潘。起义之火一直蔓延到萨马尔罕的吉扎克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起义者总数到10月间已达五万来人。11月间他们几乎占领土尔盖城，失败后又退回草原^②。

① S. D. Asfendiarov: *Natsionalno-osvoboditelnoe vosstanie 1916 g. v Kazakhstane* (阿斯芬佳洛夫:《1916年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解放起义》), Alma-Ata-Moscow: Kazakhskoe Kraevoe izd., 1936, p. 184.

② S. Brainin: *Amangeldy Imanov* (布雷宁:《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 Alma-Ata-Moscow: Kazakhskoe Kraevoe izd., 1936, pp. 50 ff.

这时候土尔克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将军召开了一次有关这次起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把所有参加起义的本地人逐出他们原有的土地，赶到东吉尔吉斯去。他们的土地拨给即将来到的俄国移民使用。在执行这一重新移民的决定时，起义仍在进展。事实上在二月革命(1917年)前几天，俄国征讨军仍在追击叛军的残兵。有二十五万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逃到了中国新疆或死于饥饿^①。在后来的年代里，停止征用土地和停止俄国人向当地移民，就成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民族主义者的最大愿望。

第二章 革命

两场革命

“二月革命是从电报里来到土尔克斯坦的”，革命时期最有权威的沙法罗夫这样说^②。沙皇的土尔克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³³将军还想掌握权力，可是被一个由五名俄国人和四名本地穆斯林组成的临时政府委员会所替代了。几乎同时，在塔什干成立了一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苏维埃)”，其结构同母国的苏维埃差不多。它包括各个不同的左翼分子，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翼集团为了同它对抗，在若干城镇里组织了“公安委员会”。

穆斯林同这一切都毫不相干。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围绕在宗教性的“贤哲团”团体周围，这些团体是唯一公开表示独立愿望

^① 阿斯芬佳洛夫：《1916年哈萨克地区的民族解放起义》，第77页以下，101—105页。

^②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50页以下。

的团体。开明的穆斯林集团不愿去危害开明的俄国新政权所获得的支持，避开了争端。穆斯林中极端激进分子很少，他们的代表是萨马尔罕的人数很少的“劳苦穆斯林联合会”，以及在费尔干纳的一个类似的小团体。

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在5月和9月都召开了穆斯林代表大会。5月的大会宣布赞成建立以民族自治和“夏利亚特”(穆斯林宗教法)为基础的土尔克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在新俄国之内)。还决定停止种植美国棉花，因为种植美棉带来了殖民主义。以
35 谷物代替棉花等于把土尔克斯坦从对俄国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①。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以穆斯塔法·卓开为主席的中央穆斯林委员会。卓开立即着手向塔什干转达了一连串的要求。其中包括将司法权移交给穆斯林手中，并废除欧洲人的单独法庭，穆斯林和俄国人具有平等的选举权，撤退俄国军队，以及在土尔克斯坦设立一个独立的立法会议。

这些要求是提给临时政府的塔什干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会已经处在消失的阶段。9月里，驻扎在塔什干的两团西伯利亚士兵和塔什干铁路修配厂的左翼工人们一起开了一次会。他们要求向当地资本家征用必需的物资，由工人管理工厂，将银行收归国有，并把权力移交给塔什干苏维埃。

临时政府决定进行对抗。土尔克斯坦军区司令员克罗夫尼钦科将军受命将军队开往塔什干。在他的指挥下，装甲列车和哥萨克骑兵开进了城市。以克罗夫尼钦科为一方，同以两团西伯利亚步兵为后盾的苏维埃的另一方，勉强达成了停战。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掌握了权力时，克罗夫尼钦科正在逐步取得

^① 棉产量早已减少了一半。

控制。这促使克罗夫尼钦科进行摊牌。两天后他就逮捕了塔什干苏维埃的成员,并下令解除亲苏维埃的西伯利亚步兵的武装。第一团由于事出突然,成功地被解除了武装,可是第二团在铁路工人的增援下进行了武力抵抗。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之后,西伯利亚队伍赢得了上风,因而又恢复了苏维埃的权力。

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苏维埃在重新取得权力³⁶后,拒绝承认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这个苏维埃为了加强它在穆斯林中间的威望,成立了两个名称动听而权限极小的组织:执行委员会以及地方苏维埃,其中每个组织都把一半席位给予民族主义的“贤哲团”穆斯林。

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彼此争吵不已。布尔什维克想按母国俄国那样建立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唯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俄国人而当地多数人民群众都是小私有者——农民、手工艺者、小商贩——的地区,这样的教条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气息^①。奉行温和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则主张在地方当局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以及普选的基础上,实行地方自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则对成立农民政府颇感兴趣,在当地的具體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是由谢米列奇耶农村的俄国移民来进行治理。而谢米列奇耶的移民们则要求或者自治,或者同西伯利亚的反共分子联合。苏维埃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不愿意接受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派的政策,也不愿容忍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来分掌权力,即使是纸面上的权力也不愿意。1917年11月19日那天,布尔什维克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同塔什干苏维埃对抗,名称是人民委员会,成

^①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78页。

员有七名布尔什维克和一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全都是俄国人。

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也马上效法。他们于11月26日和27日在浩罕召开第四届全穆斯林代表大会，并成立了自治土尔克斯坦的穆斯林临时政府，由塔米希巴耶夫任总理，卓开耶夫任外交部长。这个浩罕内阁中包括了一名非穆斯林，即财政部长赫兹费尔德。然而，新成立的穆斯林政府——土尔克斯坦的第三个权力争夺者，既无军队又缺金钱，因而结果无法以必需的力量来支持对权力的要求。

哈萨克草原上的事态的发展也对穆斯林不利。二月革命后穆斯林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自由民族主义的阿拉希-奥尔达党(米尔查克普·杜拉托夫、阿利汗·布克哈伊诺夫和巴杜尔苏诺夫)，有临时政府撑腰；另一派是1916年起义遭到俄国人镇压后幸存下来的激进分子(阿曼格尔德·伊曼诺夫等人)。像詹格尔定等少数地方上的左翼分子则加入了激进派。

一些在1916年起义后逃亡国外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开始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可是他们先前的产业已经被俄国移民占据了。于是回乡的本地人同新移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斗。新移民宁愿诉诸武力也不愿把新近获得的财产交出去。当地的俄国警卫队纪律松懈，想维持一下和平都办不到。

在这段时期内，在奥伦堡举行了两次哈萨克的代表大会。通过这些大会，哈萨克民族主义党阿拉希-奥尔达党提出了新的要求：驱逐俄国移民，停止征兵，将教育事业交还给本地人管理。新产生的民族自治的思想还来不及发展。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把整个地区投入了一场新的骚动。

争取生存的斗争

土尔克斯坦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几乎立即被阿特曼·杜托夫的反共的哥萨克军队切断了同苏俄的联系,直到 1919 年秋天 38 为止,一直保持隔绝状态,其间只有几次短暂的突破。新政权所得到的唯一可靠的支持是来自塔什干铁路修配厂的俄国工人以及当地的警卫部队。

在 12 月 13 日穆罕默德生日那天,穆斯林民族主义分子在塔什干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其中也有一些反共的俄国人参加。士兵们驱散了示威者,枪杀了十八名游行的人,可是,却重新赢得了承认,塔什干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向穆斯林妥协,同意召开一次土尔克斯坦制宪会议。

同时,若干缺乏武装力量和军事盟友的浩罕穆斯林政府,决定参加“哥萨克人、山地高加索人和草原人民的东南联盟”。这个组织是由反共的加列丁将军一纸命令建立的。由于这位将军忙于本身的问题而没有提供军队,浩罕政府就“向左边打开了门”,把它的穆斯林代表大会中三分之一的席位给了刚刚组成的浩罕穆斯林苏维埃。这个浩罕穆斯林苏维埃是一个按照俄国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样子组成的左翼组织。

当浩罕政府还在寻求支持的时候,反共的哥萨克军队终于开始从里海东进,开向塔什干来。塔什干苏维埃倾兵抵挡了哥萨克人的进犯,并在萨马尔罕附近予以击溃。在解除了这一威胁之后,塔什干苏维埃最后决定要消除它那令人难堪的穆斯林竞争者。从萨马尔罕回来的苏维埃军队受命开往浩罕。浩罕政府的对策是先袭击城里的小股俄国警卫队,想要在苏维埃主力军到达以前就把警卫队消灭掉。这一行动并未成功,而在人民

39 委员帕费列夫率领下的苏维埃军队——其中多半是刚在萨马尔罕打了胜仗的蹩脚队伍——这时已临城下。匆匆忙忙聚集的卫城者是由当地的乌兹别克居民、一些特克-土库曼人、高加索的莱兹金山民和少数波斯人组成的。还有由伊尔加希-贝伊率领的当地的穆斯林游击队也来增援。使整个事情更加混乱的是，力量微薄的浩罕穆斯林苏维埃竟想在紧急关头夺取浩罕的权力，希望这样一来就会使俄国军队失去攻城理由。可是这一企图失败了，2月5日那天，苏维埃军队在当地一群俄国的和亚美尼亚的暴民的支持下猛烈进攻。穆斯林卫城者被击溃了。真正的“屠杀”开始了，随着还有奸淫虏掠。当地的穆斯林人民因此同苏维埃极度不和。

塔什干苏维埃并没有试图把穆斯林赢得回来。在1917年至1918年的冬荒期间，并没有作任何用必需的食物来解救城市穆斯林人口的努力。在农村中，俄国军队按照当时已被接受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形式征用食物。所有的棉花都交了出来，不然就会被处以死刑。穆斯林农民凡是被怀疑为同情民族主义游击队的都被枪决了。俄国的革命口号“斯沃波达”（自由）在穆斯林中间流传成“斯沃波达卡”（没什么自由），其含义则是无法无天和抢劫^①。后果是可悲的：整个乡村、城市和铁路不久都落入伊尔加希-贝伊之手^②。这就为未来的巴斯马奇民族主义起义打下了基础。

塔什干苏维埃的下一步骤是企图渗入布哈拉，那里的埃米儿的权威并未为俄国的两次革命所动摇。1918年2月28日，

①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82—84页。

② S. B. Ginsburg: “Basmachestvo v Fergane”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Novyi Vostok, № 10—11, 1925, pp. 184—185.

土尔克斯坦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柯列索夫从塔什干来到布哈拉，拜访埃米儿。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提出的双方合作的要求遭到了埃米儿的拒绝。可是，柯列索夫早就悄悄将军队布置妥当，以便万一必需，就能对布哈拉采取军事行动。他在3月2日发动的进攻一举击溃了布哈拉的防卫者，苏维埃军队便长驱直入城市。他们又像在浩罕的时候那样，在城里进行抢劫。在这个关头，愤怒的人民决定支持原来不太得人心的埃米儿，因此入侵者转过来受到了围歼。布哈拉的数百名无辜的俄国居民也遭到穆斯林暴民的杀戮，等埃米儿的军队赶来干涉制止屠杀已来不及了。

在苏维埃遭到挫折之后，布哈拉的埃米儿和塔什干的苏维埃政权之间签订了一项协定，由后者承认布哈拉独立。另一方面，埃米儿同意把反共的俄国间谍交给苏维埃方面，而且双方无偿地交换俘虏。这场休战显然只是暂时的解决，因为埃米儿仍在帮助在俄国土尔克斯坦活动的民族主义帮伙，而塔什干苏维埃也继续在策划利用布哈拉的激进集团推翻埃米儿^①。

在那个时期中，俄国在基发的老傀儡伊斯芬狄亚可汗被一个非常强悍的敌手朱耐德可汗废黜了(1918年1月)。朱耐德把自己的人送上了基发的王位，并且同布哈拉的埃米儿和俄国土尔克斯坦的巴斯马奇分子双方都建立了联系。五月间，他还处决了几名阴谋推翻他政权的左翼基发青年组织的领导人^②。

① A. I. Ishanov: *Sozdanie Bukharskoi Narodnoi Sovetskoi Respubliki* (伊夏诺夫:《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Tashkent: Ak. Nauk UzSSR, 1955, pp. 61 ff.

② K. Mukhammedberdiyev: *Kommunisticheskaya partiya v borbe za pobedu narodnoi revoliutsii v Khorezme* (穆罕默德伯德耶夫:《为花刺子模人民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 Ashkhabad: Turk. Gosizdat, 1959, pp. 66 ff.

造成这些挫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塔什干苏维埃政府的内部困难。不仅是整个地区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种情况并不是实行全面国有化所能挽救的——而且是塔什干苏维埃当局在穆斯林和许多俄国移民中间的威望已一落千丈。

为了补救这种局面，莫斯科派了一位“特命人民委员”，俄国共产党员科波捷夫到土尔克斯坦来调查情况。在他的指导下，塔什干的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了土尔克斯坦成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选出了新政府，其中包括十八名布尔什维克和十八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而由科波捷夫自己担任主席。

五月里，事情变得对苏维埃比较有利了。谢米列奇耶的俄国移民终于决定起来反对反共的哥萨克人并在当地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一来就加强了塔什干苏维埃的地位，可是谢米列奇耶的苏维埃新政权的行动却显示出自己是个相当令人不安的盟友，因为谢米列奇耶当局满怀着反穆斯林和反犹太的偏见，用鸦片储备作担保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且容许私酿伏特加酒。

塔什干的俄国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不顾自己的政治忠诚，开始集结在当地的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它是在心怀不满的本地人的汪洋大海中唯一残存的“欧洲”势力。土尔克斯坦的斗争越来越朝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穆斯林同俄国人敌对起来。像革命和共产主义等概念已经不再占有首要地位了。

塔什干的共产党员的数目是有名无实的；1918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会议估计全城总共只有二百五十名党员。这次会议对穆斯林群众作出了一些空洞的姿态。它“承认”乌兹别克语同俄语平等，并对乌兹别克无产阶级表示“信任”^①。

^①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86—87页。

同一月内，在土库曼尼亚的主要城市阿什哈巴德发生了一场反苏维埃暴动。塔什干派去了一位特命人民委员弗罗洛夫，⁴²他只是把局面弄得更糟。当地的土库曼部族和反共的俄国军官接管了权力。外里海的苏维埃政府人员遭到逮捕和枪决。英国人出钱支持，成立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外里海政府，其中网罗了反共的俄国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苏维埃军队不久就被逐出了玛里绿洲。

苏维埃土尔克斯坦的处境十分困难，奥伦堡和土库曼草原的反共俄国军队使它腹背受敌，哥萨克人还在进逼谢米列奇耶，穆斯林的巴斯马奇民族主义暴动也正在费尔干纳谷地酝酿。除此之外，苏维埃政权还经常受到内部斗争的影响。首先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同布尔什维克分裂了（大会于1918年10月在塔什干召开）；其次是新老共产党员在第二届党代会上（1918年12月）也发生了分歧。12月间，巴斯马奇显示出力量有很大增长。当时俄国移民的一次反共暴动在谢米列奇耶的毕洛沃兹克区被弭平了。1919年1月18日夜里，当塔什干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委员奥西波夫企图接管城市的时候，事情又变得不可收拾了。尽管这次暴动没有成功，失败的奥西波夫逃往布哈拉去了，可是士气已一落千丈，特别是因为塔什干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们曾参与策谋这场政变。

2月间，莫斯科任命了一个临时的土尔克斯坦事务特别委员会。除了已在领导塔什干苏维埃政府的科波捷夫之外，莫斯科又加派了两名共产党官员，伊利亚瓦和基塞列夫。这时基发的局势日趋紧张。自从1919年中以来，基发青年组织和其他反对朱耐德的分子就被允许在边境上的苏维埃那一边聚集了。然⁴³而，塔什干鉴于自身势孤力弱，认为在当时有必要同朱耐德可汗

签订条约，承认基发的独立(1919年4月9日)。派往基发的苏维埃代表团形式上由一名前土耳其军官穆罕默德·卡赞别克率领，可是苏维埃代表团的实际首脑却是一名俄国共产党人赫里斯托富洛夫，他把他的注意力一半放在代表团的正式任务上，一半却放在幕后的反朱耐德可汗的宣传活动中^①。他后来留在基发充当塔什干的特使，可是仍不断从事他的阴谋活动，最后死在朱耐德可汗手下人的手中。

这时在塔什干又正酝酿着一场亲穆斯林派和殖民派之间的斗争。在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当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之后，党内建立了一个民族小组，使穆斯林党员终于有了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可是，以赢得自决权为目标的本地人，诸如吉尔吉斯人雷斯库洛夫和乌兹别克人图尔宋·霍德查耶夫，在去参加党的会议而没带安全通行证时，总是对自身的安全有些顾虑。为了避免遭到塔什干苏维埃政权内部十分活跃的俄国沙文主义分子的无理逮捕，携带安全通行证是必要的。

在第三届土尔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亲穆斯林分子和殖民主义分子之间终于爆发了战斗。莫斯科的人民委员科波捷夫站在亲穆斯林分子一边，而塔什干政府的新首脑卡扎柯夫则站在殖民主义者一边。殖民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黑色百人团(极端反动的组织)的前成员乌斯宾斯基变成了共产党人。塔什干苏维埃也站到了殖民主义者的一边。为了要压倒反对力量，科波捷夫设法选出了一个新的土尔克斯坦党委会，其中包括七
44 名俄国人和三名穆斯林。新的党委会立即同塔什干政府发生了

^① 穆罕默德伯德耶夫：《为花刺子模人民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第80、90—92页。

冲突，而地方上的苏维埃当局以及公安部队仍然一如既往继续显示自己的反穆斯林偏见。1919年7月12日，莫斯科打电报给塔什干，要求让穆斯林参加政府部门。卡扎柯夫一接到电报就召集塔什干苏维埃、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的首脑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的结果是殖民主义分子胜利了。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复电，声称由于当地的具体情况，不可能让穆斯林参加地方上的政府部门。会议还决定不发表莫斯科来电的内容^①。

1919年9月，在塔什干举行了两个代表大会：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土尔克斯坦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从这些代表大会上，按照往常的共产党的方式，产生了“康别地”的组织（贫农委员会），并采纳了国家垄断粮食的办法。这些新发展又一次成了俄国移民手中的工具和没收穆斯林农民的食粮的借口。不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同意了让本地人在塔什干政府内占多数。

同政治和经济窘境形成对照的是，军事形势有了极大的好转。俄国的反共部队已被逐出土库曼尼亚（1919年7月）。考尔察克海军上将终于在西伯利亚被击败，土尔克斯坦也就不再同国内的其他部分孤立了。

革命的扩展

土尔克斯坦和俄国本土之间恢复交通之后，接着就从北方开来了苏维埃军队，这使塔什干的政治力量中心从地方当局转⁴⁵移到了莫斯科的代表及新来的红军第四军的军事统帅部之手。第四军的党的会议决定废除塔什干当局以前关于不让穆斯林参加地方苏维埃组织的决定。1919年10月，根据列宁签署的一

^①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100页。

项莫斯科法令，成立了一个土尔克斯坦事务委员会。其中没有包括穆斯林在内。格鲁吉亚人伊利亚瓦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并负责对外关系。古比雪夫和弗伦泽管理军事，茹德祖塔克负责经济问题，葛洛希契金负责党的工作。委员会中还包括博克伊。他们于1919年11月开始到达塔什干。陆军的特别（警察）小组接管了地方上的“契卡”（政治警察）。作为远大的区域自治的符号的土尔克斯坦外交部被撤销了，其任务被移到委员会内部的对外关系部。一切供应都得通过军队的军需委员会，这样就使塔什干当局站不住脚了。

塔什干及周围的俄国移民，包括共产党人在内，为了想遏制莫斯科对土尔克斯坦地方事务日益加甚的控制，开始主张地方自治并博取当地穆斯林的欢心。可是，局面有了改善。第五次土尔克斯坦党的会议选举了一位本地穆斯林图尔宋·霍德查耶夫为第一书记。第四军总部、塔什干政府和土尔克斯坦委员会现在也在博取穆斯林多数派的欢心了。委员会向莫斯科送了一份计划，对土尔克斯坦的苏维埃政权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猛烈的⁴⁶批评，说它染上了“殖民主义心理”，又说地方上的穆斯林人民谴责它们的政策是“旧沙皇政权的间谍们的行为的继续。”^①

随着该委员会的提议，莫斯科就指示要主要做到两件事：在俄国移民中间铲除殖民主义态度，在穆斯林中间铲除“封建家长式态度”。在镇压了1916年暴动之后从吉尔吉斯人那里夺走的土地要归还原主。无地农民，不分民族，一概分给土地。为了贯彻这一政策，俄国移民将被解除武装。投机商、以前的资产阶级分子、沙皇时代的警察，以及沙皇时代旧官僚中间的那些“不适

^① 穆罕默德伯德耶夫：《为花刺子模人民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第100—149页。

宜于新土尔克斯坦”的人，将被驱逐出境，送往俄国集中营。当地的共产党员中凡具有“殖民主义头脑”的，将被调回俄国，另由俄国都市的共产党员来代替他们。俄国人和穆斯林在国家分配供应品时将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些崭新的做法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困难，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

曾经对殖民主义者及其做法大肆批评的土尔克斯坦事务委员会，不久也回到了它过去谴责过的那种立场。该委员会和雷斯库洛夫一派的穆斯林共产党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这次有塔什干的党和政府撑腰，现在穆斯林在其中已经占了多数。雷斯库洛夫是斯大林的仇敌、鞑靼民族共产主义派米尔·萨吉特·苏丹-加里也夫的朋友^①。他要求得到明确了解，即红军第四军的到来将不会被解释为母国俄国派来俄国军队征服这一地区。雷斯库洛夫还反对在本地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斗争的主张，特别⁴⁷是在非殖民化的时期。在无法同委员会达成一项行动协议之后，雷斯库洛夫集团就退出了政府。塔什干又组成了新政府，由更驯顺的腊克姆巴巴也夫任主席。他同二十名肯合作的当地共产党员一起被选进了新的土尔克斯坦党中央临时委员会。

莫斯科知道了塔什干发生的困难，决定再派遣一个新的委员会，其中仍未包括穆斯林，而由索科尔尼可夫、沙法罗夫、卡冈诺维奇和彼得斯组成。在他们的主持下，土尔克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20年9月）重申了在本地区穆斯林群众中间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则，从而排斥了雷斯库洛夫所说在殖民地国家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利害相通

^① 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255页。

的论点。此后不久，雷斯库洛夫在巴库举行的第一次东方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提出了他和苏丹-加里也夫的主张，即在殖民地的东方必须进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他辩称殖民地区的本地无产阶级力量还过于微弱，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①。

正如那时以后的形势所表明，苏丹·加里也夫和雷斯库洛夫都比他们的时代先行了约三十五年，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弄错了地方。莫斯科只有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而且当时只有在事关西方殖民地和不太发达地区的时候，才接受他们的提议，用来作为非殖民化阶段的正确看法的例证。

在1920年中，中亚细亚事物的发展却完全不同。甚至连新委员会中最亲穆斯林的委员，雷斯库洛夫的敌手沙法罗夫也很快发现自己同俄国同事们有了冲突。于是同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间，包括列宁在内，交换了信件。列宁逐渐怀疑塔什干的俄国官员，包括委员会的新主席汤姆斯基和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彼得斯在内，有俄国沙文主义倾向^②。

同时，随着内战的终止，苏维埃人决定按照更为方便的路线来重新组织基发。早在红军第四军到达之前，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就曾同朱耐德可汗的封建敌手达成过秘密协议。1919年11月，在另一位土库曼首领果赤马买德汗领导下，发生了一场反对朱耐德的暴动，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那时苏维埃认识到若无

^① 苏丹-加里也夫(Sultan Galiev)，一位反抗斯大林理论的鞑靼民族主义共产党人，1928年被捕，自1929年至1939年被囚于索洛夫基集中营，于1940年失踪。

^② Alexandre Bennigsen et Chantal Quelquejay: Les mouvements nationaux chez les Musulmans de Russie, Le sultangalierisme au Tatarstan (亚历山大·本尼格森和尚塔尔·盖尔格杰:《俄国穆斯林中的民族主义运动:鞑靼的苏丹·加里也夫主义》), Paris-Hague: Mouton & Co, 1960, p. 138.

俄国人的直接支持,叛军是无法获胜的,因此苏维埃军队就在12月25日那天越过了基发边界。三天之后,果赤马买德汗成了他们的正式盟友。朱耐德可汗在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之后,带着四百名部下逃向卡拉-库姆沙漠。基发的合法统治者、朱耐德的傀儡赛德-阿杜拉勉强接受了新的局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20年2月2日遭到了废黜,被一个亲苏的革命委员会所代替。朱耐德还想卷土重来进攻基发,可是被击退了。

4月4日那天,在苏维埃控制下的基发被改称为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5月间,这个第一个苏维埃卫星国接受了它的第一个苏维埃特使约瑟夫·莫伊塞维奇·贝克^①。贝克来到后发现新成立的花刺子模政府并不是由真正的共产党人组成的,而是由爱国的基发青年组织的过激派组成的。两位基发青年组织的成员帕尔伐尼亚兹·尤索波夫和苏丹穆拉多夫分别成了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首脑。基发(花刺子模)政府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是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朱耐德的老敌手果赤马买德汗。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适时地同苏俄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1920⁴⁹年9月)。然而,在怀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基发青年组织的成员和他们的俄国“保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②。

苏维埃政府在基发建立了一个人民共和国之后,决定对布哈拉也采取类似的手法。1920年3月14日,土尔克斯坦红军司令员弗伦泽访问了埃米儿,重复了柯列索夫在1918年进行过的尝试,想说服埃米儿同苏维埃人“合作”^③。在苏维埃人接管基

^①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2页。

^② 穆罕默德伯德耶夫:《为花刺子模人民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第154—166,179页。

^③ 伊夏诺夫:《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59页。

发后只不过五个星期就施出这种策略手段，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并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恰恰相反，埃米儿为了企图获得英国的支持，竟往伦敦派遣了一名密使。他还同邻近苏维埃地区的反苏穆斯林游击队领袖们进行了接触。

在通过谈判达到目的的企图失败之后，弗伦泽决定采取行动。俄国工人在土尔克斯坦-布哈拉边境上的一个布哈拉城镇里发动了暴动。同时，革命的布哈拉青年组织的小团体也在布哈拉内部发动了暴动，而且像在1918年那样，俄国军队早就准备就绪。可是这一次他们已不是纪律松懈的塔什干的赤卫军，而是弗伦泽司令员军队里的正规队伍。他们在同一天越过了布哈拉边境，经过了四天的战斗占领了布哈拉(1920年9月)。埃米儿逃到南方塔吉克山区，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于是成立。完成了任务的弗伦泽被调到乌克兰去指挥苏维埃军队对抗克里米亚的反共部队的作战。

十天以后，古比雪夫以莫斯科的第一位官方特使身分来到布⁵⁰哈拉。委派这样一位著名的苏维埃领导人担任这一职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古比雪夫被派到布哈拉来不仅是为了担任特使——他打算统治布哈拉。

1920年11月3日，莫斯科同新建立的布哈拉政府签订了一项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作协定。12月间，苏维埃军队开始开往布哈拉东部去驱逐埃米儿^①。埃米儿·赛德·阿利姆·汗逃到了狄乌向姆贝(今塔吉克首府)，无力再抵抗。3月10日那天，他跨过边界到了阿富汗^②。

到这时候，苏维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似乎是稳固了，可是新

① 伊夏诺夫：《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71—85页。

② 同上书，第142页。

的障碍——基发和布哈拉的民族共产主义，以及整个地区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起义——已经隐约出现在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了。

第三章 巴斯馬奇起义

51

“巴斯马奇”这个字的原义是“土匪”，土匪在中亚并不新奇。土匪们经常在乡间出没，袭击和劫掠商队，而在动乱时期特别嚣张。穆斯林民族主义浩罕政府在崩溃前曾接受过当地巴斯马奇领袖伊尔加希-贝伊的支持。后来，浩罕政府的某些成员逃往巴斯马奇那边，为巴斯马奇的行动增添了思想和爱国的色彩。在当地领袖们之间组织而壮大起来的巴斯马奇运动很像阿尔及利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的运动。在阿尔及利亚，“菲拉嘎”(农民)这个名词原来是法国人用来形容阿尔及利亚土匪的，后来变成形容从事反对殖民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民族主义爱国志士的名词了。促使巴斯马奇运动成长的动力是双重的：因苏维埃人摧毁了浩罕穆斯林政府及继之而来的殖民般的暴行所造成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费尔干纳谷地棉花作物的毁坏^①及随之而来的饥荒所产生的经济危机。

巴斯马奇起义的最初阶段开始发生于1918年2月，即当穆斯林浩罕政府被推翻之时，一直到1920年9月苏维埃军队占领布哈拉时为止。这一时期巴斯马奇在费尔干纳谷地最为活跃。塔什干的苏维埃政府所犯的错误替巴斯马奇帮了忙。强征面包

^① 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91页。

和棉花，枪毙涉嫌同情巴斯马奇的穆斯林农民，以及军纪败坏
52 的红军部队的劫掠行为，都起了有利于巴斯马奇的作用。当时
在本地的穆斯林人中间流行着像“把土尔克斯坦归给土尔克斯
坦人”和“没有暴力的土尔克斯坦”之类的口号。许多本地的苏
维埃官员变了节。其中一位费尔干纳谷地马尔格兰城的苏维埃
民兵队长名叫马达明-贝克的，竟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巴斯马奇
领袖，成了伊尔加希-贝伊的敌手。1918年11月，他和哈尔-
霍佳的一个巴斯马奇同盟集团攻击了谷地中的俄国移民村。当
地的俄国移民为了想阻挡以后的袭击，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支
军队获得了费尔干纳红军总部的官方承认和支持。然而，在苏
维埃确立国家垄断粮食制度这一不得人心的法令的影响下，费
尔干纳的农民军队开始不稳起来。警惕到这一点的苏维埃人在
1919年6月间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可是没有成功。这一行
动反过来又加深了同移民之间的不和。

八月间，移民军要求获得公民权利，要求废除国家对粮食
的垄断和革命法庭。巴斯马奇的首领马达明-贝克支持这些要
求，并把他的七千人的部队并入了农民的部队。他们的这支联
合部队在9月间占领了奥希城。费尔干纳建立了一个临时政
府，由马达明-贝克任主席和军事司令，而由移民军的司令
员、前苏维埃军官康斯坦丁·蒙斯特洛夫任副主席。一个由穆
斯林和俄国人组成的联合反共部队看来已在费尔干纳建成了。

可是，不久整个军事面貌就改变了。由陆军司令米哈伊
尔·弗伦泽率领的苏维埃母国部队到达了土尔克斯坦。塔什干
的苏维埃政权不再同苏俄的其他部分孤立了。苏维埃生力军开
53 到了费尔干纳谷地，及至9月底，这支军队已重新占领了过去陷
入叛军手中的几个城镇。在这段时期，俄国移民同巴斯马奇之

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1月间，蒙斯特洛夫率部向红军投降。穆斯林伏尔加鞑靼红军旅被派去征服巴斯马奇，这是一个英明的政治步骤。巴斯马奇开始大量投诚：1月间有二千六百人，2月间有三千人。剩下的一些在2月4日那天被击溃了。到了1920年3月中，马达明自己也被迫投降了。只有一位重要的巴斯马奇首领库尔-希尔马特依然逍遥在外。费尔干纳谷地的起义看来已近尾声。以前的巴斯马奇队伍被改编为第一乌兹别克骑兵旅的“苏维埃巴斯马奇”部队^①。

巴斯马奇起义的第二阶段开始于苏维埃对基发和布哈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1920年4月宣布成立花刺子模(基发)人民共和国。9月间，布哈拉的埃米儿逃往狄乌向姆贝，接着，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虽然埃米儿无法留在狄乌向姆贝，被迫逃到阿富汗去(1921年3月)，但他的离去只是加强了民族主义的抵抗。埃米儿任命慕拉·阿布杜尔-卡哈尔来领导布哈拉的抵抗。苏维埃企图通过谈判来诱使费尔干纳谷地的巴斯马奇部队的残余分子投降，但是也没有成功。

苏维埃人对布哈拉的接管激怒了整个中亚细亚的人民。俄国征粮小队的行动以及不合时宜地动员(1920年夏季)穆斯林新兵参加苏维埃军队的做法，结果使穆斯林士兵大批逃到巴斯马奇这一边。巴斯马奇的队伍开始一天天地增强起来。红军中的穆斯林队伍越来越不可靠了。于是发出了一项解除第一乌兹别克骑兵旅武装的命令，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旅(只有少

^① S. B. Ginsburg: "Basmachestvo v Fergane"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 *Novyi Vostok*, № 10—11, 1925, pp. 187—191. 马达明-贝克(Madamin-bek)于1920年夏为库尔-希尔马特(Kur-Shirmat)的部队所擒, 移交给另一位巴斯马奇领袖哈尔-霍佳(Khal-Hodja), 后被哈尔-霍佳杀害。

54 数例外)参加了巴斯马奇一伙。巴斯马奇在一位本地首领库尔-希尔马特的领导下,力量增强了。他们是一支熟悉当地情况的六千人的队伍,有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并且,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战斗一旦失利,他们可以消失在村庄里。结果是整个费尔干纳谷地都落入了他们的控制中。苏维埃人仅仅统治着主要城市和铁路^①。

1921年2月22日,费尔干纳的反巴斯马奇行动的领导人季诺维耶夫在费尔干纳谷地同巴斯马奇的代表会晤,但是没有能使他们投降^②。4月间,苏维埃方面的处境暂时有了好转。一名巴斯马奇首领贾尼-贝克投向了他们这边。以他的部下,加上第一乌兹别克骑兵旅剩下的队伍,组成了一个本地人的团。1920年至1921年之间的冬天非常艰苦。人民都疲惫不堪了。8月里和9月里,苏维埃人和巴斯马奇之间举行了和平谈判,和平的前景似乎很有希望^③。这时候,饥饿的俄国难民涌进了这个地区^④。中亚其他地方的局面亦非常困难。在哈萨克斯坦,虽然有美国救济署的援助和因推行了新经济政策而缓和了经济压力,饥荒和巴斯马奇仍在发展^⑤。

①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第192—194页。

② T. Kh. Keldiev: *Razгром Kontrevoliutsii v Ferganskoi i Samarkandskoi oblastiakh Turkestanskoi ASSR (1918-23)* (凯尔迪也夫:《粉碎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费尔干纳州和萨马尔罕州的反革命〔1918—23〕》), Tashkent: Gosizdat UzSSR, 1959.

③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第192—194页。

④ Akademiia Nauk Uzbekskoi SSR, *Istorii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i prava Uzbekistana* (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和法权的历史》), Vol. I, 1917—1924 (Tashkent, 1959), p. 55.

⑤ T. Ryskulov: "Sovremenny Kazakhstan" (雷斯库洛夫:《当代哈萨克斯坦》), *Novyi Vostok*, № 12, 1926, p. 112.

在基发，本地共产党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化了。当地支持苏维埃人的领导人物果赤马买德汗遭到枪杀。其结果是，在他的土库曼追随者和当权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共产党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巴什基尔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泽克·瓦利道夫在俄国人取消了伏尔加巴什基尔的自治后，逃到基发，得到了基发当局的庇护(1920年11月)。

塔什干的土尔克斯坦事务委员会和布哈拉的古比雪夫不能⁵⁵再容忍这种局面了。1月里，按照古比雪夫的命令，以俄国共产党员萨福诺夫为首的一大群党员来到了基发。基发的共产党人为了想在莫斯科面前破坏萨福诺夫的名声，竟推说他在同穆斯林共产党员打交道时使用了暴力，可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合并基发的计划仍按塔什干所安排的那样进行着。苏维埃基发红军的政治部担负着基发的党的工作，替代了民族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最后在1921年3月14日晚上推翻了由基发青年组织主持的政府。政府成员逃进沙漠，投到他们过去的敌人朱耐德-可汗那里去了。苏维埃人建立了一个新的、更为驯顺的基发政府。接着便进行清党。在两千名党员中，只有六十名被判定足够可靠，可以保持党证。共和国的名称从人民共和国改为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全部合并的路道上又前进了重要的一步^①。

基发事变的结果加剧了布哈拉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人的反抗。吉萨尔的洛开谷地变成了新的巴斯马奇暴动的温床。一名本地乌兹别克部族的成员易卜拉辛-贝克组成了巴斯马奇的主力部队。在塔皮克山区和费尔干纳谷地，新的巴斯马奇首领纷纷起事(库尔-希尔马特、拉赫曼-达特霍、哈尔-霍佳、

^① 穆罕默德伯德耶夫：《为花刺子模人民革命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第200—224页以下及251—256页。

努尔马特-阿利等等)。穆斯林民族主义暴动的旗帜又飘扬在中亚细亚上空。

苏维埃人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步骤来制止叛乱的蔓延。红军总司令卡缅涅夫来到中亚，制订了针对巴斯马奇的作战计划。1922年1月，布哈拉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一个在该地区拥有全权的、处理东布哈拉事务的非常专政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直到1924年5月28日才停止执行权力。同时，莫斯科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土尔克斯坦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布哈拉局势的材料。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斯大林(当时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齐契林(外交事务人民委员)和古比雪夫(从中亚来到莫斯科)。他们很快采取了行动。

2月间，布哈拉共产党已被置于俄国共产党的控制下。布哈拉、费尔干纳和土尔克斯坦其他地区的一切反巴斯马奇行动都统一起来了。早已从基发被驱逐出去的瓦利道夫以及其他巴什基尔和鞑靼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都被赶出布哈拉^②。

布哈拉青年组织中的民族共产主义，就像当年基发青年组织中的民族共产主义一样强烈。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新组成的卫星政府一方面对推翻了埃米儿的封建政权感到满意，而另一方面又怀有想从俄国人手中多得到一点独立的民族主义愿望，因而烦恼不已。在这时候，土耳其的已垮台的青年土耳其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在莫斯科的唆使下被派到了布哈拉。他是前苏丹的女婿、陆军将军、革命者和冒险家。他于1921年

^① M. Irkaev, W. Nikolaev, Ia. Sharapov: Ocherki Istorii Sovetskogo Tadzhikistana (1917—1957) (伊尔卡耶夫、尼古拉耶夫、夏拉波夫合著：《苏维埃塔吉克斯坦史纲〔1917—1957〕》，Stalinabad: Tadzhik Gosizdat, 1957, pp. 77—79.

^② 《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和法权的历史》，第162页。

11月8日到达，仔细研究了当地的形势后，不久就决定改变立场。恩维尔离开了他以前的苏维埃朋友们，找到了埃米儿，并被任命为他的（或者不如说，巴斯马奇的）作战部队的总司令。在那时候，巴斯马奇正在接连获胜。2月间，一位前布哈拉青年组织的成员、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乌斯曼·霍扎带着六百名人员来到了狄乌向姆贝。由于对苏维埃政策不满，他同巴斯马奇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占领了这个城镇，击败了为疟疾所困扰的⁵⁷苏维埃警卫队。布哈拉的陆军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也投到了巴斯马奇一边。巴斯马奇的力量在1921年12月时已达两万人之众，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他们还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①。穆斯林的民族主义鼓动甚至已蔓延到了塔什干。12月间，苏维埃人逮捕了非法的穆斯林全国联盟委员会，这个组织自从2月以来就在塔什干活动，其首领是塔什干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②。

巴斯马奇部队同苏俄部队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像在俄国那样的共产党人同反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俄国人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巴斯马奇虽然在初期曾同反共的俄国人集团结过几次短期的机会主义的同盟，毕竟是一个本地土尔克斯坦穆斯林的运动。相反地，同巴斯马奇作战的苏维埃军队却是俄罗斯国籍的母国的军队（其中只有少数乌克兰人和鞑靼人）。本地的土尔克斯坦士兵人数很少，他们所占的比例，比阿尔及利亚的法

① A. Briskin: *Strana Tadzhikov* (布列斯金:《塔吉克人的国家》),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pp. 37—38.

② A. Kh. Babakhodzhaev: *Proval aggressivnoi politiki angliiskogo imperializma v Srednoi Azii 1917—1920 g.* (巴巴霍德查也夫:《英帝国主义1917年至1920年对中亚侵略政策的破产》), Tashkent: izd. Akademii Nauk UzSSR, 1955, p. 142.

国军队中的穆斯林所占的比例还小。在1927年时，乌兹别克人占不到百分之五，而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其他本地人加在一起还不到这个比例^①。即使是这样小的百分比，也还是在1926年作了一次巨大的努力，建立了一些本地土尔克斯坦人的苏维埃队伍之后，才达到的。从1920年到1926年，正当暴动的严重年代，土尔克斯坦红军中本地士兵所占的百分比就更微不足道了。

1922年的春季，暴动发展到了高潮。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乌斯曼·霍扎叛变之后，就由费祖拉·霍德查耶夫和阿里福夫来领导。前者过去曾参加过1918年柯列索夫进攻布哈拉的远征队；后者是个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愿意抱着坚定的决心去同巴斯马奇作战。随着巴斯马奇力量的增长以及穆斯林共产党人中间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出现，面对着这种情况的苏维埃人的处境便越来越危险了。布哈拉的卫星政府被迫要求俄国立立即给予军事援助^②。

2月间，由慕拉·阿布杜尔-卡哈尔率领的一支强大的巴斯马奇部队在布哈拉附近发动暴动，危及了布哈拉城的安全^③。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危险局势，苏维埃人决定采取果断措施。3月间，他们的军事努力全部重新改组了。在东布哈拉建立了一

① Vtoroi Vseuzbekskaia s'ezd Sovetov ... Stenograficheskaia otchet (《第二届全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Tashkent: TsIK Sovetov UzSSR, 1927, p. 131.

② A. Listovskii: Boevye zapiski (iz dnevnika budenovtca) (李斯托夫斯基:《战时札记〔摘自布琼尼军团战士日记〕》), Moscow: Ogiz Molodaia, Gvardia, 1934, p. 7.

③ Vasilevskii: "Fazy basmacheskogo dvizheniia v Srednoi Azii" (瓦西列夫斯基:《中亚的巴斯马奇运动时期》), Novyi Vostok, Vol. 29, 1930, p. 134.

支特别的反巴斯马奇部队。一个步兵旅加上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加上一个骑兵团，还包括辅助部队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的部队都在内。5月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成了一个中亚局来统筹土尔克斯坦、布哈拉和基发等地的共产党的行动。一位原籍格鲁吉亚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于5月间从莫斯科来到布哈拉，他尖锐地谴责了布哈拉卫星政府的犹疑不决的政策^①。红军总司令卡缅涅夫统一筹划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久，苏维埃军队就开向易卜拉辛-贝克和恩维尔·帕夏的巴斯马奇主力部队。

在巴斯马奇这一方，领导人之间很不一致。易卜拉辛-贝克因妒忌埃米儿对恩维尔的宠信而同恩维尔决裂了。另一名重要的巴斯马奇领导人费祖拉·马克苏姆也采取了同一行动。结果，苏维埃军队重新占领了狄乌向姆贝，并进一步向叛军进击。1922年8月4日，恩维尔在一次不重要的战斗中阵亡。新司令塞林·帕夏是个土耳其人，并且是恩维尔的朋友，他是由在喀布尔召开的巴斯马奇会议选任出来^②并获埃米儿批准的。可是许多巴斯马奇领导人都不承认他（因此就未能把巴斯马奇运动团⁵⁹团结起来），他就在皮安集河中自杀了。同时，一名巴斯马奇恐怖分子在1922年7月7日企图谋害布哈拉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费祖拉·霍德查耶夫，但是没有成功^③。

① Sh. Z. Urazaev: *Turkestanskaia ASSR i ee gosudarstvenno-pravovye osobennosti* (乌拉扎也夫:《土尔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它的国家-法律特征》), Tashkent: Gosizdat UzSSR, 1958, pp.146—147.

② M. N.: "Pod znakom islama" (M. N.: 《在伊斯兰教的标志下》), *Novyi Vostok*, № 4, 1923, p. 93.

③ D. Soloveichik: "Revoliutsionnaia Bukhara" (索洛维契克:《革命的布哈拉》), *Novyi Vostok*, № 2, 1922, p. 287.

苏维埃人的攻势并不限于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的乌兹别克队伍和吉尔吉斯队伍之间的内部斗争削弱了巴斯马奇运动。有几次,在苏维埃军队进攻乌兹别克巴斯马奇时,吉尔吉斯的首领牟埃特丁不动手保持“中立”。11月间,乌兹别克巴斯马奇在这一地区的最高领袖库尔-希尔马特离开费尔干纳来到阿富汗,而把正式指挥权留给了他的吉尔吉斯对手牟埃特丁。这个想把相互竞争的巴斯马奇集团统一起来的企图也失败了。在牟埃特丁和对这一安排不满的乌兹别克首领伊斯雷尔之间,爆发了新的争吵。1922年1月,库尔-希尔马特从阿富汗回来,试图团结这一运动,可是又失败了。牟埃特丁在7月里被苏维埃部队击败,此后吉尔吉斯的巴斯马奇集团便开始投降。孤孤单单的乌兹别克巴斯马奇队伍也很快就失势。库尔-希尔马特逃到了阿富汗。这一地区的巴斯马奇的人数减少到两千名^①。

苏维埃当局终于明白,军事措施应该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结合起来。1922年5月26日,塔什干暂时在费尔干纳谷地重新设立了“喀齐”宗教法庭,并发还了过去为穆斯林宗教团体(“瓦克夫斯”)所有的土地。同时,费尔干纳的捐税减为一半^②,粮食供应品也运到了这里。1921年夏季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开明措施以及盼望已久的土地改革和河道改革都已开始见效。饱尝暴动风霜的农民希望能够劳动^③。1923年最初九个月内,巴斯马奇单在费尔干纳谷地一地就丧失了三千五百人以上。此外,乌兹别克巴斯马奇和吉尔吉斯巴斯马奇之间的关系仍未改善。大赦令的发布吸引了很多人。7月间,卡缅涅夫

①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第195—198页。

② 《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和法权的历史》,第74—80页。

③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第199页。

在检阅当地的苏维埃部队时宣称，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运动不久即可击溃^①。然而，他并不想在对付剩下的巴斯马奇据点时图侥幸而下令大量利用飞机^②。

在恩维尔和塞林逝世以后，易卜拉辛-贝克重新确立了他在塔吉克斯坦的巴斯马奇中间的最高地位，可是这已经太晚了。巴斯马奇部队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虽然易卜拉辛-贝克据着最高的位置，可是巴斯马奇的领袖中间依旧是分裂的。布哈拉领土上的梅其山区的据点被一支强大的苏维埃突击部队铲除掉了(1923年3月)。7月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首脑茹德祖塔克访问了布哈拉，敦促进一步加紧反巴斯马奇行动。

萨马尔罕-布哈拉地区的巴斯马奇运动已接近复灭。巴斯马奇只有在花刺子模的沙漠地带还有可能聚集较多的兵力。1924年1月，朱耐德-可汗率领的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进袭了基发，但是被击退了^③。这是巴斯马奇在中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

到了1925年，巴斯马奇起义的中心塔吉克斯坦遭到了毁灭。二十多万居民早已逃到阿富汗，遗下三分之二的可耕地无人耕种。在比较波及较少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荒废了^④。

① 凯尔迪也夫：《粉碎土尔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费尔干纳州和萨马尔罕州的反革命〔1918—22〕》，第121页。

② 金斯堡：《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第200页。

③ Anatolii Maier (ed): *Boevye epizody Basmachestva v Fergane i Khorezme* (阿那托利·迈耶尔编：《费尔干纳和花刺子模的巴斯马奇叛乱战事片断》)，Moscow-Tashkent: Gosizdat, 1934, pp. 65, 73.

④ 布列斯金：《塔吉克人的国家》，第44—46页。

易卜拉辛-贝克在 1925 年还企图卷土重来，可是国家元气业已丧尽，人民已疲弊不堪，难以继续进行那种显然毫无希望的反抗了。农民们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和平。塔吉克斯坦的巴斯马奇部队从五十七个集团、一千三百七十人锐减至二十九个集团、六百五十九人了（1926 年春天）^①。拖迟了很久的土地改革终于 1924 年在塔吉克斯坦进行了，开始收到了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效果。在塔吉克斯坦创立了共产党组织，巩固了苏维埃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的事实。在 1926 年的战役之后，苏维埃当局终于有可能裁减从事扫荡行动的部队人员了^②。分散成零碎队伍之后，许多巴斯马奇分子还在利用依然有效的苏维埃大赦的机会^③。他们的领袖们，易卜拉辛-贝克、库芒姆-贝克等人都逃到了阿富汗。到了 1927 年，塔吉克斯坦的巴斯马奇部队又进一步地减少了，不过若干小股人马仍在活动，而且一名巴斯马奇首领拉赫曼仍在边界的那一边指挥活动^④。

1928 年时，连朱耐德-可汗也被迫逃往阿富汗去了。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马克苏姆把对毫无希望的斗争表示厌倦的农民们诱导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约有三万三千名农民（从二十万难民中间）离开阿富汗回到了塔吉克斯坦^⑤。新到的俄国骑兵部队又在乡间粉碎了巴斯马奇的残余部队^⑥。

① Pervyi Vseuzbekskskii s'ezd sovetov ... Stenograficheskiy otchet («第一届全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 Tashkent, TsIK UzSSR, Feb. 1925, p. 27.

② 《第二届全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pp. 21, 51, 53.

③ 《第一届全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pp. 106—107.

④ 《第二届全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报告》，p. 86.

⑤ 布列斯金：《塔吉克人的国家》，第 60 页。

⑥ Hizard Wraga: Sowietkie republiki srodkowo-azjatyckie (里萨

1929年，当苏维埃强迫心里不愿意的农民集体化时，几乎濒于死亡的巴斯马奇运动又得到了复苏。易卜拉辛-贝克本人于1931年6月为苏维埃军队所获，可是巴斯马奇集团的残余分子，这时差不多都沦为匪帮，直到1933年才消亡^①。经过几年时起时伏的斗争，一切军事抵抗的痕迹被消除无遗了。当地的本地人民最后终于被压服了；中亚细亚建立起了苏维埃的和平。

第四章 经济生活

63

集体化和畜牧业

十月革命之后，中亚细亚的经济出现了完全紊乱的局面，许多地区的生产下降到革命前水平的百分之二十^②。然而，尽管巴斯马奇暴动连绵不断，新经济政策的开明措施却刺激了经济的恢复^③。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实行了两次农业改革。第一次包括没收土地和水利权，它们原来属于当地的“巴依斯”（地主）所有，现在分配给了“德克哈恩”（穆斯林农民）。这一改革从1921年开始，1925年至1927年又扩大了范围，但是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可是它却受到本地农民群众的欣然欢迎。到了1927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了农民合作社，或称“柯希其”联合会，把百分之六十的农户都组织了进去。这些合作社

德·符拉加：《中亚苏维埃共和国》，Rome: Biblioteka Orla Bialego, 1945, p. 92.

① T. B. Ryskulov: Kirgizstan (雷斯库洛夫：《吉尔吉斯斯坦》，Moscow: Ogiz, Sotsegiz, 1935, p. 67.

② 《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和法权的历史》，第23页。

③ 《哈萨克斯坦》，第129页。

帮助农村人口购买必需的农具和销售他们的农产品^①。这一阶段的经济稳定到1929年又被因集体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革命所打破。定居下来的农民受到了要他们参加集体农庄的压力。牧民们也被迫定居并参加集体农庄。过去获得成功的农民合作社被抛弃了。一位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美国技术人员报道说：

当共产党的突击队着手驱散那些牛群，并向牧民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把自己的牲口合并到所谓的集体农庄里去时，牧民们干脆把他们的牲口宰了。……经过了这个时期还活下来的以前的牧民们都被赶在一起，就像对待富农那样。……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对剥夺进行了反抗；这些人被判决为犯罪分子，被关进监狱或遭枪决^②。

在这场斗争中，该地区的牲口遭到重大死亡。农民和牧民们宰杀了几百万头牲口；在这场纷乱中死亡的还有好几百万头（见下页表一）。哈萨克斯坦耕作地区的小麦产量从一般每公顷产五点七到六点三生特纳（重量名，等于五十公斤），1931年下降到四生特纳，1932年下降到四点四生特纳^③。当局指控说这些困难是“反革命分子”、“巴依斯”（地主）、巴斯马奇以及其他传统上的黑色人物所造成的。数十名本地的共产党员因软弱和懈怠而被免职。其他一些则因为反对强迫集体化而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遭到处决。尽管有这些麻烦，大部分私人农业在

① S. Dimanshtein: "Desiat let natsionalnoi politiki partii i sov-vlasti" (狄曼希坦：《党的民族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十年》)，Novyi Vostok, №19 1927, p. 18.

② John D. Littlepage: In Search of Soviet Gold(约翰·立特尔配奇：《探索苏维埃黄金》)，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8, pp. 108—109.

③ 《哈萨克斯坦》，努尔佩索夫(Nurpeisov)作序，Moscow: Sotsegiz, 1936, p. 150.

1929年至1932年之间还是集体化了,从而使乌兹别克斯坦的集体化土地从1928年至1929年只占百分之一二增加到1932年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一,1937年占百分之九十五;在哈萨克斯坦则是从1928年只占百分之二点七增加到1935年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三^①。中亚其他地区亦随之增加^②。

65

表一 中亚的牲口
(以千头计,不包括猪)

	集体化			
	1929	(1929—1932)	1932—33	1960
哈萨克斯坦 ^a	36,000	?	5,029	33,633
中亚本部	23,151 ^b	?	9,120 ^c	24,623 ^d

a. 辑自《哈萨克斯坦》,第132页;芬桑·蒙戴伊著《论苏联的伊斯兰教》,载《伊斯兰研究评论》第20卷(1952年)第34页;“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苏联卷,第1850页,以及《从数字看苏联——统计手册》(莫斯科国家统计局出版社,1960年版),第157页。

b. 《哈萨克斯坦》,第150页;T. R. 雷斯库洛夫著《哈萨克斯坦》(莫斯科国家联合出版社,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5年),第101页;“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见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版,第9卷,第32页,第106页;腊克姆巴巴也夫,见上引书,第74页。

c. 法国全国经济研究及统计学会,研究及文献部编,《苏维埃亚洲》(巴黎,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187页。

d. 《从数字看苏联》,见上引出处。

1942年,苏维埃当局允许过去喂养牲口的牧民恢复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做更适应当地的土壤条件,但是却毫不考虑

① General Paul Tubert: L'Ouzbekistan, république soviétique (保罗·杜贝尔将军:《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 Paris: Editions du Pavillon, 1951, pp. 42—43;《哈萨克斯坦》,同上, p. 149.

② T. R. Rakhimbabaev: Tadzhikistan (腊克姆巴巴也夫:《塔吉克斯坦》), Moscow: Sotsegiz, 1936, p. 50; 雷斯库洛夫:《吉尔吉斯坦》,第89页; M. Belocki: Kirgizskaia Respublika (贝洛茨基:《吉尔吉斯共和国》), Moscow: Sotsegiz, 1936, p. 37.

从集体农庄制度后退的问题。前面的表格为集体化对中亚非灌溉地的传统畜牧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幅清楚的图画。

棉花和粮食

自革命前的岁月起,中亚一直是苏联的主要产棉区,生产着苏联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的棉花。棉花生长在灌溉地上,生长在谷地和绿洲。产棉地的中心在费尔干纳谷地。

苏维埃人对沙皇的中亚经济政策所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便是后者把这个地区变成了“俄国的棉业盲肠”(列宁)。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也是发展棉花生产而牺牲粮食生产^①,可是事实上,苏维埃政府一直遵循着同样的政策。这可以从表二和表三看出来。这两个表格表明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和粮食耕种情况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共和国生产着中亚全部棉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表二 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和粮食*

耕种面积(以千公顷计)

作物	1913	1938	1950	1957	1961
棉花	423.5	917.2	955	1,347	1,446
全部谷物	1,521	1,452.7	1,371	1,010	1,019
稻子	161	80.4	52.8	50(1956)	

* 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55卷,第635页,和苏联卷,第1840页;《从数字看苏联——统计手册》(莫斯科国家统计局出版社,1958年版),第213页,第236—237页;《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统计手册》(塔什干,1957年),第77页;苏联大百科全书年鉴,1961年版,第155页;《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1962年),第324页,第332页。

① H. Seton-Watson: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休·西顿·华生:《苏维埃民族政策》),The Russian Review, Vol. XV (№1, Jan. 1956), p. 9.

棉田的增加同粮田的减少,尤其是稻田的减少密切相关,虽然大米是当地的主要食粮。这种人为的缺乏大米特别在战争年代中感觉得明显。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前乌兹别克政府首脑费祖拉·霍德查耶夫曾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苏维埃的棉花政策:

我们是这样制订经济计划的,那就是要少种些棉花,因为这一经济作物比任何其他作物更把乌兹别克斯坦束缚在苏联身上;其次,我们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农业以便扩大粮食耕种……目的是为了要不依靠俄国的粮食^①。

霍德查耶夫和若干名据料想持有同样意见的当地领袖都被清除掉了。棉花政策彻头彻尾地获得了胜利,中亚的经济“全面地、彻底地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之中^②”。

苏维埃的计划制订者一方面在中亚牺牲粮食而增加棉花生产,另一方面一直在大力促进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西伯利亚类型黑土地带发展粮食生产。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一政策更得到了促进。尽管气候条件不利(生长季节: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一天;7月份平均气温:摄氏三十度以上;6月份平均气温:摄氏四十度以下),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是被派来耕种这一地带^③。其他地方,耕种只限于在谷地和绿洲进行,因为整个地

① USSR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Justice, *Anti-Soviet Bloc of Rightists and Trotskyites (Report of Court Proceedings)*, verbatim report (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右翼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维埃集团[法庭纪录报告],逐字报告》), Moscow, 1938, pp. 223—224.

② Paul B. Hen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to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保罗·亨泽:《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亚经济发展》),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XXVII (1950), p. 47.

③ Nestor Korol, "The So-Called Virgin Lands of Kazakhstan" (奈斯特·考罗尔:《哈萨克斯坦的所谓处女地》), *Marquette University Slavic Institute Papers*, №14 (1962), pp. 10, 17.

区约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是沙漠。下面的表格表明了中亚的粮食和棉花生产的发展情况。

67

表三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棉花和粮食生产

(以千吨计)*

粮 食	1913	1940	1961	占 1961 年苏联总产量的 百分比
哈萨克斯坦	2,162	2,516	14,672	10.7
中亚本部	1,822	1,637	1,242	0.9
棉 花				
哈萨克斯坦	15	94	216	4.8
中亚本部	646	1,864	4,029	89.1

* 《从1959年的数字看苏联》(莫斯科, 1960年)和《从1961年的数字看苏联》(莫斯科, 1962年)。1959年苏联的人口总数中, 中亚本上的人口占6.55%,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占4.35%。

中亚还盛产丝绸、水果和羔皮。仅仅乌兹别克共和国就是苏联最大的干果产地, 并且生产着全苏联一半的丝织品。

工 业

中亚的工业是近来才发展的。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 中亚纯粹是个农业和畜牧业地区, 只有少量轧棉厂和缫丝厂(见第一章, 第十五页)。苏维埃的五年计划以及几个大工业企业在战时撤退到中亚, 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哈萨克斯坦现在生产着全苏联铅产量的四分之三, 锌和铜产量的五分之二。吉尔吉斯坦是苏联首要的水银产地, 而乌兹别克斯坦在化学肥料方面占第三位。狄乌向姆贝(塔吉克斯坦)北部有着全苏最大的萤石矿藏。许多地方都发现了稀有金属, 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也有了发展。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周围地区是个重要工业中心, 生产着农业机械、化学制品和钢铁。土库曼尼斯坦的克拉斯

诺伏斯克地区开出了石油(占中亚石油产量的一半); 哈萨克斯坦的古耶夫地区和阿克秋宾斯克地区也开出了石油。在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卡拉甘达和埃基巴斯杜兹地区都开采了煤矿。下面的表格表明了中亚工业的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况。

表四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工业产量*

	1913	1928	1940	1945	1961	约占1961年 苏联产量的 百分比
钢 ^a (以千吨计)	—	—	11	25	630	0.9
煤 ^b (以千吨计)	131	228	1,689	1,319	43,121	8.5
石油 ^c (以千吨计)	260	286	1,433	1,914	9,952	6.0
水泥 ^d (以千吨计)	—	19	267	104	4,392	8.5
发电量 ^e (以百万千瓦小时计)	7	42	1,310	2,578	21,168	6.5

* 《从1961年的数字看苏联》(莫斯科, 1962年), 以及1958年的同书。并见《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统计手册》, 阿拉木图, 1957年; 《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政权四十年——统计手册》(塔什干, 1957年)。

^a 1961年时, 乌兹别克斯坦为313.4, 哈萨克斯坦为316.8。

^b 迄至五十年代, 在吉尔吉斯坦超过四分之三; 1961年哈萨克斯坦为34,579。

^c 1913年时, 土库曼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各半。1928年时土库曼石油产量停滞; 四十年代时的产量由哈萨克斯坦、土库曼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摊(按重要性顺序); 1961年时, 土库曼尼斯坦为6,100, 哈萨克斯坦为1,700, 乌兹别克斯坦为1,705。

^d 迄至五十年代, 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生产。1961年时, 哈萨克斯坦为2,591; 乌兹别克斯坦为1,199。

^e 四十年代时主要由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摊, 其他地方产量极少。1961年时, 哈萨克斯坦为11,524; 乌兹别克斯坦为6,750。尽管有此进展, 1959年时, 乌兹别克斯坦的集体农庄只有35%有电力(1950年时只有15%)。

战争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乌兹别克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亚远离前线,因而甚至连空袭都没有遭到。然而,战争的情况仍对这一地区各个方面的生活产生了尽管是间接的,却是压倒一切的影响。

根据苏联方面的资料,乌兹别克斯坦一地在1940年已经有了一千四百四十五个大型工业企业。在战争年代中有二百八十个新企业投入生产,其中包括这些巨大的工业,如齐尔契克氮肥工厂的第二、第三部分,乌兹别克钢铁工厂的一号平炉,乌兹别克冶金工厂,以及巨大的水电站、化工厂、金属加工厂、罐头工厂、制糖厂、纺织工厂和丝绸缫织厂。从俄国欧洲部分迁来的大企业有一百个以上。恩格斯机器制造厂从列宁格勒撤来;“电力机床制造厂”、“电缆厂”和“升降机厂”则迁自莫斯科;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则迁自罗斯托夫,还有一些其他大工厂来自其他城市。这些迁移加上当地的新建设,结果便使乌兹别克工业的结构有了剧烈的改变,重工业在国家的工业产量中占了主要成分(1943年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在1940年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①。

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了这一地区。有些是为了躲避德军的追击自己逃来的。其他一些,如波兰人,则是从西伯利亚集中营

① 卡利·尼亚卓夫,同上; Sh. N. Ulmashbaev: Promyshlennoe razvitie sovetского Uzbekistana, Istoriko-ekonomicheskii ocherk (乌尔马许巴也夫:《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发展,历史-经济概要》), Tashkent: Gosizdat Uzbekskoi SSR, 1958, pp. 165, 168; Zh. Kalymbetov: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Uzbekistana v borbe za razvitie promyshlennosti(1941—1945 gg.)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1941—1945年]), Tashkent: Gosizdat Uzbekskoi SSR, 1958, p. 26.

中释放出来的。绝大多数新到的人都流入城市。结果是许多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萨马尔罕是个十五万人口的城市，它此外⁷⁰又吸收了十五万。塔什干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从1939年的五十八万五千人增加到1944年的约一百万人^①。在和平时期就已十分简陋的住房和卫生条件，变得更坏了。传染病在成群成簇的营养不良的人民中传布开。地方当局忙于应付诸如战时经济所要求的当务之急、难民的涌入、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人力的不足以及由于整个局势而产生的一连串其他事情。占首要地位的生产目标要不计代价地去推进，较为次要的项目的生产就被忽略或搁在一边了。结果是，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乌兹别克工业的总产量几乎原封未动。

动员令使中亚丧失了够用的劳动力。为了补救这种局势，消费品和其他“和平时期工业”开始解雇一部分雇员^②。莫斯科颁布了法令，允许地方当局在必要时重新安置这类雇员。一切年龄在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男人和一切年龄在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妇女都成了征用劳动力的对象。某些大工厂建立了十二小时工作日制，并称之为“最适宜的劳动日”。其他某些工厂则实行每周七天工作制。在1940年至1943年之间，乌兹别克斯坦的产业工人的人数从十二万九千一百人增加到十八万七千二百人，而其中女工的百分比则从三十四点一增加到六十三点五^③。这意味着男工的人数已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以上，而由

^① Henry A. Wallace: Soviet Asia Mission (亨利·华莱士：《苏维埃亚洲之行》，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6, p. 104.

^② Narodnoe khoziaistvo Uzbekskoi SSR (《乌兹别克共和国国民经济》), pp. 139—140.

^③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10, 16, 81—83, 86页。

妇女代替了工厂中大多数男工的工作。撤退来的工厂被拨给了约十万名本地的工人,使得原来的工业在 1943 年只拥有八万七千名工人,即只及战前名額的三分之二。

71 首都塔什干及附近地区的工业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尤其是那些巨大的、生产战争物资的撤退来的企业),可是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其他地区的工业活动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到了 1945 年已下降到只及战前水平的一半至四分之三^①。在萨马尔罕地区,冶金工业增加了三倍半,可是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却减少了一半,总的工业活动下降了四分之一^②。战争以前,中亚(哈萨克斯坦除外)是从俄国进口粮食和各种消费品的。在战争期间,它被迫全部依靠自己的食粮生产。由于苏维埃政府一向就在该地区强调增加棉花生产而牺牲粮食生产,因此要粮食自给就特别困难。然而,在战争年代中,事态的进展迫使苏维埃当局尽一切力量使乌兹别克斯坦完全不依赖俄国的和西伯利亚的粮食^③。还不止于此,乌兹别克斯坦还得供养新来的难民群众,此外还得完成莫斯科强派的不断增长的粮食输送定額^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在乌兹别克斯坦增加种植粮食土地数量达五十万公顷,把粮食增产二倍半至三倍^⑤。可是,这些决定并未

① 《乌兹别克共和国国民经济》第 32 页提供了下列 1945 年的数字:(1940=100)塔什干市—201,州:塔什干—148,纳曼干—49,安集延—80,萨马尔罕—76,卡希卡河—58,花刺子模—49,卡拉·卡尔巴克自治共和国—53。

② Samarkand. Statisticheskoe upravlenie, Narodnoe Khoziaistvo Samarkandskoi oblasti. Statisticheskii sbornik (萨马尔罕.统计局:《萨马尔罕州国民经济—统计手册》), Samarkand, 1958, p. 13.

③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 95—96 页。

④ Istorii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苏共党史》),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9, p. 545.

⑤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 95—96 页。

兑现，而食物生产继续下降；从1940年到1945年，蔬菜油的生产从十四万二千吨降到四万一千吨；酒从一千九百二十八万公升降到六百三十四万公升；发面饼从一万三千吨降到四千九百吨。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也可能下降了，因为在战争结束五年之后（1950年），它们的产量仍只有1940年水平的三分之二。缺乏粮食和蔬菜产量的统计以及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土地的减少，都暗示着情况更加糟糕^①。

极不稳定的农业局势由于大规模动员农民去建筑巨大的水电坝而变得更糟了。单是那巨大的法尔哈德水电工程就在1943年2月雇用了七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②。

食物和消费品的缺乏导致了通货膨胀。在1942年，面包的黑市价格暴涨到约五十卢布一磅，而官价只是四十戈比。蔬菜的价格上涨了几十倍。肉类和黄油上涨了二十倍，衣服涨了十至二十倍。一个普通雇员每月的工资仍冻结在战前水平上，只够维持几天标准以下的生活。国营食品店的价格也冻结了，可是没有配售证什么也买不到，有配售证也只能买到一定限量的面包，很少能买到其他食物。普通公民不得不在集体农庄的市场上购买食物，在黑市购买衣服。唯一可能的活命办法是除了正式薪金之外还得想法赚些钱。要做到这一点，对绝大多数工人和职员来讲，只有盗卖公共财产，做黑市买卖，或者贪污。

工厂厂长和公司经理不得不让工人们“取走”一些企业所生产的或分配的货物，因为工人们单靠微薄的薪金不可能生活或生产。侵占公物的程度按各个企业、当地条件和个人地位而各

^① 《乌兹别克共和国国民经济》，第53, 55, 56, 76, 77页。菜田从1940年的38,600公顷减少到1950年的22,600公顷。

^② Pravda Vostoka (《东方真理报》)，1943年4月29日。

有不同。合作化企业中的手艺人、卡车司机、食品销售员，或仓库管理员都有着比较好的赚钱位置。簿记员、会计员和各种检验员一般也都能分沾到一点儿。各种企业、工厂、公司和合作社的经理和厂长依然是处于最优越的位置上，他们能比任何人捞到更多的钱，而且，他们还能够进入专为党的特权经济人物所准备的特种商店。国防工厂中的工人也都由他们自己的特种商店供应，可是比起特权集团来供应范围很有限。所有其他企业的工厂工人和公司职员都生活较差；他们仅仅能活命而已。由于实际上每个雇员都干了犯法的行为，国家差不多可以以“公正的理由”把任何人送到法庭去。

集体农庄农民似乎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受惠者。他们忙于以高价出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以及作为偿付他们劳动的报酬所获得的产品。集体农庄的主席和其他农村显赫人物都大发其财。人们可以在一些当地农村的大街上看到他们穿着由波兰或俄国难民贩运来的怪形怪状的欧洲服装。可是对集体农庄的普通庄员来讲，这种颇为反常的繁荣并未持久。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久就被动员参军、投入劳动战线或是参加正在施工中的许多水电工程。剩下来的人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必须比过去工作得更卖力气而报酬却比较少。战争结束后两年（1947年12月），旧卢布以十比一的比率兑换成了新卢布，这一来把集体农民在通货膨胀时期所获得的好处都剥夺去了。

第五章 移民

苏维埃中亚细亚的面积约等于美国的一半。在十月革命的

时候,那里有二百多万人民是属于斯拉夫血统的,本地人约有一千二百万(绝大多数是正统穆斯林),分属于好几个族别: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尔巴克、维吾尔、库兰马、邓干、沙特-卡尔慕克、杰姆席德、查沙拉、布哈拉犹太人、山地伊朗部族等等。在这些土生的族别之中,只有前五种人数最多: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各有三百五十万以上,而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则都不到一百万。塔吉克人属于伊朗种族集团。其他四个都属于土耳其族,他们讲的语言也与土耳其语有亲属关系。

斯拉夫人口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草原地区北部与西伯利亚接壤的地带、谢米列奇耶的黑土地带以及塔什干地区。移民中间约有半数相对说来是新来的人,他们是在1906年以后随着斯托雷平的“处女地计划”来到的^①。

十月革命以后和二十年代初期,俄国对中亚的殖民化暂时停止了。可是在1928年以后,斯拉夫人(绝大多数是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殖民行动又恢复了。到了1936年已有一百七十万新移民迁入了这一地区: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有七十八万六千人;迁入土库曼尼斯坦的有十五万六千人;迁入吉尔吉斯坦的有二十九万人;迁入塔吉克斯坦(不算哈萨克斯坦)的有二十万零二千人^②。到了1939年,斯拉夫人占当地主要城市塔什干的人口 77

① Richard E. Pipes: "The Soviet Impact on Central Asia" (理查·派普斯:《苏联对中亚的冲击》),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VI, № 2 (1957), p. 28.

② S. S. Balzak, V. F. Vasiutin, Ya. G. Feigin: Ekonomicheskaja geografiia SSSR(巴尔扎克、瓦秀金、费金:《苏联经济地理》),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Institut Ekonomiki, 1940, Vol. I, p. 152.

的一半^①。虽然许多新来的人是由于他们的民族血统而被苏维埃政权认为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危险人物，作为犯人流放到中亚来的，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替苏俄在中亚推行殖民政策的角色。对于非俄罗斯族的新来者也是这样，因为许多本地人无法辨别哪些是俄国人，哪些是属于欧洲其他民族血统的人。而后者，在另一方面，在当地条件的影响下，不久也养成了一种同俄国人共同结成的“欧洲团结感”，同本地人对立起来。

1941年德国人侵入俄国又引起了另一阵新来者的浪潮：内撤企业的职工及家属，德军占领区的难民，以及西伯利亚苏维埃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波兰公民^②。

新来者中的大多数在战后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留下来的那些人又使苏维埃中亚所有共和国都增加了非本地人的比例。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战时人口流动的结果，某些过去的本地城市变得非常俄国化了。从最近的统计数字中举个例子看看，在萨马尔罕市，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一共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而俄国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却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九。朝鲜人占百分之一点四；其他（或许多数是俄国和布哈拉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等）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③。萨马尔罕市长夏基罗夫在接见1958年访问俄

① 派普斯：《苏联对中亚的冲击》，第29页。

② 在1939—1940年苏联占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期间，那里的波兰人会遭到逮捕并被作为“不可靠分子”放逐到西伯利亚。直至德国进攻了俄国，苏波关系（在伦敦）恢复之后，他们才被释放。

③ Samarkand. Kratskii spravochnik—putevoditel（萨马尔罕。《简明手册—指南》），乌姆尼亚科夫（I. I. Umniakov）等编制。Tashkent: Gosizdat Uzbekskoi SSR, 1956, p. 66.

国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时，感到有必要隐瞒一下眼前的局面，而说俄国人只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二^①。

对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和民族集团，在战时及战后继续进行着新的放逐。这里包括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 78 鞑人、捷庆人、波罗的海各国的居民以及其他入等。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处女地计划”又形成了一股最新的移民浪潮，其中有六十万名以上的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新来者被指派到北哈萨克斯坦和南哈萨克斯坦的黑土地带^②。这除了苏维埃当局所强调的经济动机之外，另一种可能的想法或许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想在本世纪末预料中国人口问题爆炸以前就把这个地区住满了人。这一行动是按照传统的俄国移民政策进行的，它形成了一股“潮流渗透到和散漫在人口最稀少的区域^③”。

从人口学的观点看来，接二连三的自愿的或非自愿的殖民化浪潮已使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的原来的民族成分有了重大的改变。欧洲血统的民族总数（包括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犹太人等等）已超过了当地任何一个本地民族集团的人数。从对当地人口的比例关系来看，苏维埃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欧洲人已超过了譬如南非联邦或阿尔及利亚的

① Robert C. Tucker, "Impressions of Russia in 1958. A Trip Report" (罗伯特·特克：《1958年的俄国印象。——旅行报告》), A Rand Corp. Paper, 1958, p. 43.

② P. Alampiev, Soviet Kazakhstan (阿伦姆皮也夫：《苏维埃哈萨克斯坦》),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8, p. 71.

③ Richard Pipes, Moslems of Soviet Central Asia: Trends and Prospects (理查·派普斯：《苏维埃中亚的穆斯林——趋向和展望》),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4, p. 6.

欧洲人。欧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1959年普查),在哈萨克斯坦是百分之六十五,在苏维埃中亚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在南非联邦,欧洲血统的人民只占百分之二十一,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前)只占百分之十四。俄国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移民的如此迅速,使得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大大低估了它进展的程度^①。

表五是以对苏联1926年、1939年和1959年的人口普查所作的批判分析为基础的。在苏维埃穆斯林高级官员方面,对于俄国在中亚移民的规模也深感不安。因而1958年时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理曼苏尔·米尔扎-阿赫密多夫在塔什干对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俄国人(及其他斯拉夫人)只占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这个数字即使同苏联1939年的统计比起来,也显得是极不现实的。

表五 欧洲人在中亚所占的百分比

	1926	1939	1959
哈萨克斯坦	34.9 ^a	47 ^f	64.9 ^k
乌兹别克斯坦	5.6 ^b	17.8 ^g	18.4 ^l
土库曼尼斯坦	7.5 ^c	18.7 ^h	24.2 ^m
吉尔吉斯坦	18.89 ^d	34 ⁱ	43.8 ⁿ
塔吉克斯坦	0.7 ^e	10.3 ^j	19.1 ^o

①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Réalités et limites de la présence russe en Asie Centrale" (埃莱恩·加雷勒·唐高斯:《俄国在中亚的现实和限度》), *L'Afrique et l'Asie*, №44 (4th trim. 1958), p. 5; H. Carrere d'Encausse et A. Bennigsen, "Pouvoir apparent et pouvoir réel dans les républiques musulmanes de l'URSS" (埃莱恩·加雷勒·唐高斯和本尼格生:《苏联各穆斯林共和国中的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 *Problèmes Sovietiques*, №1 (1958), p. 58; Hans Koch und Leo Bilas, "Slawen und Asiaten in der UdSSR" (汉斯·考赫和列欧·比拉斯:《苏联的斯拉夫人和亚洲人》), *Osteuropa*, № 7/8 (1958), p. 425.

a 卡罗(欧腊夫·寇克帕特里克爵士)著《苏维埃帝国—中亚的土耳其人和斯大林主义》(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63年版),第166页。

b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版,第9卷,第105页。

c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上,第31页。

d T. R. 雷斯库洛夫著《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1935年),第11页。

e 腊克姆巴巴也夫著《塔吉克斯坦》(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6年),第27页。

f 同上,第168—170页,以及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地理的特点》(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1957年),第130页。它表明,在1939年时,哈萨克人在他们的共和国中只占全部人口的57%,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33%,乌兹别克人占3%,其他(本地人和非本地人)占7%。它还声称,由于新移民涌入,哈萨克人所占的百分比要小得多。在某些州(卡拉甘达),竟低达30%(第131页)。另一处表明,学龄儿童中有66%进入俄罗斯人学校,只有34%进入本地人学校(第146页)。

g 这是我计算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4卷第11页所载的百分比为俄国人11.6,乌克兰人、欧亚犹太人、维吾尔人和吉卜赛人合在一起为6.7。在这6.7%中,前两类(乌克兰人和俄国犹太人)至少占三分之二。

h Z. G. 弗雷伊金著《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1954年),第84页,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3卷,第449页。

i 这是我估计的。“吉尔吉斯人”,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1卷,第102页,所载的吉尔吉斯人在他们的共和国内所占的百分比为51.7%。

j 同上,第41卷,第2版,第471页。

k 《真理报》1960年2月4日刊载的“根据1959年全苏人口调查资料的苏联居民教育程度、民族成分和年龄构成”提供了下列数字:俄罗斯人—42.7%,乌克兰人—8.2%,白俄罗斯人—1.2%,波兰人—0.6%。还有未列入的12.2%可以归入非本地人一类,因为本地人一直列举到邓干人(占0.1%)。在未列入的12.2%之中,有为数较多的德国人,也有拉脱维亚人、犹太人及别种人等。鞑靼人和朝鲜人未被

包括在本表中非本地人之内。下面所有的1959年的数字也是如此。

l 同上,有下列数字:俄罗斯人—13.6%,乌克兰人—1.1%,犹太人—1.2%。未被列入的有3.1%。犹太人只有一半被算作非本地人,因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些本地的布哈拉犹太人。

m 同上。俄罗斯人—17.3%,乌克兰人—1.4%,亚美尼亚人—1.3%。未被列入的有4.2%。

n 同上。俄罗斯人—30.2%,乌克兰人—6.6%。未被列入的有7.0%。

o 同上。俄罗斯人—13.3%,乌克兰人—1.4%。未被列入的有4.4%。

80 俄国在中亚进行殖民化的规模是由几个有力因素决定的:

1. 其他欧洲强国的殖民地在地理上是同母国分离的,而俄国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却是同大俄国本身毗连的。

2. 中亚工业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熟练工人,本地区供应不了^①。

3. 全部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尼斯坦,人口稀薄,能够吸收千百万移民。根据德国人最近的估计,中亚和南哈萨克斯坦(即旧土尔克斯坦地区)的面积最多能容纳一亿人口,或许四千五百万人就合适,但至少可容两千万人。对北哈萨克斯坦一地所作的同样的估计数字,依次为五千七百五十万人、二千七百五十万人和一千万人^②。尽管苏联作了种种努力来增加该地区的人口,现在连最低标准的数字也还没有达到。

81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移民数字和自然增殖数字合在一起,超过了中亚当地人口的增长

① 阿希波夫:《中亚共和国》,第35页。

② Joachim Barth: "Wieviel Menschen kann Russisch-Asien ernähren?" (约欣姆·巴尔特:《俄罗斯亚洲能供养多少人?》), Osteuropa, Vol. VI, № 2 (1956) p. 102.

数字。目前,由于最近的“处女地计划”,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仍是如此,不过中亚本部或许已不是这样了,据说那里本地人的出生率有了提高,而俄国移民在五十年代也减少了。

5. 自从俄国人征服中亚初期起,中亚一直被当作各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的流放地,最早的一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波兰叛乱分子。

中亚的广大的欧洲人口在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假设发生一场向俄国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话,俄国移民的反应或许不会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有多大区别。正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俄国移民对一名法国记者所说的,“把名称改一改,你就会发现和你们在北非所应付的同样的问题。”^①

某些本地共产党领袖所作的制止俄国人的迁移浪潮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塔吉克最高苏维埃主席纳斯拉杜拉·马克苏姆曾试图反对俄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殖民化行动,他在1933年遭到了清洗。哈萨克共产党人苏丹贝柯夫、杜拉托夫和萨斯沃卡索夫所作的同样尝试也都失败了^②。

俄国移民的涌入对中亚的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俄国人大规模移入之前,这个地区面临着若干为一般不发达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存在着广大的、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人口,他

^① Edouard Sablier: “Au pays de l’Islam rouge”(爱都阿·萨布里埃:《在红色伊斯兰国家》), *Le Monde* (1956年6月26日—7月5日), 1956年6月30日。

^② A. Bennigsen: “The USSR and the Colonial Revolution”(本尼格生:《苏联和殖民地革命》), Walter Z. Laqueur ed.,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载瓦尔特·莱克尔编《中东的变迁——当代历史研究》),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p. 410.

们一般说来对俄国和俄国人都是敌视的，或者至少是怀有戒心的；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不愿改变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的牧民；缺乏工业，因而也就缺乏本地的无产阶级；极端缺乏本地的技术人员和白领职员；极端缺乏受过哪怕是适度教育的本地人。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中，中亚工业的巨大发展改变了整个经济面貌，并产生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城市工人阶级。然而，中亚大多数非农业职工仍然还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工人阶级的成长赶不上工业的成长。中亚的非农业干部中，在工矿企业的经理和技术人员中间，在白领职员中间，在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中间，仍是非本地人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本地人却在消费品企业和合作社的经理中间，在当地工业的艺匠中间以及在非熟练工人中间占有优势。

虽然苏维埃力图培养本地的技术干部，乌兹别克人于1956年在自己的共和国的工程师中只占百分之十，医生中只占百分之十一，技术人员中只占百分之十二^①。苏联最近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些估计。还有许多其他资料也都能证明这种按照民族成分而作出的“劳动分工”。有一项研究材料估计乌兹别克斯坦的本地城市劳动力占全部城市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即在1956年占九十万中的三十万^②。当时在哈萨克斯坦也存在着同样的劳动力分工。另外一项研究材料认为乌兹别克工业中本地工人所占的百分比，在二十年代是上升的，但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都保持在占总数百分之五十的稳定数字上。这项研究材料对工业中本地工人所占的百分比估计如下：*

① *Uzbekistan za 40 let Sovetskoi vlasti* (《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政权四十年》), pp. 108—110.

② 蒙戴伊 (Monteil) 引自 1938 年 11 月 17 日的《消息报》(Izvestiia)。

• Franck A. Ecker: *Transition in Asia* (弗兰克·埃克尔：《亚洲的变

1924年至1926年占百分之二十九；

1928年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

1930年占百分之五十；

1938年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四十年代，产业工人中本地人仍占少数。《东方真理报》⁸⁴ 刊载的一些例子也证实了这一点。它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在整个乌兹别克共和国各地选出的三十六个大型企业中，乌兹别克人在技术人员中只占百分之十八^①。另一篇文章说，在下面开列的几个大型工业企业中，本地人所占的百分比为：在塔什干的乌兹别克纺织工厂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在全乌兹别克斯坦食品工业部所属的企业中占百分之三十；在塔什干的卡冈诺维奇工厂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一；在马盖伦丝绸联合工厂中占百分之三十五^②。

另一篇描写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最重要的工厂“升降机厂”情况的文章说，在1946年，没有一个本地人被训练来担任工头的职务，而且，在六十名被训练成装配工、镗工和六角车床工的工人中，只有六名是本地人。这家工厂里本地的熟练工人的总数在1945年初有八十九人，到1946年9月就减到五十六人，非熟练工人则从三十六人减到十人^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展，在第十一次（1952年）和第十二次（1954年）乌兹别克斯坦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也得到了正式承认^④。人们私下里常常说造

迁》，未出版哲学博士论文，密执安大学，1954年，第40页。

① “Bolshe vnimaniia natsionalnym kadram promyshlennosti”（《更多注意工业中的民族干部》），Pravda Vostoka 1941年1月9日。

② 同上，1946年9月24日。

③ 同上，1946年11月19日。

④ Communist Party of Uzbekistan. Institut istorii partii pri TsKKP Uzbekistana; Rezoliutsii i resheniia s'ezdov KP Uzbekistana（乌

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亚穆斯林极其厌恶工厂工作。

乌兹别克斯坦在劳动力方面对俄国的依赖也可以从这一事实来表明：即乌兹别克斯坦产业工人的数目在1940年是十二万九千一百名，到1943年难民流入后增加到十八万七千二百名，而到1945年当一部分难民撤回自己的家乡之后就减到十四万五千六百名^①。1914年，土尔克斯坦的产业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本地人，这一比率比后来任何时候都高^②。

第六章 文化政策

语言政策

不仅是苏维埃中亚的大片领土沦为斯拉夫移民的殖民地，就连当地的土耳其系语言也没有被放过。苏维埃中亚所用的字母曾被苏维埃政权改变过两次。最初是废除从1922年用起的经过修订的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后来又废除了拉丁字母而代之以俄文字母。苏维埃政权对第一次改革所持的理由是，阿拉伯字母即使经过修订（按语音），学起来还是太难，而且太容易和他们所称的伊斯兰教的“反动哲学”混为一体。另一方面，拉丁字母应用普遍，他们说这对于扫除文盲更有利。而且，

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Tashkent: Gosizdat UzSSR, 1957, pp. 402, 436.

①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86页。

② G. G. Gimpelson, A. P. Shelubskii: "O predposylkakh i osobennostyakh velikoi oktiabrskoi sotsialisticheskoi revoliutsii v Srednei Azii" (金普尔生、谢留勃斯基：《论中亚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特点》，Istoriia SSSR, № 5 (1959年9月至10月), p. 7.

拉丁字母会使中亚的语言变得更容易学习和更便于把外国书籍翻译成中亚语言。他们或许还认为,采用了拉丁字母,他们就能够更便于控制以当地语言印行的出版物^①,以及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新的民族文学和它们共同的查加泰渊源之间树立一道藩篱^②。(查加泰是中亚所有土耳其系民族的中世纪的文学语言。)

1926年以前,改用拉丁字母只是通过说服方式进行的。1926年,巴库的土耳其学代表大会采纳了改革的原则。接着在大多数以前应用阿拉伯字体的区域都推行了拉丁字母和统一的⁸⁶书写方式,不过直到1935年这一改革才全部完成^③。

第二次改革,应用俄文字母,是在1935年开始的,可是在1939年以前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进展。苏维埃人强烈拥护这一新改革。他们指出,拉丁字母在扫盲工作中很有用,不过在录写土耳其系语音时采用俄文字母更为相宜,因为它的字母比拉丁字母多。举例来说,乌兹别克语有三十八种语音,俄文字母有三十二个,可是拉丁字母只有二十六个。他们声称,俄文字母将既便于民族语言吸收俄语,又便于本地人学习俄语。一位苏联语言学家于1952年这样解释说:

苏联各族人民最重要的文化收获之一……是各(少数)民族在俄文字体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语言的字母和书写体系……多数语言采用了

① R. Randot: "L'expérience soviétique chez les peuples turcs de l'Asie Centrale" (朗译:《苏维埃在中亚土耳其族人民中间取得的经验》), *L'Afrique et l'Asie*, 1948年12月, p. 8. 采用俄文字母事曾被考虑过,但由于担心引起所策谋的俄同化问题而遭到了拒绝。

② Sergo A. Zenkovsky: *Pan 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瑟奇·赞考夫斯基:《俄国的泛土耳其主义和伊斯兰教》),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

③ Walter Kolarz: *Russia and Her Colonies* (瓦特·考拉兹:《俄国及其殖民地》), London: George Philip and Son Ltd., 1952, p. 36.

俄文字体后,不仅使自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使苏联各民族在成功地掌握俄语和吸收俄罗斯文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帮助^①。

这些期望是达成了。根据西方的研究,乌兹别克语中来源出自俄语(或俄语化的法语)的词汇,在1923年时占百分之二,到1940年增加到了百分之十五。同一时期,乌兹别克语中所用的来源出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词汇,其百分比从三十七降至二十五^②。渗入乌兹别克语(以及中亚其他语言)的大量俄语的借用词汇都是技术和政治名词,或是现代苏联和国际上应用的缩写词和表达方法^③。它们往往保持着原来的俄文写法,而在适当时加上一个乌兹别克语的词尾。可是在五十年代,常常不用那个乌兹别克语的词尾,借用词汇就以原来面目出现了(例如:Kommunist 一词的复数不用 Kommunistlar 而用一个俄语复数词尾,变成 Kommunisty)。与此同时,有一系列现存的、原出自土耳其语的词汇,被俄语词汇代替了^④。诸如 obed, obida,

① N. A. Baskakov: "Razvitiie iazyka i pismennosti narodov SSSR" (巴斯卡科夫:《苏联人民的语言和文字的发展》),转引自伍姆著:《苏联的土耳其族人民——他们的历史背景、语言和苏维埃语言政策的发展》(S. Wurm: Turkic Peoples of the USSR: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ir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linguistic policy), London: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er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hony's College, Oxford, 1954, p. 48.

② Leonard Barnes: 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 (莱纳德·巴恩斯:《苏维埃给与殖民地的光明》), London: Penguin Books 1944, pp. 213—215; and Hans Niedermoier: "Schriftreform und Nationalitäten in der UdSSR" (汉斯·尼德迈耶:《苏联的文字改革和民族性》), Osteuropa, Vol. III № 6 (1956年12月), p. 416.

③ II. D. Deshoriev: Razvitiie mladopismennykh narodov SSSR (杰歇里也夫:《苏联新近才有文字的民族的发展》), Moscow: Uchpodgiz, 1958, p. 218.

④ A. Bennigsen: "Les limites de la destalinization dans l'Islam sovietique" (本尼格生:《苏联伊斯兰教中非斯大林化的限度》), L'Afrique et l'Asie № 39 (1957), pp. 30—31.

obzor 等俄语词汇都以它们的俄语发音形式——*abed, abida, abzor*——渗入了乌兹别克语,代替了相当的土耳其语词汇^①。(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由于苏维埃生活朝着自由化发展,作为它的一个副产品,也产生了一种把不必要的俄语借用词汇从土耳其系语言中清洗出去的倾向。)同时,苏联的土耳其系语言在书写方面的统一性,因正式的乌兹别克文学语言遭到修改而被破坏了。土尔克斯坦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方言在1937年为塔什干的城市方言所代替,用来作为正式的乌兹别克文学语言。这种语言对该地区的其他土耳其系民族来讲是比较难懂的^②。

第一次字母改革的动机似乎出自政治上和实用上的因素,而第二次改革看来却好像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莫斯科或许感到,在中亚推行俄文字母能在俄国的土耳其系属民和土耳其的土耳其系属民之间重新树立一道文化藩篱,因为后者在苏维埃进行第一次改革之后也采用了拉丁字母。另一方面,这样做将加强俄国本土同她的中亚属地之间的文化统一。而且,推行俄文字母还对谴责苏联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理论的意旨相符合。他的理论是把一切殖民化,不论西方的或俄国的,都斥之为“绝对祸害”。

采用俄文字母一举,使得成百万册已经用拉丁文字印刷成 88 的书籍成为废品,并把成千上万的本地人又赶回到半文盲的境地。同时,此举抬高了俄语的声望,按照苏联的观点,俄语定将

① Allworth: *The Soviet Russian Impact on Uzbek Literary Activity*(奥尔沃思:《苏联对乌兹别克文学活动的冲击》),未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59年,第209页。

② 伍姆:《苏联的上土耳其族人民——他们的历史背景、语言和苏维埃语言政策的发展》,第45—47页。

成为“非俄罗斯族知识阶层的第二本国语……联盟中各种民族集团之间进行国际交流的语言。”^①正如苏维埃语言学家骄傲地声称的：

伟大的俄罗斯语言滋养了和丰富了我们所有民族的语言，使这些语言具有劲头和力量，使它们优美灵活，丰富多采。

通过不断地借用俄语而使苏联全体民族的语言的词汇得到丰富，这已成了发展这些语言的规律了^②。

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被承认是全国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连俄罗斯语言也被赋与了一个高于苏联国内所讲的其他各种语言的地位，而且苏联未来的各共产主义民族都被视为要以一种共同语言——俄语，混成一种文化。

各民族在未来的合一，〔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衰微和被一种共同语言所代替——这一切都将在各共产主义民族达到繁荣之后发生。

……俄语正越来越变为苏联的全部社会主义民族的共同语言^③。

上面的引文是在1957年，并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写的。对于这类言论应该给予多少重视，是很难决定的。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全然不理睬这些话，就像对待苏联关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机器将消亡的那类已成具文的言论那样。另一方面，这些

89 言论加强了“教条主义者”(或称斯大林主义者)的地位，他们是

① 杰歇里也夫：《苏联新近才有文字的民族的发展》，第224页。

② A. R. Mordinov: “O razvitii iazykov sotsialisticheskikh natsii v SSR.” (摩迪诺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社会主义民族语言的发展》), Voprosy Filosofii № 3 (1950), p. 92.

③ I. P. Tsamerian: “Velikaia Oktiabrskaja sotsialisticheskaja. revoliutsiia i korennoe izmenenie natsionalnykh otnoshenii v SSSR (察美里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变》) Voprosy Filosofii, № 5 (1957) pp. 61, 65. 并见埃利渥特·古德曼著《苏联对世界语言的设想》(Elliott R. Goodman: “The Soviet Design for a World Language”), The Russian Review, Vol. XV № 1 (1956年1月), 其中描述了苏联人对于以俄语作为未来的世界语言所持的观点。

反对苏维埃社会进一步自由化的。

文化上的同化政策

俄国在物质上和语言上渗透的意义，无论如何不应该盖过在那个地区发生的文化同化进程的意义。一位美国著作家是这么看的：

在所发生的苏维埃的文化合并中，俄罗斯文化是主宰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俄罗斯化了。然而，这一俄罗斯化的过程并不是苏联的措施的核心。少数民族所遭到同化的，与其说文化在形式上的俄罗斯化，不如说它在内容上的苏维埃化^①。

可是，根据另一项研究，

……在诸如“苏维埃文化”或“苏维埃优越性”等许多概念上，“苏维埃”这个形容词仅仅是“俄罗斯”的同义语而已^②。

按照这一问题的权威本尼格生的说法，文化苏维埃化的政策强调四个主要题目：

1. 中亚的穆斯林人民在种族上是和他们的邻人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不同的。他们语言的共同语根并不意味任何文化上的同一性。

2. 生活在今日的苏维埃中亚领土上的各族人民一向怀有一种相互团结感，并且切望形成一个以他们的“老大哥”、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为首的大家庭。

3. 苏维埃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

^① Mary Matossian: "Two Marxist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玛丽·马托西安:《两种通往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XVI (1957年12月), p. 499.

^② Jindrich Kucera: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The Linguistic Controversy" (英德里奇·古切拉:《苏联的民族政策——语言上的争论》),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III 第2 (1954), p. 24.

况下独立发展的,并且完全是自主性的和区域性的。例如,塔吉克文明据说源自巴克特里亚古国而不是波斯^①。

4. 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比苏联境外的土耳其族和伊朗族人民的文化更为优越,因为苏维埃穆斯林生活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而外国穆斯林是生活在封建或殖民压迫下。它之所以优越,还因为苏维埃中亚各族人民可能是有更丰富的文化传统。为了要证实这第二点,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就一些历史上属于整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土耳其族的和伊朗族的古典作家和科学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主张。这样,伊本-西那、费道锡和欧玛·喀雅姆都被宣布为塔吉克人,萨迪和哈菲兹,为“精神上的塔吉克人”,以示有别于其他非塔吉克的伊朗族人。(近来有某种理论认为提出这些主张的动机是,塔吉克人企图用强调他们丰富的伊朗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办法,来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标识。)巴卑尔皇帝(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代)被宣布为乌兹别克人。琐罗亚斯德的《祆教经典》曾同时被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宣称属于他们的;某些土耳其族的作家曾被中亚的四个操土耳其系语言的共和国各自宣称属于自己^②。阿里·舍·纳沃伊成了专属于乌兹别克的作

① A. Bennigsen: "Les peuples musulmans de l'URSS et les Soviets" 2nd part, "Le conflit culturel" (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人民和苏维埃人》,第二部分,《文化冲突》), L'Afrique et l'Asie, № 21 (1953), pp. 17-23.

② 同上。根据: Antologija Tadžikskoi poezii (《塔吉克诗选》), 莫斯科, 1951年; Gafurov: Istoriia Tadžikskogo naroda (加弗罗夫:《塔吉克人民史》), Vol. 1, 莫斯科, 1949年; Antologija Uzbekskoi poezii (《乌兹别克诗选》), 莫斯科, 1950年;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 第1卷, 第467页; V. V. Struve in Sovetskoe vostokoznanie (斯特卢威:《苏维埃东方知识》), Vol. V (1948) pp. 5-35.

家,古老的查加泰文学原本是大多数土耳其族民族共同的,现在成了只是“古老的乌兹别克文学”。

按照从土尔克斯坦迁来的人的看法,中亚的穆斯林从来没有接受过苏维埃官方的文化政策。相反,据说他们同俄国人并不团结,而同他们在土耳其和伊朗的穆斯林邻人具有宗教、语言和种族上的同一性^①。

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赞成伊斯兰教的平均主义原则的立场,但是却一直对伊斯兰教的所谓“反动的”社会内容抱敌视态度^②。反伊斯兰教运动一直是苏维埃人所进行的反对一切宗教信仰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然而,对当地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考虑一向没有放松,而宗教问题并没有经常受到同样决心的压迫。从1917年到1920年,对宗教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直到1928年还在某种程度的缩减形式下容忍着。集体化开始后,猛烈的反宗教活动随之而来,而且在三十年代清洗时期始终是如此。苏维埃反宗教措施的规模也反映在苏联国内清真寺的减少上——从1912年的两万六千二百七十九座减少到1942年的一千三百十二座^③。从1938年到1945年,反宗教活动有了显著的缓和。尤其是在德国人侵入之后更是如此,当时反而削减了无神论的宣传,为的是害怕对战争努力可能发生不良影响^④。

① 奥尔沃思:《苏联对乌兹别克文学活动的冲击》,第9,101—102,204页。

② “Islam”(《伊斯兰教》),《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第29卷;以及《东方真理报》,1950年6月29日。

③ Monteil:“Essai”(蒙戴伊:《论文》),p.65,引用 Soviet War News(《苏联战时新闻》),1942年5月16日;and Monteil:“Supplément à l'essai sur l'Islam en URSS”(蒙戴伊:《对论苏联的伊斯兰教一文的补充》),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Vol. VIII, (Paris, 1953), p. 8, 引用, Mir Islama(《伊斯兰教世界》), № XI (1913), pp. 269—271.

④ 蒙戴伊:《论文》第46页,以及波兰难民的口述。自1947年以后,无神论

伊斯兰教的部分恢复，正如俄罗斯正教的部分恢复一样，并不是出自当局的善心，而是由于老百姓中间的宗教感情的力量。对于中亚伊斯兰教复苏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一位巴基斯坦旅行者说，“伊斯兰教还没有完全死亡，可是看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①。

……虽然从表面上乍一看来，伊斯兰教似乎已被排除在土尔克斯坦生活之外……布尔什维克想消灭伊斯兰教并没有成功。他们只是做到了把伊斯兰教公众的宗教崇拜赶进了清真寺，如此而已。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仅在信徒们的灵魂中，而且在生活实践中也仍然保持着几乎是原封未动的状态^②。

英国人卡罗认为伊斯兰教所处的地位是介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中间：

……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土尔克斯坦的宗教寺院已永远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和力量……然而，清除了它的属于神权政治的成分之后，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事实上，伊斯兰教已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信条的精神核心^③。

92 由于无法抗拒苏俄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本地人只得试图保

宣传又大肆展开。并参阅雷蒙·肯特著：《苏维埃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关于综合的神话》(Raymond K. Kent: "Soviet Muslims, The Arab World and the Myth of Synthe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III № 2 (1959) p. 143.

① 同上，p. 17 (引自《黎明》[Dawn]，1952年7月28日)。

② Jan Dubicki: *Elements of Disloyalty in Turkmenistan* (扬·杜比茨基：《土库曼尼斯坦的不忠分子》)(俄文本)，New York: Research Program on the USSR, 1954, pp. 16—17.

③ Caroe (Sir Olaf Kirkpatrick): *Soviet Empire. The Turc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卡罗[欧腊夫·寇克帕特里克爵士]：《苏维埃帝国——中亚的土耳其人和斯大林主义》)，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3, p. 240.

存他们的文化遗产。可是莫斯科却坚持要他们接受斯大林的关于文化的著名原则——“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不过压力的份量和对待当地的历史和传统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在斯大林统治时代，苏维埃当局对待土尔克斯坦民族文化的态度，显示过如下的变化。

在三十年代中期之前，当时正得势的波克罗夫斯基的“绝对祸害”论谴责一切殖民征服，不论是英国的、法国的或沙皇俄国的。它并且颂扬一切反对大俄罗斯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这一理论，土尔克斯坦在革命前反对沙皇殖民政策的斗争正式被称赞为俄国各族人民总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支持这一观点的本地共产党人（霍德查耶夫、伊克拉莫夫、雷斯库洛夫及其友辈）当时统治着文化界。这段时期随着三十年代后期清洗时对他们的清洗而告终，在那场清洗中，像卓尔班、费特拉特、卡地利、埃尔贝克、朱马贝和丁尼斯丹等著名的土尔克斯坦文学人物以及其他人物，都遭到了杀害。与此同时，在1937年8月28日，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学派遭到了最后谴责。

在下一段时期，在1937年和四十年代末之间，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理论：即“较少祸害”论，根据这个新理论，俄国的征服虽然是殖民性质的，却比土耳其的、伊朗的或英国的统治带来较少灾难。反对沙皇政权的民族主义斗争仍然受到称赞，可是对于本地历史学家就自己的民族历史抱“沙文主义”（即民族主义）观点的，却不再容忍了。

在抗德战争期间，当苏联的胜利有赖于俄国人民强烈的战⁹³斗精神和爱国主义时，俄罗斯人在对苏联其他各民族方面所起的“老大哥”作用，开始受到了有力的强调。战后情况仍未改变。

1951年，“较少祸害”论获得了苏联历史科学的官方发言人尼契金娜夫人的最后批准^①，并被逐渐导至同苏联最新的历史理论“绝对美德”论相接近。这一新接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受到过日丹诺夫的鼓励，他是苏联战后在文艺方面的主宰。按照新路线，反对沙皇殖民行为的民族斗争遭到了谴责，而同俄国联合的美德受到了颂扬。强调了沙皇的殖民化带来了“更先进的俄国文化”的进步性^②。哈萨克的历史学家们被提醒说，他们的反对沙皇俄国殖民化的本地首领们并不是爱国者，而是“反动的封建分子”。十九世纪著名的高加索穆斯林民族主义领袖夏密尔（曾被马克思称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在1950年也被贴上了同样的标签^③。吉尔吉斯的民族史诗《马那斯》，是苏维埃吉尔吉斯坦的骄傲，但却因不适时地有反华内容，突然被谴责为“泛伊斯兰教的”和“封建的”，它的目瞪口呆的卫护者都遭到了惩戒^④（这一立场最近又改变了）。作为乌兹别克文学遗产的一部分的、描绘土尔克斯坦穆斯林反对异教徒卡尔慕克人的斗争的土尔克斯坦英雄史诗《阿尔帕米希》，在1952年

① Konstantin F. Shtepa: "The Lesser Evil Formula" (康斯坦丁·希捷帕:《较少祸害公式》), 见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Soviet Interpretations of Russia's Past*, ed. by C. E. Black (布莱克编:《重写俄国历史——苏维埃对俄国过去的阐述》), 为苏联研究计划而出版,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6, 第110页。

② A. Bonnigson: "Les limites de la destalinization" (本尼格生:《非斯大林化的限度》), *L'Afrique et l'Asie*, № 39 (1957) p. 32.

③ 见同上, 以及保罗·亨泽:《夏密尔问题》(Paul B. Henze: "The Shamil Problem"), 见瓦尔特·莱克尔编:《中东的变迁——当代历史研究》第417页以下, 对夏密尔问题有详细叙述。

④ 见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人民》, 同上书, 第22期第27页以下, 对马那斯事件有详细叙述。

被谴责为一部充满穆斯林热狂和沙文主义的作品^①。大众性的穆斯林传奇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按照苏维埃的“自我批评”的风俗，本地学者们都被迫谴责自己过去的观点，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新的意见”^②。有些人拒绝听命，可是在1951年至1952年⁹⁴对高加索和哈萨克的知识分子以及萨马尔罕大学和斯大林那巴德大学的教职员进行清洗之后，他们就被迫沉默了。“绝对美德”论获得了最后胜利^③。

按照这一方面的英国专家瓦特·考拉兹的说法，依着这条新路线，譬如说对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的概念就只要四条枯燥无味的公式就能说明。这四条为哈萨克作家们所不得不同意的公式是：

一、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是自从十六世纪末期以来哈萨克人民的最著名、最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标。

二、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防止了“东方野蛮国家”奴役哈萨克人，并使他们和一个比一切亚洲邻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文明”的国家有了密切的联系。

三、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就制止了中国、俄国和浩罕瓜分哈萨克斯坦，并为进入更进步的经济形式打开了道路。

四、哈萨克人在他们全部历史中都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国家，只是一些联结得很松散的半国家组织。苏维埃政权使哈萨克得以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国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④。

① 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人民》，第23—24页。

② 蒙戴伊编辑：《论苏联的伊斯兰教》(Essai sur l'Islam en URSS)，载《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1952年，第9期；《科学院通报》(Vestnik Akademii Nauk)，1952年6月；《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1952年2月14日和6月8日；《巴库工人报》(Bakinskii Rabochii)，1950年7月18日。后者声称：“阿塞拜疆人民(在夏密尔起义期间)不耐烦地等待着解放者——俄国士兵的到来”。

③ 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人民》，同上书，第23期，第19页以下。

④ 考拉兹：《俄国及其殖民地》，第268—269页。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苏维埃中亚的其他共和国的历史，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①。一位苏联作者在1953年写道：“…归并于俄国使中亚各民族有了参与俄罗斯民族的首屈一指的文化的机会……”^②。沙皇俄国的征服被说成是一桩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因为那是一条获得“伟大的俄国人民及其文化的恩泽”和护卫的道路^③。这样说来，人们就很可以坚称英国使印度得到了统一；英国比印度的亚洲邻国更为文明；并且英国使印度得以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英属印度帝国。苏联对俄国殖民行为的辩解，同英国和法国的说法实在是类似得惊人。

然而，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对苏维埃穆斯林的文化压力有一定程度的减轻。曾经发动1950年的反夏密尔运动带头推行日丹诺夫思想的阿塞拜疆总理巴吉洛夫遭到了贬谪，后来还以贝利亚的代理人的罪名遭到清洗^④。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而1956年的讨论表明苏联历史学家中间仍有分歧^⑤。到现在又能够这样说，俄国的征服并不总是得到热烈赞成的。不过，关于俄国征服高加索和中亚的“绝对美德”论的基本教义并未加以修

① Wayne S. Vusinich: "Moslems of the Soviet Union" (韦恩·符西尼奇:《苏联的穆斯林》), *Current History*, Vol. XXIV, № 137 (1953年1月), pp. 9-11.

② A. Yakubovskii: "Serioznoe issledovanie po istorii tadzhikskogo народа" (雅古波夫斯基:《对塔吉克人民历史的认真研究》), *Kommunist* № 1 (1953年1月), p. 103.

③ Hans Kohn: *Pan-Slavism: Its History and Ideology* (汉斯·柯恩:《泛斯拉夫主义——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53, p. 250.

④ H. Carrere d'Encausse: "La destalinization dans l'Islam sovietique" (埃莱恩·加雷勒·唐高斯:《苏维埃伊斯兰中间的非斯大林化》), *L'Afrique et l'Asie* № 37 (1957) pp. 32-36.

⑤ 本尼格生:《非斯大林化的限度》,同上书,第39期第35页。

订，而且，虽然波克罗夫斯基的名字在 1961 年又被苏联报刊善意地提到，眼下看来还不会回到波克罗夫斯基关于殖民征服的“绝对祸害”论上去。

教 育

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姑不论政治方面的情况，中亚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俄国人和穆斯林的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制度的发展和文化程度的提高，都极为惊人^①，虽然并不像苏联公布的数字那样高。1910 年，在俄罗斯土尔克斯坦的本地学校里只有十万名本地小学生。此外，在布哈拉埃米儿领国有十三万名小学生就读于学业上落后的宗教学校，在基发汗国则有两万两千五百名小学生也是这样^②。加在一起，总数还不到四十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一地的学生人数的五分之一。

1941 年，乌兹别克斯坦入学人数的正式数字要比伊朗在 1952 年的数字高四倍，而和美国南方某些州 1950 年的数字相接近^③。

① 关于革命前的情况，见瑟奇·赞考夫斯基：《中亚革命前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 in Pre-Revolutionary Central Asia),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第 14 卷第 1 期(1955 年 2 月)第 20 页，以及马萨夫斯基：《俄罗斯——我们祖国的地理详志》，第 336—339 页。关于革命后的发展，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 版第 55 卷；同书第 2 版第 12 卷，第 435 页；《中亚评论》(Central Asian Review) Vol. 3 № 1 (1955), p. 70.

② 同上。

③ 比较《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 版第 55 卷第 640 页；《中亚评论》第 3 卷第 1 期(1955)第 70 页；《1954 年联合国统计年鉴》(U. 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4), 表 372, 第 532 页(伊朗)；《美国统计文摘》(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 C., 1954), 第 128, 131, 137 页(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中亚识字的人数占较高百分比的原因是由于猛烈推行了强迫教育制度和展开了扫除成年人文盲的群众运动。中亚识字的人数所占的百分比要比穆斯林中近东任何其他地方高得多^①。可是,有许多专家认为苏联对教育水平的说法过分夸张。在那个地区居住的一名波兰移民杜比茨基就估计说,在四十年代,识字的本地人所占的比率约为百分之三十,识字的成年人只占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十^②。英国专家辉勒中校认为识字的人数约占百分之五十(在五十年代初期)^③。一位法国权威迦耶认为苏联的官方数字是“不可信的”、“不可能的”。这类看法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一事实,即官方对识字的人的统计数字看来把一些仅能写自己的姓名或拼写若干词的半文盲也包括在内了。这一部分人很可能占去全部“识字的人”的一半^④。和1926年的人口普查对比起来,另外一件不清楚的事是,根据1939年和1959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中亚识字的人数中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占有多大比率。

四十年代中亚的小学在学人数中,欧洲人孩子和本地人孩子大致相同。可是,农村地区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学龄儿童并没有上学^⑤;而在中学、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中间,本地人的数目是非常少的。这种局面不能归咎于缺乏鼓励,应该归咎于在当地的俄国人和本地人之间依然存在着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结果

① 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2卷,第435页。年龄在九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是:乌兹别克斯坦—67.8%;土库曼尼亚—67.2%;塔吉克斯坦—71.7%;吉尔吉斯—70%。

② 杜比茨基:《土库曼尼亚的不忠分子》,第37页。

③ Lt. Col. G. E. Wheeler,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辉勒上校:《苏维埃中亚的文化发展》),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LI(1954) p. 182.

④ 蒙戴伊:《论苏联的伊斯兰教》,第94页。

⑤ 《东方真理报》,1945年3月23日。

是乌兹别克学生于1940年只占塔什干中亚大学注册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而哈萨克学生只占阿拉木图大学的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在1943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二千二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只有五百名是乌兹别克人^①。然而到了1961年，中亚和哈萨克地区的本地人就在当地的大学、专科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了。考虑一下在革命前中亚根本没有一所大学，那么，在1961年中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二十五万名学生——即使其中三分之二是欧洲人——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②。

苏联的教育统计数字在有关穆斯林妇女方面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穆斯林妇女在革命前是不参与公众生活的。根据官方数字，她们比中东任何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妇女更活跃于公众生活。法国共产党的同情者杜贝尔将军曾于1950年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他报道说，乌兹别克妇女有一万五千名担任教员，三千名任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二百三十三名是医生或大学毕业生，二百十三名担任集体农庄主席^③。经过较仔细的分析，这些数字都有误差。在当时的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共有一万名乌兹别克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中百分之零点四是妇女。因此，本地妇女专家的总数只不过四十人，杜贝尔所提供的数字一定是不正确的。如果人们知道妇女集体农庄主席的人数只占共和国集体农庄主席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时，这个数字便不那么惊人了^④。穆

^① 20-letie Sredne-Aziatskogo Universiteta («中亚大学二十年»), Tashkent, 1940, pp. 20—21, 以及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Les musulmans soviétiques), Paris: Editions du Soril, 1957, p. 96.

^② Narodnoe khoziaistvo USSR v 1961 godu («1961年苏联国民经济»), pp. 691, 693, 700.

^③ 杜贝尔:《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第82—83页。

^④ 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pp. 74, 114; 根据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

林姑娘进入中学和大学的人数,众所周知是很少的^①。根据本尼格生说,穆斯林姑娘在五十年代中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中只占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而埃及女子在同类学校的学生人数中却占百分之十二^②。虽然中亚妇女的处境从革命以来无疑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在其他既非共产主义又无外国指导和监督的穆斯林国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土尔克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发现,在苏维埃的社会经济成就和俄罗斯化政策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们说,事情发展的程序往往是“苏维埃化、工业化和俄罗斯化”^③。

然而,苏俄在其中亚属地所推行的改造,不能够也不应该拿“俄罗斯化”这把唯一的码尺来加以否定。哈佛大学的中亚事务专家理查·派普斯说道:

…苏维埃中亚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区或前殖民地区所发生的进程,并没有基本区别。两者的情况都是本地社会在欧洲文化的冲击下变得世俗化了、西方化了^④。

在中亚旅行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那个地区生活是如此符合欧洲俄国的一切,以及俄国官员同本地的官员并肩工作的情况时,印象很深:

莫斯科的控制——当我说“莫斯科的控制”时,我是指西方对这些地

处妇女工作组组长穆希金诺娃 (Mrs. Mukhitdinova) 夫人所述。

① 《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第364页。第十届乌兹别克斯坦党代会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乌兹别克女学生不能升学。

② 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第112页。《东方真理报》(1955年10月6日)声称,在1947年至1955年之间,在萨马尔罕市只向本地女子发给了一百七十二张中学毕业文凭(即每年平均约二十九人)。

③ B. Nikitin: “Problème national et évolution technique en Asie soviétique” (尼基丁:《苏维埃亚洲的民族问题和技术演进》), L’Afrique et l’Asie, № 31 (1955), p. 21.

④ 派普斯:《苏联对中亚的冲击》,第32页。

区的控制和留下的烙印——是又明显又令人沮丧的。党的组织，报纸的版面和内容，歌剧院里的节目……剧场的戏单，文化休憩公园里老一套的标语；饭馆里服务惊人的迟缓，甚至饭菜里除了平凡的串羊肉和煮肉饭之外没有什么地方风味的菜；商店也是莫斯科小铺的污脏的复制品；同样的书店，同样的图书；为数众多的西方俄国官员（每一位中亚籍的官员好像都有一名西方俄国的对称的官员）；西方俄国军队和边防军的驻在——每一方面都有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着西方俄国对该地区的控制。

当然那里并没有种族隔离。另一方面，我们曾在苏联宣传中听到过很多的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鼓励，实际上却非常有限，绝大部分仅限于对比较宝贵的艺术展品、民间舞蹈、印行当地语文的少见的报纸等等^①。

然而，每一个俄罗斯人从来也没有拥有过像过去欧洲人在亚洲或非洲社会中所拥有的那种高人一等的地位。尽管在大事宣传的苏维埃“各族人民的友谊”中还有缺点，甚至尽管有苏维埃俄国进入了中亚这一事实，上面所说这一点，却依然不失为俄国同穆斯林的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积极因素。

第七章 干部、优秀分子和人民

101

三十年代的清洗

1921年，斯大林对苏维埃政府制度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他是从把苏维埃政府同他所曾知道的唯一的政府——沙皇的专制政府作比较来开始的：

^① Eric Downton: "Soviet Central Asia" (埃立克·唐顿:《苏维埃中亚》),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LII(1955), p. 131.

有两种管理国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使机关“简单化”，比如说，以一个集体或一个人为首领，他的耳目是各地的省长。这是最简单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形式下，首领依靠从省长那里能够得到的消息管理国家，他拿一种希望来安慰自己，希望自己是真诚而正确地管理国家的。后来发生摩擦，摩擦转为冲突，冲突又转为起义。然后起义被镇压下去。这种管理制度不是我们的制度，虽然它很简单，但是代价太大。

然后斯大林说明了他所认为的统治国家的最好方法：

我们在苏维埃国家内实行的是另一种管理制，这种管理制度使人们能准确地预测农民、少数民族、所谓“异族人”和俄罗斯人的一切变化、一切情况，使最高机关系统内有许多晴雨表可以预测各种变化，估计和预防巴斯马奇运动、土匪骚动、喀琅施塔得叛乱及一切可能的风暴和不幸^①。

斯大林心目中的这种制度是沿着四条主要的指挥和控制的渠道发展的：党组织、官僚政府、武装部队和警察机构。党被安
102 排为这种制度的发起人、先锋队和推动力量；官僚政府是它的行政胳膊；军队是它反对外来威胁的剑；警察机构则是反对这一政权的内部敌人的剑。

在斯大林统治时代，这一制度的主要推动力量——共产党——实际上被剥夺了它的领导地位而降至成为这一制度的另一支行政胳膊，起着和政府的官僚政治同样的作用。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迷信”（亦即是完全屈从于一个领导人）对党的党员以及对党的机构都起了一种麻痹作用，结果是使得整个结构官僚化和层次重叠。党的官员们怕负责任，怕犯错误，结果就缺乏主动性。清洗就成了更新党的干部、替党的重叠机构注入新鲜力量的唯一方法。可是这服药本身就有缺陷：对清洗的恐惧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0页。

使得党的官员们陷于一种毫无作为的境地，而这正是原来想通过清洗加以消除的现象。在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清洗中，优秀的党员往往成了牺牲品，而那些应该撤职的人却竟然保存了下来。这种情况，对于把党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总参谋部、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无产阶级的党和苏维埃社会中“最优秀人物”的集合体的这种理想的理论概念，起了反作用^①。

按照理论原则，共产党被认为是从最具有“革命觉悟”的工人之中，在那些想象中具有已证明的领导能力的人之中，选择党员的。这在革命的初期或许是这样的。但在中亚可不是这样，那里所有五个共和国的共产党都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它们的绝大部分活力都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中遭到了削弱。 103

从1930年到1938年之间的连续七次清洗，几乎把当地脆弱的共产党的全部干部都毁掉了。在遭到清除的人物之中，值得提出的有：塔吉克斯坦的主席马克苏姆（1933年）和萧特玛（1937年）；塔吉克斯坦的总理霍德查耶夫和腊克姆巴巴也夫（1937年）；哈萨克斯坦的总理库兰贝托夫（1935年）和伊萨耶夫（1938年）；吉尔吉斯总理阿卜杜拉赫玛诺夫；布哈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前首脑（1922年至1924年），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至1937年）费祖拉·霍德查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俄罗斯共和国副总理，苏维埃土尔克斯坦前总理雷斯库洛夫；若干名望较小的政界人物以及数十名官员和知识分子。在1937年的清洗中，初级

^① T. H. Rigby: "Social Orien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李格贝:《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社会出身和成分》),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XVI (1957年10月) p. 275, 认为所谈到的四项原则就是共产党的指导力量。

党组织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七的党的官员，区党委中有百分之七十点八的党的官员，被新人所替代^①。在遭到清洗的人员中，费祖拉·霍德查耶夫是位杰出的人物。他“供认”曾参加右翼反对派（布哈林那一伙），原因是后者向他保证将使乌兹别克共和国获得独立。他当时被迫宣称：

…即使那件事在付出了阴谋变节、背叛祖国的代价后竟然可能实现……这种虚假的独立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来说，毫无疑问会是一场新的灾难^②。

在政府这一级，撤换了霍德查耶夫（1937年7月）之后，接连有三名乌兹别克的总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赶下台。阿卜杜拉·卡立莫夫呆了两星期，陶拉毕可夫只几个星期，索尔坦·塞吉斯巴耶夫是半年^③。这些人全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104 清洗的，与此同时，成千名他们的追随者也遭到了清洗。这样一来，民族共产主义的潜在危险或幻想中的危险是消除了，可是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经过了1937年到1938年的风暴之后，党的本地干部比过去更加软弱、更无作为了，而结果是更加依赖外力（俄国）的保护了。1939年到1940年进行的重建本地干部的过程尚未全部完成，苏联已陷入了对德国的战争。

四十年代时党的优秀分子

共产党党员中的最有权力的分子总是被称为党的优秀分子（积极分子）。优秀分子和基层党员之间的区别有着重大意义。

① 蒙戴伊：《论苏联的伊斯兰教》，第57—58页。

② 《反苏集团》，同上书，第213, 239, 746页。

③ Dr. A. Godkepe: "The National Policy of Moscow. Ezhov's Purges in Turkestan" (高德凯普博士：《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埃若夫在土尔克斯坦的清洗》), Turkoli № 3—4 (1952年3—4月), pp. 7—8.

前者，时常被称作党-苏维埃集体农庄的优秀分子或党-经济界的优秀分子，所包括的有党的特权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即是苏联的“统治阶级”。它的成员在对付工人时有党组织撑腰，“主任依靠党组织，而党组织在主任的一切措施上都给予支持”^①。

乌兹别克的萨马尔罕城在战争时期的情况，是说明存在于整个中亚的情况的很好的例子。在萨马尔罕，党的优秀分子约占全部党员的四分之一（二千九百人中有一千九百人）^②。其余四分之三党员都是党内地位较低的人物，他们成了优秀分子同广大非党群众之间的桥梁。对萨马尔罕管理人员的优秀分子的民族成分所作的分析表明，这一地区（州）的集体农庄的主席清一色都是本地人（当时在该地还没有俄国的集体农庄）。在所有其他行业的管理职位上，俄国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欧洲人占大多数。工业方面，在四十年代初期，萨马尔罕城七家大工厂中¹⁰⁵有五家的厂长是欧洲人，七家中有一家的厂长在这段时期的一半时间内由欧洲人担任。在剩下的二十三家萨马尔罕的工厂里，在整个战争时期，有七家始终由欧洲人任厂长，五家有一段时间由欧洲人任厂长，只有六家由本地穆斯林掌管。在有材料可查的八家联合企业中，有五家的经理是欧洲人，有两家的经理一半时间是欧洲人，只有一家的经理在整个时期都是本地人（有五家工厂无案可查）。在该地区较重要的合作社中，比率是四名欧洲人对三名本地人^③。同时塔什干报纸《东方真理报》透露了萨马尔罕工厂厂长们的低下的教育程度：在1941年，在三

① “Partiinaiia organizatsiia i avtoritet direktora”（《党的组织和领导人的威信》），载《东方真理报》，1941年2月6日。

② 同上，1941年6月3日。

③ 辑自1941—1946年《东方真理报》。

十一名厂长之中，有二十三名的程度从未超过小学四年级水平，只有三名是工程师。那时候只有三名厂长是乌兹别克人^①。这些经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因而经理人员阶层的民族成分和党的优秀分子的民族成分完全一致。

像在州一级一样，区一级的本地官员每当需要更换时，总是为办事更有效率，更熟练和更可靠的俄国人或其他欧洲官员所代替。在扎明区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一名俄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替代了一名本地的第一书记。在萨马尔罕城的许多工厂中的情形也是这样。

在若干其他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在各个区，在各级组织里，都发生过同样的事。应该加上一句，当地报纸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批评本地穆斯林的效率低下，虽然这类批评在俄国官员们的私人谈话中经常听到。报纸文章在谈到乌兹别克官员们的缺点时，必定也提到俄国的、乌克兰的或其他欧洲的官员们的缺点，¹⁰⁶ 尽管后者的失败在程度上要小得多。

每个社会集团的党员优秀分子都有责任确保那个集团的人民在政治方面的顺从。此外，俄罗斯的党的优秀分子都负有帮助经验较少的本地的党的优秀分子以及警惕本地的不论是巴斯马奇性质的或是民族共产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分子的任务。本地人觉察到这种情况，因而对本地的共产党员并不敌视。相反地，他们把本地共产党员看作是保护人，看作是反对俄国沙文主义分子和反对政权当局强加于他们种种困苦的盟友。不管怎样，本地穆斯林信任穆斯林共产党员总归是对苏维埃政权本身有利的。因为共产党这样就能更有效地利用本地共产党员。的

^① “Sobranie partiinogo aktiva v Samarkande” (《萨马尔罕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东方真理报》，1941年3月19日。

确,如果本地共产党员被他们自己的人民看作是俄国人的傀儡,从而使人人都看清苏维埃殖民统治的真相,那么要想稳稳当当治理这一地区便会非常困难了。因而苏维埃当局若想避免严重的麻烦,就不得不对一些不必一定要反对的民族主义做法装看不见。

共产党领导人愿意使用武力来使乌兹别克人种植棉花,可是并不是要使他们按照西方标准来对待自己的妻子①。

党也考虑到了东方人看重个人威信和“面子”的事实。一位英国访问者解释道,“党是很精明的;关键性的职位都由俄国人占着,而让能够信任的当地人来出头露面和担负责任。②”

同样地,苏维埃政权对本地党的官员和经理人员的无关紧要的滥用职权行为,也予以容忍,只要这些行为的对象仅是某一名俄国人就行,原因是这样做可以用一只替罪羊来使民族主义情绪不致受到损伤。因而某些穆斯林集体农庄主席在四十年代时很喜欢欺侮欧洲难民(包括波兰人在内)。有些穆斯林工厂厂长在和欧洲人打交道时也滥用职权。一位美国专家在评论俄国人对待亚洲血统的人时所具有的种族方面的容忍时说:

俄国人对付亚洲人有着丰富而全面的经验,而且俄国人不寻常地摆脱了“种族上的”傲慢态度,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对技术上比较不发达的人

① Herbert S. Dinerstein: "The Sovietization of Uzbekistan. The First Generation" (赫伯特·狄纳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化——第一代》), Russian Thought and Politics, ed. by H. McLean, M. E. Maria, O. Fisher(载麦克里恩、马利亚、费希尔合编的《俄罗斯思想和政治》), Harvard Slavic Studies, Vol. I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512.

② Patrick Sergeant: Another Road to Samarkand (帕特里克·萨金特:《通向萨马尔罕的另一条路》),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55, p. 110.

民也逐渐摆出一些恩人的姿态^①。

人们或许会争论说，苏联在中亚推行的俄国化政策不能认为其本身就是目的，而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亦即俄国人的政权同由它的绝对权力所塑成的“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

专家们认为，在1936年到1941年之间，从苏联社会的上层集团之中吸收党员的政策占了上风^②。在这些年里，工人们在党内逐渐被迫降至较低的地位。后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这一政策想是被抛弃了，而“战时大量征募”的新政策，“收到了让党在苏联社会的较低阶层扎住根子的后果”^③。这样的征募一般是在军队里进行的，可是一大部分中亚本地的入伍者由于明知他们缺乏热情，都被派到了劳动队中，在那里并不大规模地吸收党员^④。

在乌兹别克斯坦，党内工厂工人所占的比率依然很小。即令在高度工业化的塔什干，1946年吸收入党的预备党员中也只有四分之一是工人^⑤。的确在前线的士兵中间推行过大量吸收党员的政策，因而在1945年至1946年的复员时期回到家来的有成千上万的党员新兵^⑥。可是从1945年1月1日到1946年7月1日，在新入党的党员中工人所占的比率只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六^⑦。工人阶级的新党员中较能干的分子不久就被编入了经理人员的优秀分子，从而消除了从党内产生竞争性的无

① 西顿·华生：《苏维埃民族政策》，第8页。

② 李格贝：《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社会出身和成分》，第290页。

③ 同上，第277页。

④ 卡罗：《苏维埃帝国——中亚的土耳其人和斯大林主义》，第246—253页；
杜比茨基：《土库曼尼斯坦的不忠分子》，第44—47页，据目击者叙述。

⑤ 《东方真理报》，1946年10月5日。

⑥ 李格贝，同上书，第281页。

⑦ 《东方真理报》，1946年8月24日。

产阶级优秀分子的危险。在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依然是一个与工人阶级联系薄弱的经理人员的党。这种局面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还占优势,甚至在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还是这样^①。

党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比在城市中更薄弱。许多集体农庄没有党的基层组织^②。在许多较小的农庄中,主席就是唯一的党员。在较大的集体农庄中,党员人数较多,而党员身分仍仅限于管理人员,普通农民很少持有党证。塔什干州党委透露说,1945年,在塔什干地区的农村地带,有十九名集体农庄主席,十二名农场经理和一百一十一名生产队长被接受入党。普通农民有多少被吸收入党并未提及,因为农村中的党所代表的是农村社会经济的新的优秀分子(那些人是从共产党政权推行的集体农庄政策中得到较高的地位的)^③。

在一个特别大的集体农庄里,党组织包括十一个人(七名党员,四名预备党员),他们都是穆斯林,都是农村优秀分子的成员——主席、副主席、三位经理、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宣传鼓动部部长、两位当地的小学教员、以及两名生产队长^④。

在另一个有着三百二十五户农民的集体农庄里,有五名党员和八名预备党员:主席、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三名生产队长^⑤。在扎明区的各个集体农庄中多半是同样的情况。

① 《东方真理报》社论,1957年9月15日。

② 在卡希卡河州,七百零三个集体农庄中只有三十三个有党的组织(《东方真理报》,1943年10月10日)。

③ 同上,1946年10月5日。塔什干党委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同上,1943年8月17日,提到了萨马尔罕州的一个集体农庄优秀分子的会议,出席的有农村优秀分子一千五百人。

④ 同上,1942年8月20日。

⑤ 同上,1941年5月12日。

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中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两样。党员身分仅限于管理人员,而普通职员依然处在党外。事实上,1946年,在整个乌兹别克共和国,农村地区的党员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拖拉机手。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只有十六名康拜因手是党员(亦即是每州约两名)^①。新党员吸收得很慢。据透露,在1945年那年,塔什干州只接受了八名拖拉机手入党,康拜因手一名也没有^②。萨马尔罕州的拖拉机站站长大多数是俄国人或其他欧洲人,这和农庄主席不同。在该州的三十五个拖拉机站中,整个战争时期只有九个拖拉机站的站长是本地人,有十六个拖拉机站的站长是欧洲人,有十个在一半时期也由欧洲人当站长。在拥有三个拖拉机站的扎明区这个特殊例子上,第一个整个时期都由欧洲人当站长,第二个自从1944年起一直由欧洲人当站长,第三个则自战争结束时起一直由欧洲人当站长^③。一个由本地人当站长的拖拉机站通常都有一个欧洲人掌管该站的政治部(反之亦然)。欧洲人在国营农场的管理方面也占着统治地位。在扎明区,两个大的国营粮食农场(其中的一个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乌达尔尼克)的场长都是欧洲人^④。有些欧洲移民受雇

110 于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主要是由于在穆斯林中间缺乏熟练工人(尤其是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

为了保证集体农庄制度的正当运行,村子里建立起了一些

① 《东方真理报》社论,1946年8月24日。

② 同上,1946年10月5日。塔什干州党委第十六次全体会议。

③ M. Rywk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Structure in Uzbekistan, 1941-46*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附录,表25。

④ 同上,表23和24。

连锁控制。在党的这一环，集体农庄委员会及其主席的工作由集体农庄党组织来监督，后者又由负责邻近若干农庄的当地拖拉机站党组织来监督。区的农业部既是直接地，又是通过当地拖拉机站的报告来控制集体农庄；不可缺少的农业机械都集中在当地拖拉机站手中^①。区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是通过各个村苏维埃的环节来施行控制的。反过来，区党委又对上列一切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并向各集体农庄分派交粮的份额。此外，它还忙于直接插手办其他许多事情。

在所有这些当地的控制之上，集体农庄还要进一步碰到来自代表州一级的某个官僚机构的检查员的麻烦。检查员要急切当场检查情况，就越过经常犯夸大生产成就和掩饰缺点的毛病的区一级的官员。塔什干的报纸《东方真理报》登过好几篇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来自哈特尔契的骗子手》（1943年9月12日），《在“其他开支”的名义下浪费牲口》（1944年7月19日），《骗子手在阿克河受到袒护》（1944年6月24日）。

犯罪案件经常被提到法庭^②，可是贪污、盗窃和浪费事件多得不可胜数，很难进行一次彻底清除。在农村地区，想打破当地官员的有利可图的“家庭圈子”非常困难。《东方真理报》报道过一桩关于农村检查员K的故事。他在当地的消费合作社、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中都发现了盗窃和贪污。虽然K向区检察官

① S. P. Trapeznikov: "Istoricheskaia rol MTS v sozdanii i ukrepleni kolkhoznogo stroia" (特拉毕兹尼可夫:《机器拖拉机站在建立和巩固集体农庄中的历史任务》), Vosprosy Istorii KPSS, № 2 (1958), p. 52. 最近, 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都卖给了集体农庄, 机器拖拉机站本身已取消。

② 例如, 见《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检查机关》(V prokurature UzSSR), 《东方真理报》, 1943年12月17日。

和党的官员提出了确凿的证据，可是那些犯了罪的人却从未受到任何严重处分。理由很明显：K走错了一着。他攻击了当地的区委书记的兄弟和一些好朋友^①。这种情况，在四十年代初期，由于战争期间的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变得很普遍。革除负责的经理人员并不是一桩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在萨马尔罕州的三十五名拖拉机站站长中，一年之内就换了十三名。在某些区，这类撤换一年中发生了两三次^②。在1944年的前三个月之内，萨马尔罕的州农业部撤换了十二名农学家、十一名机械师、四名区经理、四名拖拉机站站长和五名拖拉机站的簿记员，可是仍没有制止住当地拖拉机站系统之间进行着的非法的零件买卖。同时期，几乎所有的拖拉机站都在春播运动中完不成计划^③。集体农庄主席的撤换率也同样是很高的。据报纸报道，在费尔干纳州的一个区里，四个月之内就撤换了二十八名集体农庄主席。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遭到撤换是由于能力不够^④。有一个例子是，被革除的人是两个月之前才强派到集体农庄庄员头上的。看来也许奇怪，要知一个工作犯错误的主席，往往又被调到另一个农庄去担任主席^⑤。然而，错误严重的例子往往要闹到法庭才

① M. Dubinskii: "V Ak-Darye pokrovitelstvuiut zhulikam" (杜宾斯基:《在阿克河地方对骗子手的庇护》),《东方真理报》,1944年6月24日。

② 同上,1943年7月28日。

③ M. Dubinskii: "Nikuda ne godnyi stil raboty Samarkandskogo Obl'zo" (杜宾斯基:《萨马尔罕州地亩处的工作作风到哪里都不适用》),同上,1944年5月14日。

④ 《东方真理报》1941年1月29日承认,“去年不得不更换了约十名由区党委推荐〔读作:任命〕的集体农庄主席。”

⑤ S. Galitskii: "Nepравilnyi podkhod k vospitaniiu kolkhoznykh kadrov" (加立茨基:《对培养集体农庄干部所持的不正确的态度》),同上,1944年5月24日。

能结束^①。

党能得到这些人力资源不得不感到满足了。在当地官场中,比较有资格的人不多见,而经济条件,特别是在战时,又是这副样子,在各种压力、要求、威胁、缺乏、效率不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即使是能干的人也会很快就腐化的。¹¹²

本地的穆斯林党员

如果不对本地党员个人、他的出身、他在自己的社会中的地位、他同俄国人的关系、他的入党动机、以及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的程度等等作一番描绘,中亚的党组织的形象便不会完备。

斯大林为了要使中亚各共和国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曾宣布过一条要由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遵循的路线:

(一)……建立工业基地,以作为把农民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基础。……

(二)发展农业,首先是兴修水利。……

(三)开展和推进农民和手工业者广大群众的合作化工作,这是把东方各苏维埃共和国纳入苏维埃经济建设总体系的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苏维埃接近群众,使苏维埃的成分民族化,从而建立接近劳动群众并为他们所理解的本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五)发展民族文化,广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苏维埃干部、党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经济干部^②。

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按照斯大林的话,必须了解各民族的愿望:

① 《东方真理报》,1944年5月14日,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在布哈拉,另一个在萨马尔罕州。

②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5页。

俄罗斯的共产党员不能同鞑靼的、格鲁吉亚的、巴什基里亚的沙文主义〔读作“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如果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担负起反对鞑靼的或格鲁吉亚的沙文主义斗争的艰巨任务，那末这一斗争就会被认为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反对鞑靼人或格鲁吉亚人的斗争。这就会把全部事情弄糟。……只有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才能顺利地同自己的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进行斗争^①。

而且，本地共产党员还必须记住，要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严格地听从莫斯科的命令。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后《真理报》上所指出的：“全体乌兹别克人民，无论老幼都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成就应归功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归功于他们的老大哥俄罗斯人民。”^②早在1929年，当苏联领导人之一加里宁想用简单的词句来说明苏联在中亚的政策目标时，就表露过这种思想。当时他说，苏联政策的目标是“把列宁格勒工人的理想教给吉尔吉斯草原的人民、乌兹别克的小棉农和土库曼尼亚的园丁。”^③

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遵循斯大林的路线在中亚推行了一场社会革命，包括农业集体化、三个五年计划、一次大规模俄国人移民、历次小清洗、一次“大清洗”、反宗教运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解放妇女”运动、扫盲运动、字母改革、地方行政改革、宪法变换，以及一连串其他变换、运动、改革和计划等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乌兹别克的小棉农”被迫加入了集体农场，他的儿子到城市里去工作了，他的女儿摘下了面纱，他的“毛拉”被赶走了，并且他的较为机会主义的亲戚中有一两位已参加了执政党。他不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217页。

② 《真理报》，1946年11月2日。

③ 如巴洪(Barghorn)所引，见《苏俄民族主义》(Soviet Russ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69.

得不再三感谢他的“老大哥”和导师“使他的人民得到了文化和幸福”。^①他避免公开反对老大哥的理想，可是在接到关于德国人进攻俄国的消息时，心里泛起了一丝或许由老大哥遭到的困难中会产生某些好结果的希望，然而后来却发现自己为了俄国的胜利而劳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吃力。¹¹⁴

四十年代期间本地穆斯林党员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经济界优秀分子的成员。他们之中有集体农庄主席、生产队长、工厂厂长、公司经理、地方上的党政官员以及地位相仿的人物。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比一般人高得多，并享有随着他们的地位而来的种种优先权和好处。人们可以说，他们在苏维埃政权的顺利运行中，在完成生产计划方面和在获得宣传运动的成功方面，都有一种既得利益。他们能占有这样的地位，全赖当政的政权。

这里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本地的党员是从社会经济界优秀分子中吸收来的呢？还是他们在入了党之后才被提升为优秀分子的呢？事实上，党挑选新党员是在这样一些本地人民中进行的：表现愿意遵守和执行党的命令；具有领导的能力；有向俄国人学习更先进的“西方”组织方法的热情；有较一般人稍高的智力；而且没有顾虑；这一切都与渴求成功的强烈内心冲动联系着。虽然迫切寻求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然而缺乏教育并不是党内前程的阻碍^②。那些被选中的人一旦入党，很快便被提升到负责的岗位上。

下面所举的从一家地方报纸社论中摘下来的例子，说明了这类迅速提升是如何处理的：

① 见《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ia Pravda), 1952年11月15日。

② 《东方真理报》1946年10月5日声称，塔什干州某些区于1945年吸收的新党员中有半数是无文化或半文盲。

不久以前……k 是集体农庄的一个普通庄员……入了党之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k 开始更积极地工作了，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对自己要求更高了。这样就使她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成了集体农庄的副主席。^①

这个例子表示，提升到领导工作岗位是和拥有党证有直接关系的。

从担任管理工作的人员中吸收来的新党员，总是首先得到提升。新党员除了表现自己对工作和党的热忱以外别无选择，这样就能得到提升。用心不良或明显的错误可能导致严重的麻烦，包括降职甚而开除出党。被党开除的人要比从未申请过入党的人处境更坏。但是，由于具备最低党员条件的本地人为数极少，党也不能对他们要求过严。许多条件较好的本地人有的因巴斯马奇起义受到株连，有的逃亡国外。其他一些已经成为党员的，也已成了三十年代后期几次清洗的牺牲者。

结果是，四十年代的本地党员主要都是在清洗了老党员之后加入党的人。他们对共产主义不甚了解，更谈不上关心了。他们对马克思和列宁是何许人都一无所知。不管怎样，他们重视领导地位只是为了这种地位本身，并且以一种真正东方的方式欣赏着发号施令的乐趣^②。

甚至在五十年代后期，许多本地党的领导人，除了位列最高级的以外，都还保持着经常遭到政权斥责的穆斯林社会习惯^③。

① 《东方真理报》社论，1943年10月23日。

② John Parker, "Impressions of the Soviet Middle East" (约翰·派克:《苏维埃中东印象》),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33 (1946), 描述了他如何受到一位地方上的穆斯林党书记款待的情形。这位书记在命令一位艺术家露面时，像革命前的日子里埃米几的做法那样，拍了拍双手。

③ 狄纳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苏维埃化——第一代》，第509—513页。

这包括妇女不外出^①、包办婚姻和娶媳妇要给彩礼等。一位外国专家在五十年代中期这样描绘道：

在共青团员、集体农庄主席和地方上的党的官员中间，都有实行一夫多妻的例子。穆斯林党员继续把妻子深藏在闺房中，即使后者是苏维埃的主席或合作社主任也是这样^②。

忌嫌猪肉、遵守最重要的穆斯林宗教节期，以及慢腾腾的东方生活方式仍是普遍现象。一位富裕的乌兹别克人对一个英国旅行者说，“我们在萨马尔罕已经快乐了很多很多年了。真主很好，土地又肥沃，人们为子孙满堂祝福。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还要开这么些会、读书、写字干什么？都不需要。”^③另一位村里的长者在回答关于在田里摘棉花的妇女的问题时，也表露了同样的传统看法。他的结论是：

“这些人既不需要零件，又不需要维修，而且工作得很好。干嘛要用机器呢？”^④

本尼格生认为，“俄国人和穆斯林虽然比邻而居，可是绝不混杂在一起。”他还坚称，穆斯林知识分子即使已经“非伊斯兰化”，也不会受到俄国人的同化而采取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继

① 派克：《苏维埃中东印象》，第349页，说道一所为当地的一位党书记建造的房子里有单独供妇女居住的房间。Walter McKenzie Pinter: "Initial Problems in the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 (华尔特·麦肯齐·品特：《中亚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初步问题》)，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XL (1953), p. 295, 声称替当地工人新造的房子也是同样情况。

② Andre Pierre: "Religion in Soviet Land" (安德烈·比埃尔：《苏维埃土地上的宗教》)，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IV, № 3 (1955年5月—6月), p. 26. 并见《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第470页中关于第十三届乌兹别克党代会（1956年）谴责许多本地党员对妇女持封建态度一事。

③ 帕特里克·萨金特：《通向萨马尔罕的另一条路》，第130页。

④ 同上，第121页。

续保持自己的方式^①，至少就私生活而言是这样。

在战争年代，民族主义的思想状态导致了地方沙文主义的重现。对内战时期苏俄军队的行为的回忆，不会对苏维埃的目的有所帮助。“浩罕大屠杀”、“布哈拉大劫掠”，以及“卡塔·库尔干的伏特加浴”是不容易忘记的。三十年代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以及四十年代对大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强调，并不能有助于消除本地居民头脑中的旧印象。那些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倒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不热心去为俄国送命的原因^②。成千上万的中亚新兵从红军中逃跑或在被俘时投入了亲德国的土尔克斯坦队伍^③。本地人中大量躲避
117 兵役的人，在他们的同胞的心目中是值得同情的。负责当地的征兵委员会的俄国军事人民委员看来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为了抓住逃跑者，在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还把惯盗都组织了起来。斯大林格勒一战以后，把穆斯林入伍人员派至所谓的“劳动营”（工作队）而不派到战斗部队里去，已成了普遍的措施。然而，地方报纸上仍是充满了关于本地士兵在前线抗击德军的英雄事迹的报道。虽然有一些中亚本地人是在前线打仗而且打得不错，可是只有少数穆斯林兵员被交给战斗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情形曾由土尔克斯坦的一位移民贝伊米尔扎·海伊特^④描绘过，但不幸的是，他的叙述也包含了一些毫无根据的论

① A. Bennigsen: "The Moslem Intelligentsia in the USSR" (本尼格森:《苏联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Soviet Survey, № 28 (1959年4月—6月), pp. 9—10.

② 杜比茨基:《土库曼尼斯坦的不忠分子》,第43—47页,并按照波兰难民的叙述。

③ 卡罗:《苏维埃帝国——中亚的土耳其人和斯大林主义》,第246—253页。沙法罗夫:《殖民地革命[土尔克斯坦的经验]》,第80,83,91页。

④ Baymirza Hayit: Turkestan im XX Jahrhundert(贝伊米尔扎·海伊特:《二十世纪的土尔克斯坦》), Darmstadt: C. W. Leske Verlag, 1956, pp. 344—346.

断。海依特一方面正确地强调了许多穆斯林为了躲避兵役而逃入中亚山区的事实,另一方面,他所描写的说这一批逃跑者在进行反抗俄国人的游击战一事,却无法得到其他作家或当时散布在这一地区的波兰难民们的证实。据海依特所描写的关于一万来名塔什干的穆斯林居民于1943年6月23日攻击塔什干警卫队一事,甚至连当时住在塔什干的人也毫无所知,从未听说过。本地人在战争期间对俄国人的事业缺乏热情一事,所表现的方法要谨慎得多,没有那样英勇。

在苏联,也正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私人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俄国俗语中通称为“布拉特”的这种私人关系,是打开大门,免去官样文章的灵咒。在苏维埃中亚,穆斯林经理人员和领导人员每当被牵连到同俄国人(官员及其他人等)的私人纠纷¹¹⁸时,他们便相互袒护,这在四十年代是很普遍的事。那种彼此假公济私的行为同俄国人中间的类似行为很相像。在某些遥远的地区,亲密的朋友们还是以他们传统的方式经营着集体农庄,政府的检查员往往只用贿赂就能打发走。在文化方面,有势力的本地人试图在办公室、工厂和机关里同俄语一起硬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许多“西方化”了的穆斯林在穿着、饮食和礼节方面都表露出对当地传统的明显的爱慕,露骨地强调着他们同本地群众的团结一致。想在自己的文化遗产,俄国入侵之前的历史、穆斯林传奇故事、群众歌曲以及民族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倾向,在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普遍。

当局对这种行为的不愉快的含义十分清楚,并且在尽力加以消除。它反对本地领导人员之间进行“互助”的最保险的办法,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即把党政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关键性的职位保留给俄国人,并向每一名重要的本地官员配备一名俄国

副手。一切办公室工作都用俄文进行（除了集体农庄以外）后，连民族沙文主义者也被迫学俄文了。加紧了国家的控制之后，消除了遥远的集体农庄的实际上的自治。为了要使本地社会达到合成一体，政权当局一味颂扬“西方的”生活方式，而把传统的穆斯林方式说成是落后的和反动的。

虽然党作了努力，但是中亚的两个主要社会，穆斯林社会和俄罗斯社会，从未合成一体。各人仍过着自己的生活，很少相互掺混。

第八章 党的机构(以 烏茲別克斯坦为例)

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

四十年代

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中，最高权力机关是它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其中的书记处。它是真正的权力所在地，同时又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看门狗。这和莫斯科那里的类型是完全一致的，在那里，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时代完全被它的政治局（现在的主席团）和书记处所盖过。斯大林作为书记处的首脑，在党内和政府内都占着上风。书记处有一套细致的组织机构，其中对监督工业和农业的部门特别重视。

在战争年代，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政治力量，由五名书记——第一、第二和第三书记，宣传鼓动书记和干部管理书记——和三名部首长——组织教导部（现在的党内机

关部)部长、军事部部长和特别任务组组长——组成。虽然一个组是一个部的下属部门,但是特别任务(警察)组由于重要,通常是另行考虑的。

书记处的许多经济部门可以分成三类来谈更方便些。它们¹²⁰是:重工业和电力一类,消费品一类和农业一类。

第一类包括六个主要的部,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那些对战争努力有关键意义的经济部门;第二类包括那些主要是处理从事生产供地方上利用和消费的货物和商品的经济部门的部;第三类包括照管主要农业部门的部。(见 113 页表六)

在书记处内的八个“政治”职位中,有五个在整个战争期间是由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担任的。这些职位包括第二书记、第三书记以及掌握大权的组织教导部部长、军事部长和特别任务组组长。穆斯林只被委派了三个职位:第一书记,干部管理书记和宣传鼓动书记,所有这三个职位的工作都要同当地人民直接接触。

在十二个经济部中,只有两个由穆斯林所掌握^①。一般的办法照例是为部首长设置一个不同族的副手。在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二十二个主要职位中,本地人只占了六个,同欧洲人所占数目几乎成了一比四的比率。这些数字表明,本地共产党员在他们“自己的”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仍然是少数。

五十年代

关于战时局面的继续,同当代的情况作一番比较就能说明问题。战时局面毕竟可能受制于当时的紧急情况。斯大林的逝

^①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2。

121 世，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及山之而来的对少数民族的自由化政策，想象可能改变局面。然而，能证实这一看法的证据却很少。

苏俄对乌兹别克斯坦当地的党机构的控制，不论从外部或内部都毫未放松；主要的党内职位依然由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担任着。在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内，第二书记一职从未离开过俄国人的手^①。本尼格生在一九五九年时这样说道：

第一书记是出头露面的人物，永远而且到处都是由“本民族”担任，而第二书记，同时又是干部书记，因而控制着整个党的领导阶层，所以也是整个党的领导阶层的真正首脑，永远而且到处都是由俄国人担任^②。

把第二书记一职同干部管理书记一职结合在一起看来是个新发展，它加强了俄国人对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在战争年代，干部管理书记一职是单独设置的，通常由一名本地人担任。新近的改变显然加强了由俄国人担任的、本来就权力很大的第二书记的地位。

如果从民族的角度来估量职位分派情况的话，那么，欧洲人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中所占的比率（1958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占百分之三十一，在哈萨克斯坦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在吉尔吉斯斯坦占百分之三十四，在土库曼尼斯坦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在塔吉克斯坦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本身就表明了俄国官吏的力量^③。各个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中欧洲人所占的比率还要高

①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 1941—1946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表 1 和 26。1961 年也一样（见《东方真理报》，1962 年 2 月 5 日）。

② 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同上书，第 8 页。

③ 本尼格生辑自下列报刊：《哈萨克斯坦真理报》(Kazakhstanskaia Pravda) (1956 年 1 月 27 日)；《苏维埃吉尔吉斯》(Sovetskaia Kirgiziia) (1956 年 8 月 27 日)；《土库曼火星报》(Turkmenskaia Iskra) (1956 年 1 月 27 日)；《塔吉克

些，即从在吉尔吉斯斯坦所占的百分之五十到在所有其他中亚共和国所占的百分之四十到四十四点三之间^①。

这种局面引起了英国的中亚事务观察家瓦尔特·Z. 莱克 122 尔的注意：

苏联的国内政策……仍然被一种对中亚共和国的本地分子极端不信任支配着。这些地区的重要职位依然保留在俄国人的党书记手中。……更有甚者……当在本地的领导人中间进行全面清洗的时候，这些俄国人干部仍留在自己的岗位上^②。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把东欧的共产党同苏维埃中亚的共产党相提并论。在前一例子上，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各自不同的“民族共产主义”政党。而在后一例子上，从民族的政党这一字眼的严格意义来讲，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政党。由于党并不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因而它的穆斯林党员不仅要碰到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的控制，而且还要碰到来自他们自己的首都——在那里俄国人和其他外来人已牢实地掌握了党的机构——的俄国人的控制。

政府和党

党高于平行的政府机关，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根据苏维埃公共管理事务专家的说法，这种至高地位是以下列原

斯坦共产党人》(Kommunist Tadzhikistana)(1956年1月31日)和《东方真理报》(1956年1月29日)。

① 汉斯·考赫和列欧·比拉斯：《苏联的斯拉夫人和亚洲人》，第429页。

② Mark Alexander (W. Z. Laqueur)：“Tens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马克·亚历山大〔莱克尔〕：《苏维埃中亚的紧张形势》)，The Twentieth Century(1951年9月) p. 193. 并见唐顿：《苏维埃中亚》，第131页。

则为根据的：

1. 党和政府的领导阶层已合而为一。
2. 党对选举和任命有控制权。
3. 沒有适当的党的指示,任何重要问题都不能解决。重大事件则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共同决议来处理。
4. 党决定并指导起草计划。
5. 一切苏联的机构中都有党的组织。它们负责在党外群众中贯彻党的路线。
6. 党员不论地位高低,都受党的控制,服从党的纪律。
7. 党组织监督相应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并通过地方上的党组织把党的决定贯彻到企业、公司和集体农庄一级^①。

通过层层管理机构的每一级,从克里姆林一直到中亚最边远地区的区行政部门,党都保持着这种超越一切的地位。按照前面所列的官方定义,党肯定要比政府“高出一筹”(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然而后者仍是主要的行政机构,虽然它的活动受党的指导和控制。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工作主要包括执行来自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指示。一位西方专家裘连·陶斯特这样说道:“联邦权力的超乎寻常的范围,使人在加盟共和国内部很难再看到留有什么制订政策的权力的余地。”^②

鉴于加盟共和国的预算,包括其中一切重要的细节都是由莫斯科来编制,可见上面所说的话特别真实。

① S. S. Studenikin, V. A. Vlasov, I. I. Evtikhiev; Sovetskoe administrativnoe pravo (斯杜杰尼金、符拉索夫、叶夫季希耶夫:《苏维埃行政法》), Moscow: Gosizdat Iuridicheskoi literatury, 1950, pp. 6—8.

② Julian Towster: “Recent Trends and Strategies in Soviet Federalism” (裘连·陶斯特:《苏维埃联邦制度最近的趋势和战略》),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III, №. 2 (1952) p. 165.

四十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斯大林宪法”把加盟共和国的部分分成了两种：

1. 自治部（即莫斯科没有相应的中央部）纯粹处理地方上的工作，只有在涉及中央政府发布的基本法律和政策原则的问题上，才从属于莫斯科。这类部（在1946年以前被称为“人民委员会”）有社会安全部、地方工业部和社团经济部，后来又有教育部和公路运输部。

2. 下属部（下属于莫斯科相应的中央部）在莫斯科的计划和监督之下处理地方上的工作。这类部包括下余一切部。

地方一级的自治部和下属部的职员全部从州、区或市当局支薪。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则由于工作中涉及安全领域，都自行照管选用它们的人员和开支。一些重要事务，诸如供应、外交、对外贸易、交通运输、航运、国防、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等，则直接由莫斯科处理，因为在加盟共和国这一级没有设相应的部。在地方上工作的属于这些中央部的官员，直接向中央当局负责，越过一切地方当局^①。在战时，有一批中央部的特别代表被派在中亚工作，他们把地方上的代理人的要求直接上达莫斯科，并且向地方当局催征人力、原料和一切优先供应物资。

战争时期的部长会议中的部长职位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般行政管理、工业和贸易以及农业。一般行政管理类（十一个

^① 见约翰·海扎德：《苏维埃公共行政和联邦制度》(Sovie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Federal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第20卷(1949年), 第7—8页, 以及《苏联宪法和加盟共和国宪法》(Konstitutsiia Soiuza SSR i Konstitutsiia Soiuznykh Respublik), Moscow: Iuridizdat, 1938.

职位)包括总理(当时叫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襄助他的副总理
125 三名或更多一些、和负责司法、内务、国家安全、国家监察、财政、社会安全、卫生、教育、外交(1944年开始)等工作的人民委员(后改为部长)以及加盟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参与工业和商业的有十一个部,负责农业、畜牧^①业和灌溉的有四个部(见 113 页表六)。

在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一直是由乌兹别克人担任的。总理、党的第一书记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三个职位所以由本地人担任,看来似乎是想使本地穆斯林群众(以及国外舆论)相信各加盟共和国真的已享有料想中的自治权^②。乌兹别克总理一般都由三名以上俄国籍或乌兹别克籍的副总理襄助^③。在 1941 年到 1946 年之间,绝大部分部长职位都是由穆斯林担任的,只有国家安全部一直由欧洲人来领导^④。外交部长一职自从 1944 年设立时候起,也一直顺理成章地由乌兹别克人担任。他同外国没有建立任何联系,始终是一个纯粹的点缀门面的人物。新建立的国防部长一职从来没有人担任过,不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在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也是如此^⑤。苏联历史上

①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 1941—1946 年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结构》,表 5、6、7。

② H. Carrere d'Encausse: "La politique musulmane des Soviets dans une republique plurinationale le Daghestan" (加雷勒·唐高斯:《苏维埃人在达格斯坦的多民族共和国内对穆斯林的政策》),载《非洲和亚洲》第 34 期(1956)第 37 页,认为这一政策在联盟和在自治共和国都是标准政策。

③ 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第 54 页。

④ 刘金,同上书。

⑤ W. W. Kulski: *The Soviet Regime. Communism in Practice*(库尔斯基:《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的实践》),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94, 证实了加盟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本职上都毫无任何活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除外)。

的第一位乌兹别克外交部长后来竟由于他的“活动”（毋宁说是他的不活动）而被擢升为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织教导部副部长的职位，以示奖励，这一职位比起像乌兹别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部长来，负的责任更大^①。

穆斯林的农业部长有若干名欧洲人当副手，各人都负责特定的工作^②。在紧急情况下，俄国人副手不仅可以进行幕后活动，还可以公开的擅自作主。因而那项禁止集体农庄及其庄员在沒有完成缴纳公粮任务之前出售粮食的重要法令（1943年）就是由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俄国人副主席签署的，而不是由他的乌兹别克上司签署的^③。

乌兹别克部长会议中穆斯林部长所占的比率达总数的五分之四，使得部长会议的民族成分恰好同党的书记处的民族成分相反。然而，每一个部都受到书记处的一个相应的部的控制。因而本地的穆斯林部长们除了要受到俄国副手的襄助之外，还被置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内相应的部首长的监督之下，而后者往往总是欧洲人。在重工业的例子中，俄国的部首长的作用显得更加出色，因为在塔什干并没有相应的部长职位。

这样，经济活动的一些重要部门便被摒除在当地政府的管辖权之外，可是仍在乌兹别克党的书记处的管辖范围内。（见113页表六）不过书记处在那里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监察，而是在经营建立或撤退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工厂方面取得地方当局的合作。

党的书记处、部长会议以及州的党和苏维埃机关之间，人事

① 《东方真理报》，1944年12月27日，10月20日和1945年3月11日。

②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7。

③ 《东方真理报》，1943年9月28日。

更迭非常频繁。官员们从政府岗位转到党的岗位上去十分方便,反过来也一样,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是从同样的党的名单上抽调的。

128 党的人员的调动可以分作三个方向:贬降、提升,以及同级调转。若是贬降,这个有关人士的姓名往往是以后就不再提了,因为贬降时常意味着监禁。另一方面,提升可以在本机构内进行,也可以调转到另一地区或另一行业去进行。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官员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的轮流调换的总倾向,其动机是想不让他们在地方上取得牢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导致贪污腐化和引用亲戚。在对许多党的官员的履历进行查考之后,看起来很清楚的是本地穆斯林官员倒很容易得到提升,而许多俄国官员通常只是在同一级上的几个关键职位上调动。本地的党的官员的前程几乎总是限于在他的本州范围内发展,而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则时常不仅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而且还从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调到另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在1946年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米海依尔·巴斯克柯夫的经历是颇具特征的。下面是他在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之间所担任的职务:

1938年—1943年 卡累利阿-芬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1943年—?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46年—1950年 乌兹别克国家安全部部长

1950年—?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
首脑

1952年—1958年 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部长^①。

^①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Munich); Biographic

很可能在莫斯科有某一类的“殖民工作人员处”，从中可以抽调专门从事“殖民管理”的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官员来担任苏维埃中亚的党内高级职务。这些深获信任的人组成了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党机关能够依赖的、而且又能团结地方党员的核心。一家土尔克斯坦移民的出版物对于这种情况作过正确的描绘，不过它同时又错误地想替本地的共产党官员开脱他们应对苏联在中亚的政策所负的任何责任：

土尔克斯坦的苏维埃部长大多数是土尔克斯坦人，而副部长们都是俄国人。“部长们”事实上是被任命来当傀儡的土尔克斯坦人，真正的工作是由他们的“副手”来做的，……莫斯科从土尔克斯坦人民中挑选出来的傀儡部长们并没有权力采取任何独立的行政措施，……

因此，就不应该让土尔克斯坦的部长们来对强加于土尔克斯坦的苏俄政策负责。归根结蒂，他们不过是莫斯科的临时僕人，从制订政策方面来看，他们一直是受苏联政策的统治的。因而部长至多是个执行官，实际政策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正是由于这样才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即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的书记要比共和国的主席或总理拥有更大的权力。相对地，党的某个特殊部门的部首长要比一个部长有更大的行动权力。在这一整套官方监督网之下，土尔克斯坦的部长除了屈从于莫斯科的命令之外，别无他法^①。

**表六 四十年代中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经济部门
及乌兹别克斯坦相应的政府部门**

书记处的监督部门	受监督的政府部门
重工业和电力：	
工业*	{ 在塔什干没有相应的部； 由莫斯科的联盟各部直接 控制。
化学工业*	
电站*	

Directory of the USSR, New York: Scarecrow Press, Inc., (苏联研究会：《苏联人名录》)，1958, p. 66.

① M. H. Yarcck, "Moscow's Administration in Turkestan" (雅塞

动力和燃料*	
交通运输*	——公路运输 ^b
消费品:	
建筑 and 建筑材料 ^a	{ 建筑材料 木材工业
食品 ^c 、纺织和轻工业	{ 纺织工业 轻工业 ^b 香料工业 食品工业 肉类和乳品工业
贸易和公众服务业*	——商业 ^d
地方工业*	{ 地方工业* 社团经济
农业:	
农业*	{ 农业 灌溉*
畜牧业	——畜牧业
国营农场*	——国营农场

材料来源:《东方真理报》(塔什干), 1941年至1946年。

* 1941年至1946年由欧洲人任首脑或部长。

a 1944年以后由欧洲人任首脑。

b 1943年以后由欧洲人任部长。

c 1943年以前是单设的部门,由欧洲人任首脑。

d 1943年以后由本地人任部长。

五十年代

给本地人的部长委派上欧洲人副手的政策,在五十年代仍全部保持着。虽然本地人在部长会议中占多数(1955年在二十

克:《莫斯科对上尔克斯坦的管理》, Milli Turkistan, № 6 (11), 83 (1952年12月—1953年1月), pp. 34—36.

一人中占十六人)①,若干更重要的部长职位在 1957 年至 1958 130 年仍由欧洲人担任。灌溉部长(在乌兹别克斯坦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因为灌溉对农业是必不可少的)是一名俄国老官僚,他曾在战时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第三书记。交通部长、公路运输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原为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中的民兵(警察)首脑都照例是俄国人②。

这种情况并非乌兹别克斯坦所独有。根据本尼格生的说法,在 1957 年时,俄国人在所有五个中亚共和国中还掌握着政治警察(国家安全工具)和交通,在其中三个共和国中还掌握着国家计划,在其中四个共和国中还掌握着地方工业③。

州的党机构

结 构

一谈到联盟共和国中的党的结构,人们往往只指最高一级,然而对苏联的公民大众来讲,他们自己地方上的党委会许多年以来一直要比远处首都的、拥有强大权力的高级党机关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

地方上的党组织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替选举准备传统的苏维埃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多数选票而建立的“政治机器”。没有他们的批准,区里成百个职位和州里成千个职位(都属于当地待遇最高的职位之列)都无法到手④。而且,

① 在哈萨克斯坦每二十四人中有十人;在吉尔吉斯斯坦每二十人中有十六人;在土库曼斯坦每十九人中有十三人(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第 7 页)。

②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 1941—1946 年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 28。

③ 本尼格生:《苏联和殖民地革命》,以及加雷勒·唐高斯和本尼格生:《苏联各穆斯林共和国中的表面权利和实际权利》,第 62 页。

④ Louis Nemzer: “The Kremlin's Professional Staff” (鲁易斯·奈

“由于只有通过向党‘献身’才能打开通往权力和物质特权的道路，……”^① 因此对每一位热中于钻营的人来说，这种任命权是必不可少的。党委会的职权几乎涉及一切领域。它要“对本州
131 所有经济企业完成计划负责，因而就必须同本地区的全部经济生活保持联系，并不断迫使工厂和集体农庄去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它们订下的指标^②。”至于苏维埃公民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州党委对之就像一个有权批下最后裁决的权威一样。它像比它高的上级一样，并不是由整个党委会来进行日常工作，而是由它的书记处或局来进行日常工作。自从三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典型的州党委是由书记们和部门首脑组成的；局看上去很像一个扩大的书记处，除了包括上述成员外，还包括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州共青团第一书记、州党报的总编辑以及国家安全部队的首脑和州军队的首脑^③。州党委书记处的结构也经历了好几次变动，多半是撤销和恢复一些经济部门，合并或分设某些部门，以及改变局内书记的人数（莫斯科也进行过许多次这类机构上的变动）。这些变动通常是由于特定时期的实际需要以及领导上管理方法的改变而发生。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州党委在四十年代的一般结构可见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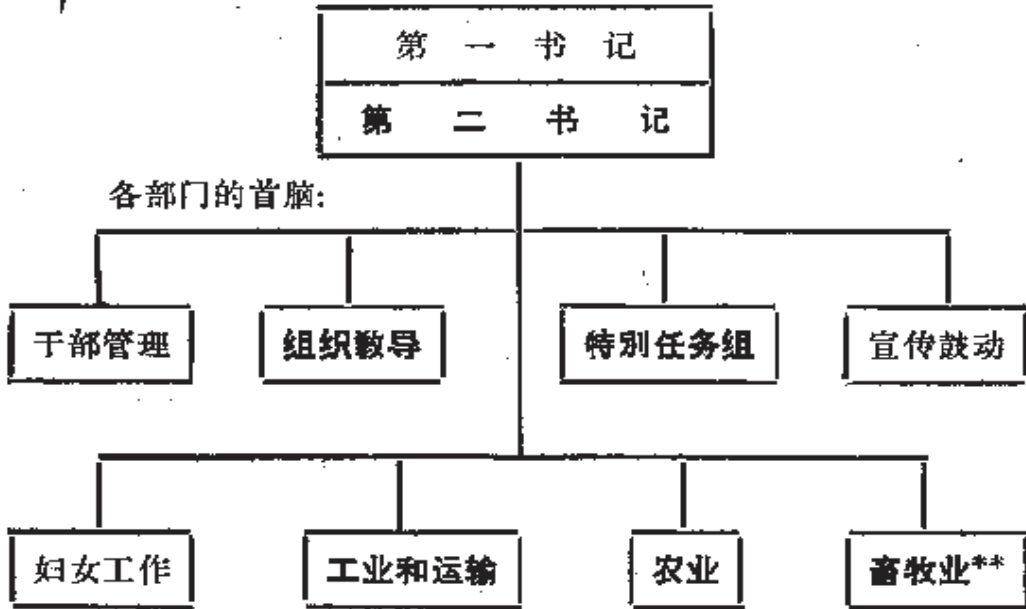
在某些州还设有一些别的部门，而在农业地区就不设工业

姆泽：《克里姆林的专业队伍》，*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LIV (1950年3月) p. 65.

①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米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 A. Praeger, 1956, p. 60.

②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默尔·费因索德：《俄国是如何被统治的》),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92.

③ ——,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同上作者：《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67.



资料来源:《东方真理报》(塔什干)。

* 通常由欧洲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欧洲犹太人等)领导的部门都以黑体字表明。

** 俄国人也像本地人一样经常负责领导畜牧业部。

部。上面所述的党的机器,其目的是要领导、咨询和控制政府部门而不是代替它们。可是,地方政府当局时常被相应的党的机构弄得一筹莫展,因而就企图把责任的重担推给更高的领导来掩护自己^①。这种情形原因很明显:地方上的政府人员是根据党的推荐而雇用或解职的。甚至连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日期也不由自主,而要由州党委来决定。重要法令一向是联合发布的。这样,地方政府当局的被动处境就不言自明了。¹³²

看起来州党委内的某些职位往往总是在欧洲人手中,而其他一些职位总是在本地人手中。经过把所搜集到的有关乌兹别克斯坦全部九个州的资料进行比较之后,这种人员配置的事先安排性质就再也毋庸置疑了。总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格鲁

① 《东方真理报》,1941年6月20日。

吉亚人负责大多数经济部门和组织教导部、特别任务组。第二书记一职也属欧洲人的范围，这在1956年至1958年仍是这样^①。另一方面，本地人负责宣传鼓动、干部管理、妇女工作，以及少数经济部门。第一书记一般都是本地人^②。

对于这种局面可能引起的一些问题，也许会提出某些合情合理的疑问。人们时常认为，党的第一书记是“这个小天地内的上帝和沙皇”^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本地的第一书记掌握着全权，盖过了他的俄国同事呢？还有，由本地人控制干部的管理，是否能被解释为这表明他们控制了当地的党的机构呢？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查核战争时期有关官员的党内经历来得到。在萨马尔罕州的连续六名党的第二书记中(全都是欧洲人)，有三名被提升到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其中两名早就在另一个州担任过第二书记。同时，萨马尔罕的连续三名本地的第一书记中，没有一个获得可以与之相比的党内成绩或资历。其中的一位(纳色尔·马赫慕多夫)于二十七岁时入党，同年1940年当上了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三年后他得到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④。萨马尔罕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外。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各州也是同样情况。

① 见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8—17，27。

② Bulaq Baschi: "The Country Which Has Not Yet Capitulated" (布拉克·巴斯奇：《尚未投降的国家》)，Milli Turkistan, № 6 (1953年4—5月)，p. 29，提供了五十年代初期苏维埃中亚的党书记中俄罗斯人所占的下列百分比：州党委第一书记——百分之三十；第二书记——百分之八十；区党委第一书记——百分之二十；第二书记——百分之九十；州党委部门负责人——百分之九十。前四个数字同我的1940年的数字相近。最后一个数字看来不论按1940年的标准或1950年的标准来衡量，都过于夸大。

③ 费因索德：《俄国是如何被统治的》，第192页。

④ 《东方真理报》，1946年1月27日。并见附录，表12。

即使那些并不直接关注民族问题的研究苏联事务的人也越来越承认第二书记在非俄罗斯地区的重要性。曼彻斯特大学的德里克·司谷特承认，“对于大多数非俄国人的第一书记来说，似乎都有一个处于几乎拥有同等权力的第二书记职位上的俄国人”^①。一位法国的中亚问题专家埃莱恩·加雷勒·唐高斯走得更远，声称第二书记一职在非俄罗斯地区是个更为重要的职位^②。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英国学者休·西顿·华生认为，由于战后在中亚进行的清洗牵涉到俄国人的第二书记最多，可见真正的权力是在他们手中^③。

在部一级，战争时期的干部管理部主要关心的是动员和调换在经营岗位和党的岗位上的党员以及非党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④。本地的干部管理部书记的权力受到他的欧洲人副手所起的作用的限制，特别是受到特别任务组的欧洲人首脑的重要性的限制，因为当地的党干部的政治可靠性是由他负责的。本地的宣传鼓动部书记完全是次要人物。在某些州，他们甚至被临时委派去照料农业，使他们疏忽了自己本来的职责^⑤。

组织教导部(现为党内机关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都是欧洲人的据点，它在州的党机构中起着第一手的作用。它除了监督下级党组织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传达中央官僚机构的指令，并且是执行党的指令的主要监查人^⑥。自从斯大林掌权之时开

① Derek R. Scott; *Russ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德里克·司谷特:《俄国政治制度》),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57, p. 165.

② 加雷勒·唐高斯, 同上书,《苏维埃人在达格斯坦的多民族共和国内对穆斯林的政策》。

③ 西顿·华生:《苏维埃民族政策》,第8页。

④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12页。

⑤ 《东方真理报》,1946年9月14日。

⑥ 卡林姆贝多夫,同上书。

始，这个部的努力就被指向“消除地方上的反对派和把党的官僚机构改造成坚决支持党的总书记的力量”^①。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层党员中间，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约占百分之五十一^②。在大战爆发前，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层党组织中的书记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点五是本地人。只有半数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或更高的教育，而有百分之九十二党内经历还不到三年。第二个数字可以由这样的事实很容易地加以说明，即自从“大清洗”结束以来，只不过三年时间。新干部或许还很缺乏经验，因为乌兹别克所有的基层党组织中有百分之八十点九的工作被判定为不能令人满意^③。在五十年代，欧洲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党员中所占的确切比率并不清楚。埃莱恩·加雷勒·唐高斯和本尼格生都承认他们对此事不了解。蒙戴伊给了我们下面的数字：1952年是百分之四十，1954年是百分之三十一^④，可是他的资料来源没有说明。

可以争辩说，由于不断缺乏有能力的本地干部才迫使党利用才资较高的欧洲人来服务。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欧洲人总是被委派到若干特定的部门，而把其他位置留给本地的党员。况且，欧洲人还受命帮助本地干部去完成党的任务。他们可能还得要使本地共产党员就范，防止他们中间产生民族主义的和分裂主义的倾向。欧洲人是骨干，没有他们，地方上的党机构便不可能存在下去。

① 费因索德：《俄国是如何被统治的》，第520页。

② 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第55—56页。

③ 《东方真理报》，1941年6月12日。

④ 加雷勒·唐高斯和本尼格生：《苏联各穆斯林共和国中的表面权利和实际权利》，第64页；以及蒙戴伊：《苏维埃的穆斯林》，第55—56页。

活 动

州党委的主要活动可以分作书记处的每日例行工作、局的会议和大会。

州党委的局有自己的工作程序，每八九天就得开会。每次会议的工作都围绕着一个多达一百个项目的议程。参加秘密会议的人数根据所讨论的问题而各次不同。除了局的成员外，还时常邀请党的指导员、区书记、集体农庄主席和工厂厂长们参加。大家都知道，随便哪个苏维埃官员、经理或主任，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召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去答复质问或聆受训戒。费因索德教授在述及三十年代俄国的斯摩棱斯克州时说道，“被召去出席局的会议往往意味着麻烦来了，不过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①，这种说法现在仍未过时。局关注一切党内事务以及下级党组织的情况。大量注意力被放在党的干部问题上——人 137 员的任命、调动和更换。经济问题——播种、收割、完成农业交售定额——和工业中的完成计划问题也受到极大的关注。

表面上讲，日常例行工作由政治和经济部门分别进行，每个部门都按照特定的进程表来计划自己的工作。可是实际上，政治部门一直非常关切经济事务。因而，1944年12月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宣传鼓动会议（由共和国各州和区的宣传鼓动部书记参加）结果成了只讨论增产棉花问题的会议。1946年3月间召开的一次同类会议也对同样的问题作了类似的强调^②。

这种重叠现象不断出现是有充分理由的。政策的制订一向不属于州党委的范围。在这一级上，从来没有打算在马列主义

^① 费因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第68页。

^② 《东方真理报》，1944年12月8日和1946年3月5日。

理论领域内发展过新的思想。大多数党员对于讨论那些成为党的正式教条的一部分的思想甚至毫无准备^①。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教育，如同苏联其他各地的一样，主要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有限智慧为基础的^②。斯大林主义的纪律性和服从性的铁的规定被严格地强制推行着。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借口下，已经没有什么进行真正“不受引导的”讨论的余地了。

被排除在制订决议（即使是有关加盟共和国的问题的决议¹³⁸也如是）之外的州党委，把主要力量花在完成上级为本州规定的目标上。这一任务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仅仅剩了一个主要目的——完成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作。结果是州党委的局起了某种巨大的经营委员会的作用，从所有主（国家）那里领取了权力来监督自己这个州的经济情况。费因索德教授在述及三十年代的斯摩棱斯克时说道，“有些时候，州党委会的局看来简直同农业人民委员会毫无区别。”^③ 读一读《东方真理报》关于萨马尔罕州党委在1941年至1946年之间所举行的全部会议和集会的报道，所看到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不是更趋于极端的话^④。战争期间经济责任的重担是丝毫也不轻松的。莫斯科为每一个中亚共和国定下了沉重的农产物交售定额。后者反过来又把定额

① 《东方真理报》，1946年7月31日。

② 见《苏维埃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预备学校》(School of Marxist-Leninist Preparation of Soviet Cadres) (同上，1946年12月1日)，以及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4日的法令。这一法令就《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提到了组织党的宣传工作的问題。

③ 费因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第70页。

④ 萨马尔罕州党委第二十次全体会议(1946年8月)表明，州党委也必须应付农业中的其他问題。那次会议全部用来讨论“采取什么措施加强反对(农民们自己)歪曲集体农庄的地位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斗争”(《东方真理报》，1946年8月17日)。

分配给各州。州当局又转而把负担分配给各区，区当局最后又把定额固定给所管辖的每个集体农庄。塔什干的报纸上充满了针对州领导在农业方面的缺点的相互指责。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刊登在《东方真理报》上的下列文章标题突出地表明了萨马尔罕党领导所受到的这类重大压力：“萨马尔罕的甜菜播种遭到破坏”(1943年8月16日)，“萨马尔罕的康拜因收割被糟塌了”(1944年7月9日)，“萨马尔罕的夏季拖拉机修配厂被毁”(1944年8月12日)，“萨马尔罕拖拉机修配厂被毁”(1945年2月7日)，“他们在拖拉萨马尔罕的收割和粮食交售”(1945年7月24日)，“萨马尔罕失去宝贵时机。棉花收获遭到威胁”(1945年7月25日)。

类似的有关乌兹别克所有各州的各项农业活动的文章，每年都出现。然而，言词上的压力还不是所用的唯一方法。为了139
要达到给州订下的生产目标，还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毫不顾及所付出的艰苦和牺牲。犯了罪过的人马上被撤掉。全州一场春播的失败就足以构成撤掉萨马尔罕的党的第一书记的理由^①。在所谓的“安集延案件”上，为了要加速农业生产，派了一名俄国的第一书记来到这一盛产棉花的地区。由于任务重要，本地的那位傀儡首脑暂时被抛弃了。新书记施展了铁腕手法——威吓和惩罚。有些集体农庄的主席受到了审判，被处以严厉的徒刑。安集延州在交售公粮方面一度领了先，于是报刊上便不时颂扬“安集延集体农民呼吁书”，呼吁其他州的集体农民超额完成交售公粮的定额。在还能维持满意的成绩界限的期间，没有人对新书记所作的方式的权利提出异议。可是两年之后，该州的牲畜

^① 《东方真理报》，1943年4月2日。

头数减少了一半，平均农业产量减到三分之二。于是莫斯科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提出了质询并撤换了他，所指控的罪名正是在他的计划遭到失败之前所容忍的那些罪名。安集延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一名本地人）也被撤换了^①。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指出这名罪犯所用的镇压手段时不得不承认：

当然，要开除这个或那个干部，对他施加惩罚或把他的案件诉诸法律，是再容易不过的。……而要克服工作本身的障碍，却要困难得多^②。

140 不幸的是，这类明智的思想很少纳入行动，失败总是和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因而安集延案件并没有导致方法上的重大改变，仅仅又换了一次人员而已。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副书记，也是欧洲人，匆匆赶到安集延来接管工作并弥补所遭受的损失。全乌兹别克斯坦各地都举行了党的会议，强调指出“安集延党组织的错误”足为大家的借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犯错误的人一旦撤职之后该州就开始产生奇迹了。在1945年的产棉季节中，《东方真理报》最初的几篇评论中有一篇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安集延州在植棉方面仍远远落在后面。”^③

经济部门的首脑们并不像负着全州责任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他们的行动范围比较有限。他们指导和控制委托他们监督的各个经济部门的活动。然而，他们的干预使备受催逼的工

^① 《东方真理报》，1943年10月1日，以及杜宾斯基：《自满的后果……》（M. Dubinski: Plody samodovolstviia...），同上，1943年8月31日。

^② U. Iusupov: “O nedostatках i oshibkakh v rabote Andizhanskogo Obkoma”（尤素波夫：《安集延州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上，1944年9月28日。

^③ 同上，1944年9月29日和10月17日；同上，1945年5月22日。

业经理人员又添了一重头痛，这些经理本来就被夹在一连串的上级、监查人员、监督人员之间弄得焦头烂额了。这些人物——他们自己的企业联合或部、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财务人员、国家监察部的检查官、莫斯科供应部的代表、地方上相应的党政当局等，意见也并不总是一致的。一个称职的部门首脑，需要有巨大的能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同时又不触犯参与制订官僚主义决议的人物的特权。此外，他并不经常能够贯彻自己的决定。有时候他所作出的并被局批准的决定，由于未能控制它的执行，往往仍是一纸具文^①。官僚主义的指令，在加上强迫命令的时候便¹⁴¹得到遵照办理，不然的话，下属机关若有幸获得另一项指示、指令或催促书，便会把它搁在一边或者用另一份文件来答复它。有好些这类指示从来没有走出过文卷柜（往往是幸而如此，有时候却不幸而如此）。

除了由经济部门执行的控制外，州党委有时还派一些委员到发生了严重缺点的地区去——譬如，去某一个特定的区监督农业生产运动的进程^②。这样一群人形成了真正区党委头上的领袖，防止了它为了卫护本区利益而对来自上级的压力进行抵制。

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的党的会议和全体大会，都是按照一种标准型式进行的：会议包括一项由州党委第一书记或第二书记所作的报告，或者，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由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亲自来作报告，他是经常参加会议的。以

^① “Stil raboty selsko-khoziaistvennogo otdela Samarkandskogo Obkoma Partii”（《萨马尔罕州党委会的农业部门的工作作风》），《东方真理报》，1945年4月10日。

^② 同上，1944年5月17日。

萨马尔罕的情况为例，被委派来担任这项任务的通常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俄国人第二书记^①。到五十年代后期仍是这样。在报告之后，接着总是讨论，参加者有区党委书记和工业、商业和农业企业的经理。报告的主题经常和前些时候在高一级的会议上讨论的主题相同。从一州到另一州的会议议程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行政问题方面（主要是关于在党的机构内部更迭官员等事）。州的国家安全部队的首脑们、州的警察（民兵）首脑和军事人民委员一般也出席会议。有一次，土尔克斯坦军区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②。高一级组织所通过的决议总是能得到会议的赞同并获得他们对完成决议的庄严保证。

除了定期的会议和全体大会之外，州党委还组织一系列经济方面的和专业性质的会议和大会，如“集体农庄优秀分子”会议、种植棉花的群众大会、“党的优秀分子”大会、党的经理人员优秀分子大会、组织教导部的各区首脑会议、宣传鼓动书记会议等等^③。某些比较重要的会议还有一位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参加。这种情况可以1942年7月在萨马尔罕举行的区际粮食会议为典型。那次会议的参加者有各主要产粮区的党书记、各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主任以及其他官员。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俄国人第三书记被从塔什干派来作了主要报告^④。

共和国内几家最大的工厂，属于从事国防生产的工厂之列，获得了“具有全联盟重要性的工厂”的名义，并被置于一种对

① 《东方真理报》，1944年10月17日和1946年3月5日。

② 同上，1946年8月17日和1942年9月19日。

③ 同上，1941年2月；1943年7月6日、8月17日和12月31日，1946年3月5日，10月1日等。

④ 同上，1942年7月10日。

当地党领导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位。后者不得干涉这些工厂经理的命令，他们是直接听命于莫斯科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派来的特别党务组织者负责照管这些工厂的党组织，他们直接向莫斯科负责。他们在工人中间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塔什干的报纸报道说，这些工厂中有一家刊行的报纸上登载的工人来信的开头是“由于您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关切”，或是“为了报答您的深切关怀”，并且信是写给厂长和党务组织者的^①。根据苏联最近的资料，乌兹别克斯坦只有十八家工厂获得如此特殊待遇^②。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形。在大多数情况下，州党委仍是全州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真正主宰。唯一能向它的权威提出挑战的人物，是军事人民委员和州国家安全部队的首脑，不过也仅限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内。

地方上的党机构——区和市一级

州的机构中有很多部分在区的机构中又重复出现。区党委的局就是按照州党委的局的型式建立的。整个区的官员，从第一书记以下一直到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主任，都得经由州党委的批准。区和市的党的官员的选举是按照各级苏维埃选举的总型式来进行。候选人由最上一级来“提出”。然后由基层中的某一个人向会上提出这个候选人的姓名，并获得“全场一致”的赞同。无论如何，共产党还是力图保持至少外表上的党内民主。因而像把选举视作形式而撇开一边并以公开的“互选”来代替的作法，一直是受到谴责的^③。

^① 《东方真理报》，1946年11月24日。

^② 卡林姆贝多夫：《为发展工业而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13页。

^③ “Gruboe narushenie vnutrepartiinoi distsipliny”（《粗暴破坏党的纪律》），载《东方真理报》，1946年8月20日。

关于区一级的党的特权阶级，在国外已较少有人写到，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区的机构则更少有人知道。在少数访问中亚的人物中，外国游客很少会在区的中心停留几个钟头以上。苏联区一级的报纸在国外是无法得到的。能够得到的唯一材料来源，只是塔什干报纸上不经常出现的报道，以及曾在那里住过的人们（多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个人回忆。下面的研究涉及¹⁴⁴到了萨马尔罕州所有的区，而对其中的一个区（扎明）特别注意。报纸的日期曾根据那些熟悉那一地区情况的人的个人经历核对过。虽然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两份材料来源还能说明一些问题。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区一级上，对重要职位所作的民族方面的分配完全是按照州一级的型式的。关于组织教导部和特别任务组的首脑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资料，不过作为州一级的党机构的特征的欧洲人第二书记的型式，显然保存下来了。在萨马尔罕州的二十一个区之中，有七个区在多半时间里有一名欧洲人的第二书记，而有一个区在严峻的战争年代中有一名欧洲人的第一书记。八个区缺乏资料。只有两个次要的区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都是本地人，萨马尔罕州的三个主要区也采取了同一型式。在市一级，在该州的三个市（萨马尔罕、吉扎克和卡特-库尔干）中，欧洲人的控制更强。从1943年到1946年，甚至萨马尔罕市的第一书记的职位也落入了欧洲人手中。完成任务的必要性压倒了缓和本地人情绪的愿望。例如在卡特-库尔干，第一书记和组织教导部的首脑都是欧洲人。吉扎克大概也是一样。在萨马尔罕市的城区（本地人的旧城，俄国人的新城和铁路区，多数是俄国人）中，只有旧城的党的第一书记是一位本地穆斯林^①。

^①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19和表22。

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府塔什干呈现了一幅俄国人主宰一切的极端景象。在战争时期,在塔什干市党委内,除了干部管理书记和第二书记之外,没有什么重要职位是由乌兹别克人担任的,他们只担任了少数次要的职位。所有接任的第一书记以及一半接任的第二书记都是欧洲人。欧洲人还负责组织教导、运输、动力和燃料、军备(多数时间)、宣传鼓动,以及轻工业和纺织工业^①。这又一次显示了优先考虑的是工作情况而不是当地的政治因素。

州党委对区党委的活动保持着密切的注意,使后者经常处于压力、监督和控制之下。区当局经常被淹没在指示的洪流中,这些指示涉及一切可能的主题,甚至有的是看来毫不重要的主题。区党委还必须提出报告,说明在党的工作、农业和许多其他领域中完成州的指示的情形。州的官员们的定期检查促使区的官员们紧抓计划,不敢怠慢。

在某些情况下,领导全区的是一个比州党委更有权威的当局——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自己。塔什干作出的决议是用指责的口吻写出的,其中充满了这类短语,如“指出”、“警告”、“负起责任”、“交代”、“通知”、“推卸责任”等等。在区一级,若要控制交售粮食,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它的农业部门的有效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保持后者的效率,有时州当局插进手来保卫他们抵挡比他们更有权力的区党委。可是对苏维埃的权威的抵消,在某些情况下竟达到如此不当的程度,以致招致了塔什干报刊的批评:

区党委竟不去帮助区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反而接管了后者的任务……

^①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表18。

另一方面，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官员们也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他们的工作就是签署联合决议和避免采取主动；他们并不试图独立地面对任何问题……

因此，集体农庄的主席们不去找执行委员会解决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宁愿直接向党委提要求^①。

区党委不仅发出指示和解决问题，它还任命集体农庄的主席而毫不考虑各个农庄的庄员们的意见。对集体农庄章程的不断违犯，人们已习以为常。区的官员们在处理集体农庄主席选举一事时所习用的方法，曾在《东方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过描写。在那件事上，区当局是由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首脑来代表的。他来参加集体农庄的会议时，农庄主席恰好在医院里。他告诉出席的人们选举他的一个亲信为新的主席，那是个声名狼藉的人，农民们很少知道他。他问道：“有谁反对吗？”“没有人反对吗？”于是某某人就被“全场一致选为新的主席”。集体农庄的另一名官员想表示抗议，说“我们已经有一位主席了，”但是他很快就被迫沉默了，他被“全场一致地”通过撤除公职，最后遭到逮捕。

147 这位新主席真是名不虚传：他马上卖掉二十三头羔羊，把钱装进了口袋。接着他以恐吓手段迫使抗议的农民们沉默了。报上的文章愤愤不平地说，州当局和农业部都觉察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弊病却毫无所为^②。然而，问题还不在于贪污犯是领导当局强加给集体农庄的这一事实，而在于农民们不管感觉如何都无法在选择自己的主席时表达自己的意见。事实上，那些“谁赞成”，“谁反对”和“谁弃权”的选举，完全是一种形

^① 《东方真理报》，1944年5月31日。

^② N. Subach: “Kolkhoznyi ustav-nerushimyi zakon” (苏巴赫:《集体农庄章程是不容破坏的法纪》), 同上, 1944年5月26日。

式。在这一个例子上，当“候选人”起初未能获得必要的多数票时，区的官员就责骂群众，并进行另一次投票。

撤职的程序更简单了。在区党委的局的会议上，党书记要提出动议，要求把他所希望开除的集体农庄主席撤职，甚至根本不征求该集体农庄的意见^①。这种做法，根据所知道的第一手报告以及费因索德教授从斯摩棱斯克的档案中的发现，并不是绝无仅有。这正是苏维埃生活的规则，相反的情况毋宁是例外。区的党和苏维埃官员经常干涉集体农庄事务已成了家常便饭。只有牵涉到农场财产蒙受严重损失的一些极端情况才会受到报刊的批评。《东方真理报》曾把阿克河区的本地第一书记描绘成为一个“不反对侵吞集体农庄的物资供自己使用”的人，并且他的兄弟是个无赖汉。尽管如此，他直到战争结束还留在原来职位上。而且战后还可能呆下去。

另一桩案子是在同一个区里发生了另一名当地的党的官员和几名苏联经理人员侵占了集体农庄的土地，这件事引起了州党委当局的注意。关于机器拖拉机站也有很多类似的滥用职权的情况。拖拉机站站长的命令有时候遭到当地党书记的撤消^②。148
区党委当局在一连串的活动上要依赖机器拖拉机站站长，而这些活动又是和他们的直接任务毫无关联的。职责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在党内事务中是常见的。

有些区的党书记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无法顶住日常工作的压力，实际上对区党委各个部门的工作便失去了控制。这

^① S. Galitskii: "Nepравilnyi podkhod k vospitaniiu kolkhoznykh kadrov" (加立茨基：《对培养集体农庄干部所持不正确的态度》)，《东方真理报》，1944年5月24日。

^② 同上，1944年6月24日，以及萨马尔罕州党委会全体会议，同上，1946年8月17日。例如，在卡拉河区，见同上，1944年12月5日。

样的情况有时导致这样的局面：当地的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自行其是，对党委的官僚主义指示只予以象征性的注意。还有另外的例子，有些党的书记由于不愿意弄脏自己的鞋子就是不到农庄去，他们宁愿坐在城市办公室里舒适的椅子上指导集体农庄的活动^①。

开除不称职的党的官员这类事非常普遍。萨马尔罕州的一次区干部管理人员会议（1945年夏天）透露，在1945年的头五个月中，该州的市一级和区一级的党的官员有百分之二十二遭到撤换。在各别几个区，身居领导职位的党的官僚被革职的达一半以上^②。这样高的撤换率并没有改善党的工作效率。

党对工业的干涉就像它对农业的干涉一样坚定。一位党的指导员在谈到党对工业的指导时这样说：

萨马尔罕的党的官员对工厂经理们进行领导时，其“作风”不幸竟是单用命令来管理，恫吓和干涉其经营活动……

149 区党委书记以开除出党、撤职以及诉诸法律等来恫吓和威胁工厂厂长们^③。

工厂里的党的组织员和党的书记不同，他没有资格去恫吓一名作为党的优秀分子的党员厂长。因而在纳曼干的一个纺织企业联合的工厂中，厂长接连设法赶走了三名党的组织员。市党委也支持厂长的立场^④。

① N. Dubinskii: "Chem zaniat sekretar Raikoma" (杜宾斯基:《区委书记在忙什么》),《东方真理报》,1943年7月25日; M. Dzhaliilova: "Slova i dela Pskentskikh rukovoditelei" (贾利洛娃:《普斯肯茨基的领导人的言行》),同上,1943年7月23日, V Bulungure zanimaiutsia mitingami (《布隆古列那里整天开大会》),同上,1945年4月1日。

② 杜宾斯基的文章,同上,1945年6月20日。

③ 同上,1944年8月6日。

④ 同上,1946年11月23日。

党的官员们经常为自己或他们的亲信索求物资和服务，就像他们经常发出威胁一样。当萨马尔罕的房屋管理当局有款可动用的时候，首先得到服务的是党的官员们，这一来就花光了全部可动用的资金^①。另一个例子是一位萨马尔罕的党的官员向一名工厂厂长写了这样一张奇怪的便条：

关于那位在这里作了具有高度政治思想水平的讲演的〔党的〕讲演员的离去，我们请求你供给他五个罐头食品^②。

党的官员们对于批评是丝毫不能容忍的。所知道的例子有农村通讯员由于写了批评文章激怒了党的书记而遭受迫害等情^③。

在区党委跟前享有好评的党员多半能保证获得良好的职位，不管他条件如何。报刊曾严厉谴责过一些过分的例子，然而这些例子绝不是例外。譬如说，布哈拉有一位穆斯林党员曾在他短促的党龄期间担任过下列职务：市共青团组织书记、民兵政治部副主任、一家沐浴场的主任、一家商业托辣斯的经理、一个机器拖拉机站的副站长、“东方劳工合作联盟”的主任、地区美术部主任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指导员。另一位本地共产党员曾是仓库管理员的助手、营造业委员会主席、一个机器拖拉机站的书记和一所技术学院的院长。这样的“多面手”人物可以随时填补一切可能的空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党委掌握着“负责职位候补人选的特别名单”，称作“区党储备人员^④。”不用说，这些候补人选中有很多是完全不适合他们未来的工作的，只要他们

① 《东方真理报》，1946年9月27日。

② 同上。

③ “Sekretar Raikoma v roli zazhimshchika kritiki”（《区委书记在起压制批评作用》），《真理报》，1946年11月18日。

④ 《东方真理报》，1941年1月4日和29日。

在职就不可能不危害所管理的企业的活动。有例子表明，有些工厂厂长对于薪金和其他基本经济事实一无所知^①。有些本地人厂长不得不请他的俄国人副手替他写即将在下次党的会议上发言的报告。这种局面使得苏维埃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调转率非常高。

管理党内事务是区党委的责任。它负责基层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负责对党员的发展、接纳、教育和开除，也负责一般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然而，区党委书记过分忙于地方上的经济问题，因而无暇去更多地注意这些问题。正如费因索德教授所说的，“区党委会会议时常像是一份农业议事录。”^②因此，许多区党委通常把全部党的工作都交给组织教导部去做。例如，塔什干州有一个区的组织教导部制订出一份“举行选举的计划”。报纸上说这首先应该是区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的责任，而不是组织教导部的责任^③。新党员和转关系的党员的登记工作原是区委书记的任务，可是有时候却随随便便地落到了党的统计小组长身上。有的时候，要求交售粮食，完成计划，赶上生产、播种、收割和修理拖拉机等等的进程的压力，以及其他必要的行政工作，把当地党机构的政治活动减少到几乎完全停止的地步。

即使是在党的最负责任的一级，对政治活动的忽视，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忽视，也是很普遍的。党的书记们，地方上的苏维埃官员们，甚至塔什干的部长们，都曾因漠不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遭到批评^④。这也并不奇怪。一位美国作

① 《东方真理报》，1941年3月14日。

② 费因索德：《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第114—115页。

③ 《东方真理报》，1941年4月11日。

④ 同上，1943年7月31日。

家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解释：

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领导人……不可能对入党的人作细致的核准。结果就成长了一批参差不齐、毫无纪律的自封的共产党员，其中很多人入党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私目标，他们几乎谁都从未听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名字^①。

缺乏够格的党员候补人，这在二十年代就非常严重，到了四十年代初期仍是如此。报纸上对于某些区的党的官员把“不恰当的人”介绍入党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东方真理报》在责备萨马尔罕州的几位书记和其他党的官员漠不关心共产主义理论时抱怨说，“对理论研究的爱好已经消失了。”这也并不是例外。在许多区，党的优秀分子的学历是非常浅的。许多区的官员都是半文盲。在萨马尔罕州，在计划于1946年夏天到农村地区去工作的二十八批教员队伍中，只有七批真正去做了工作，可是成绩很差^②。一位人们时常看见他在各集体农庄中视察播种或收割的进展情况的党书记，很少对他所涉足的农庄中的政治工作给予任何注意。萨马尔罕州的一个边远的区要在报纸出版后十天到十五天才看得到，一年之中没有一名政治教员到过区里来。组织教导部的首脑和其他的区的官员在政治上都一无所知^③。

区的报纸办得很糟，而且由于普遍缺乏兴趣而信心不足。任何可能被认为不符合正统的东西，它都不敢刊登。它总想以

① 埃克尔：《亚洲的变迁》，第53—54页。

② A. Barsukov（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教导部教导员）：“Otvettstvennost za rekomendatsii”（巴苏科夫：《推荐的责任》），载《东方真理报》，1941年1月30日。同上，1946年7月21日；1944年11月15日；1946年8月21日。

③ S. Galitskii：“V storone ot politicheskoi raboty”（加立茨基：《置身于政治工作之外》），同上，1944年10月13日；K. Nurmatov：“V Koshrab-dskom raione zapushchens partinno-massovaia rabota”（努尔马托夫：《科希拉巴茨基区忽视党群工作》），同上，1944年8月13日。

第九章 結論

转载州的报纸上的文章的办法，来确保“安全行事”。剽窃已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以致塔什干的报纸严惩了扎明区的报纸《加拉巴锡农庄报》，原因是它老是以翻印州的报纸《列宁之路报》的内容来填满大部分版面。扎明的党书记们也因对这类事情漠不关心而受到责备。1943年时，在卡希卡河州的农村地区，连拥有大权的各组织教导部的首脑也被派到集体农庄去增加生产。结果是党的会议几乎忘掉了，并且在某些区既没有寻求也没有接受新的党员候补人^①。但是，即使党员们不是那么不关心政治，要对政治事务保持真正的兴趣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地方上的党的机构已变成了某种经济管理人，党的政策和政治事务已成了仅属于比他们高得多的一级上的事情了。

苏联对中亚的政策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民族主义的巴斯马奇起义被有效地扑灭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计划得到了推进。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都已完成。在整个艰苦的年代里，尽管对生活的迅速改造使中亚人民备尝了艰辛，内部局势在三十年代开始以后一直被掌握住了。的确有许多苏维埃的做法遭到了极大的冷淡、漠视甚至恶意对待，但是当地的本地人民从未积极进行反抗，亦未公开向他们提出抗议^②。这一点在战争时

^① 《东方真理报》，1946年10月5日；U. Valiev: “Tam prenebregaiut organizatsionno-partiinnoi rabotoi” (瓦利也夫：《忽视党的组织工作的地方》)，同上，1943年10月10日。

^② 除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帮助德国作战的一小撮土尔克斯坦的变节者。

期特别值得注意，因为那时某些通常掩饰着俄国控制的现实的装潢门面的伎俩不得不抛在一边。

然而，人们应该记得，法国和英国领属的殖民地人民只是在看到了和体会到了他们各自的殖民地主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削弱之后，才显出骚动迹象的。俄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当然不致于反而招致中亚人民去对俄国的统治进行挑战。因此俄国才能在战争时期的种种变动下，推行了它的政策而毫未放弃原有的特权。

一方面主张给予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属地以自决权，而另一方面又剥夺了自己的属地的自决权，这种双重标准的政策是有相当悠久和听起来使人厌倦的根源的。早在1922年，当时在苏维埃政府中赫赫有名的季诺维耶夫声称，虽然俄国已抛弃了剥削附属国的政策，

……我们若没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尔克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作为过去的剥削者而是作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来取得这些为我们所必不可少的产品的^①。

苏维埃的学者们对资产阶级“假学者们试图掩饰和装潢”他们国家的殖民政策的作法，表现了正义的愤怒^②。可是，在中亚也有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简直同它一模一样。首先是俄国军队对当地的军事控制。由于实行了把入伍兵员从他们的家乡轮换到遥远的地区去的制度，有一批来自苏联的欧洲部分或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在中亚服役，而大多数土尔克斯坦的

① Albert Cobba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阿尔伯特·考本:《民族自决》),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pp. 107—108.

② *Voprosy Istorii* (《历史问题》), (1950年12月), 见索罗门·希瓦兹:《审定俄国殖民主义史》(Solomon M. Schwarz: *Revising the History of Russian Colonialism*), *Foreign Affairs*, 第30卷第3期(1952年4月)第488页所引。

穆斯林则在远离本乡的地方服役。土尔克斯坦军区是按照沙皇时代的旧型式建立起来的；俄国警备队驻扎在主要城市，由俄国将军们指挥，即使在斯大林死后还是这样^①。这样的安排具有人们所熟悉的传统“殖民主义”方式的色彩，即把“本地军队”调离本土而把母国的军队或另一个附属国的士兵调来控制这一属地。

“殖民管理”的第二种型式在于这一事实，即苏维埃在中亚的安全机构除去通常的警察职能外，还担负着防止和镇压本地穆斯林人口中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的任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地人才很少被包括在安全网的最高职位之中。在战争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州党委中的特别任务组组长的职务，都是由俄国人和其
155 他欧洲人担任的^②。州的国家安全部门的首脑也是欧洲人。这种型式并不仅限于战争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整个五十年代，所有五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都是俄国人或乌克兰人，没有一个穆斯林^③。

① 《东方真理报》，1955年5月4日和2月23日；1955年5月4日的《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人》(Kommunist Tadzhikistana)和《哈萨克斯坦真理报》(Kazakhstanskaia Pravda)。当时一名俄罗斯人鲁钦斯基(A. Luchinskii)在指挥土尔克斯坦军区。

② 刘金：《苏维埃民族政策和1941—1946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的结构》，附录，表1和表5。

③ 根据蒙藏伊的《对论苏联的伊斯兰教一文的补充》，第19页；顾宾(Gubin)在哈萨克斯坦，沃洛金(Volodin)在吉尔吉斯坦，巴斯柯洛夫(Baskolov)在乌兹别克斯坦，加尔金(Galkin)在土尔克斯坦，维希涅夫斯基(Vishnevskii)在塔吉克斯坦。同是这位顾宾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55年4月12日)，特雷希钦科(Tereshchenko)在吉尔吉斯坦(《苏维埃吉尔吉斯》[Sovetskaia Kirgizia]，1955年4月6日)，别佐夫(Byzov)在乌兹别克斯坦(《东方真理报》，1955年3月29日)，瓦希金(Vaskin)在土尔克斯坦(《土尔克斯坦火星报》，1955年3

第三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共产党机构本身,它是苏维埃政治、行政、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的主宰力量。在领导方面和教义方面从列宁格勒到萨马尔罕是同样的,并且在全苏联都是向同一目标前进的党,是能够为“把列宁格勒工人的理想……教给……乌兹别克小棉农”提供意识形态论证的唯一活动力量。若是揭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壳,那么,俄国同它中亚属地之间的关系,和英国、法国同它过去的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就没什么差别。这就是俄国对当地党组织进行控制的程度、对本地籍的党员和官员表示信任的程度、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在穆斯林官员和俄国官员之间分配重要职位的情况、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型式所以呈现出了一幅如此有趣的景象的原因。

把当地机构中负责的党内职位委派给外来人的型式,自从西乌克兰于1939年为苏联所并吞之后,在西乌克兰也完全得到了运用^①。在这个地区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后,虽然当地人民在国家机构中得到了更显著的地位,前述的措施仍重新得到了运用^②。这种做法同认为本地西乌克兰干部不可靠的想法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像在中亚这样一个自从革命以来就苏维埃化了的、可是其文化却是穆斯林和土耳其型的地区,坚持推 156
行类似型式的做法是颇有启发性的,这种做法使苏联在中亚的政策不舒适地靠近了众所周知的旧殖民政策。

月20日),科切沃依(Kochevoi)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人》,1955年4月1日)。

① John A. Armstrong: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约翰·阿姆斯特朗:《苏维埃官僚主义的优秀分子——乌克兰机构实例研究》),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9, pp. 111—113.

② 同上,第120—121页。

赫鲁晓夫近来转向工业分散化以及贬低斯大林和他的某些措施的行动，被许多本地党的官员误认为是莫斯科在分配职位方面从“殖民地类型”后退的迹象。这种不成熟的期望在科学院于1959年6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讨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各项问题的会议上，遭到了谴责：

民族干部能够而且应该一直在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城市工作，正如俄国人和其他（非本地的）民族的代表能够而且应该在各民族共和国工作一样^①。

苏维埃政权知道在国内外的穆斯林人民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②，因而在对待伊斯兰教时往往踌躇于两种政治措施之间，其中每一种都是以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概念为基础的。

一种办法反映了米尔·赛德·苏丹·奥格鲁（或被称为苏丹-加里也夫）的观点，要求把革命扩展到殖民地国家中去，尤其是到穆斯林中去。按照他的看法，这种对殖民地人民中一切社会阶级有号召力的殖民地革命，将会使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西方走向崩溃^③。方法是在莫斯科向接壤的穆斯林国家进行的宣传运动中利用苏维埃穆斯林，并主张发展中亚苏维埃共和国同它们非共产党邻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① B. G. Gafurov: "Stroitelstvo kommunizma i natsionalnyi vopros" (加弗罗夫:《共产主义建设和民族问题》), *Voprosy stroitelstva kommunizma v SSSR. Materialy nauchoi sessii otdelenii obshchestvennykh nauk Akademii Nauk SSSR*, 莫斯科, 苏联科学院, 1959, pp. 96—97.

② 见查尔斯·霍斯特勒:《土耳其人和苏维埃中亚》(Charles W. Hostler: *The Turks and Soviet Central As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第12卷第3期(1958年夏季), 第268页; 本尼格生:《苏联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第10页及其他各书。

③ Walter Z. Laqueur: "Sultan Galiev's Ghost" (瓦尔特·莱克尔:《苏丹·加里也夫的幽灵》), *The New Leader*, (1958年2月3日), pp. 10—11.

第二种办法反映了约瑟夫·斯大林的观点，要求对亚洲革命问题采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鉴于苏联初期的弱点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感情仍盛行于中亚，这一方法实行的结果是，苏联采取了割断苏联穆斯林同国外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的政策，以把前者隔离起来，免受国外穆斯林、泛土耳其和泛伊朗的影响。这种抛弃了早期革命时代的国际主义措施的政策，其基础是苏联想“在一国”巩固“社会主义”和推行将中亚俄国化的政策的愿望。

苏联对非苏维埃的东方的研究，是密切按照苏联政策的转变型式进行的。瓦尔特·莱克尔将这类研究按年代先后作了如下的区分：

1919年至1928年——苏联的研究中表露了对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友好态度。

1929年至1934年——对同样的运动表露了敌意。

1935年至1937年——重新回到最初的态度。

1938年至1948年——亚洲的事件多半遭到忽视。

1948年至1954年——友好态度慢慢地恢复。

1954年以后——真正恢复了友好态度^①。

1956年，虽然在外交事务方面以苏联的一项对中东穆斯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援助协定为标志，回到了苏丹-加里也夫的立场，而中亚社会中的伊斯兰教根基在苏联的眼光中仍是反共和反俄思想的精神基础。一位苏联的伊斯兰教专家这样说：

^① “The Shifting Line in Soviet Orientology” (同上作者：《苏联东方学的不定路线》，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5 № 2 (1956年3—4月)，p. 20.

……必须更加注意暴露伊斯兰教当前在支持剥削阶级和殖民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揭发被用来为美帝国主义奴役东方各族人民的目标服务的泛伊斯兰、泛土耳其意识形态的反动内容①。

158

另一位伊斯兰教专家克利莫维奇教授在1958年的一次莫斯科广播中指摘穆斯林信仰是“离开苏维埃人民非常遥远的过去的残余”,并攻击穆斯林宗教领袖们即使在中亚苏维埃共和国内也是反动分子和盲目信仰者②。根据一位英国著作家的说法:

大量勤劳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抱殖民偏见的俄国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存在,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本地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确,说苏联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的体验是一项审慎而果断的殖民主义政策所能建立的良好范例也并不过分。可是无论如何那仍是殖民主义,因为那里并无丝毫真正独立的希望,这种希望在亚洲其他部分和在非洲,有的已经得到实现,有的已经动荡了很长时期了。

同一作者还说:

……有某些情况表明,缺乏对现政权的公开反抗,与其说是由于真正满足了,不如说更多地是由于忍受和害怕③。

另一位英国访问者把他的印象总结如下:

最后的决定、最后的权威、最后的权力都在于莫斯科。党的路线来自莫斯科,军队都在莫斯科的指挥下……④

穆斯林土尔克斯坦民族主义(有时被称作地方主义)的固持不变和继续残存,是多数西方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所公认的,这些专家包括本尼格生、蒙戴伊、考拉兹、卡罗、莱克尔、派普斯、加雷

① N. A. Smirnov: *Ocherki po izucheniiu Islama v SSSR* (斯米尔诺夫:《苏联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1954, p. 270.

②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1958年5月23日, 第三版。

③ Liout. Col. Geoffrey Wheeler: "Colonialism and the USSR" (乔弗雷·辉勒中校:《殖民主义和俄国》),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IX (1958), pp. 221—222.

④ Fitzroy Maclean: *Back to Bokhara* (费兹罗伊·麦克利恩:《重返布哈拉》),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9, p. 99.

勒·唐高斯等许多人，只有公开亲共的著作家像杜贝尔和埃格雷托等才否认这一点。最近利用苏维埃中亚充作供来自亚非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的访问者观览的展示品的做法，所收的效果正反兼有。当一位非洲客人在羡慕塔什干新建的工厂时，他的乌兹别克主人不禁引为奇怪，为什么民族主义和自决权在国外是美德而在国内却是罪恶。

苏联出版物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亚的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对那些在这些事情上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作者，表示极大的不悦。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最近写道：

……有学位或无学位的资产阶级雇佣文人，利用了各式各样海伊特之类（土尔克斯坦逃亡作家贝伊米尔扎·海伊特）、派普斯之类（哈佛大学的理查·派普斯）、道格拉斯之类（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和帕克之类（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山大·帕克）所作的捏造，疯狂地毁谤苏联的现实，歪曲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的意义，否定它的成就，企图借此来破坏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民对苏维埃国家的同情^①。

拉希多夫的话对于对共产党在中亚的民族政策的各个方面需作严肃而客观的探索的必要性，又提供了另一个证明。

要助长本地人仍占大多数的中亚的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的自治程度，甚至想达到像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这类卫星国所享有的低微的自治水平，苏联的政策还需要长期的和痛苦的演变和自由化。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改变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斥的。位于俄国西伯利亚、中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中亚，可能很容易地成为这三个世界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原因。防止未来发生这

^① Sh. Rashidov: "Naveki vmeste s russkim narodom" (拉希多夫：《永远和俄国人民在一起》)，Kommunist, № 10 (1959年7月)，pp. 51—52.

样的威胁的责任在于苏俄，它可以或则加速由俄国移民来殖民化当地和继续在文化上同化本地人的过程，或则让中亚的穆斯林人民走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任何种类的民族共产主义，即使在外表上服从莫斯科，无论如何仍不会发展起来，因为这种发展将必然导致比克里姆林目前看来准备给予的程度要大得多的“自由化”。

英文书目

A. 本尼格生和 C. 凯尔克杰(Bennigsen, A. and Quelquejay, C.) 合著:《苏联各穆斯林民族的进化及其语言问题》(The Evolution of the Muslim Nationalities of the USSR and Their Linguistic Problems), 伦敦, 1961年。

卡罗(欧腊夫·寇克帕特里克爵士)(Caroe [Sir Olaf Kirkpatrick]) 著:《苏维埃帝国——中亚的土耳其人和斯大林主义》(Soviet Empire. The Turc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Macmillan & Co.), 1953年。

玛丽·霍兹沃思 (Holdsworth, Mary) 著:《十九世纪的土尔克斯坦》(Turkest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牛津, 中亚研究中心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9年。

W. 卓厄尔森 (Johelson, W.) 著:《亚洲俄罗斯各族人民》(Peoples of Asiatic Russia), 纽约,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28年。

瓦特·考拉兹 (Kolarz, Walter) 著:《俄国及其殖民地》(Russia and Her Colonies), 伦敦, 乔治·菲利浦父子公司 (George Philip & Son, Ltd.), 1952年。

亚历山大·G. 帕克 (Park, Alexander G.) 著:《土尔克斯坦的布尔什维主义, 1917年至1927年》(Bolshevism in Turkestan, 1917—1927),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年。

理查·A. 皮尔斯 (Pierce, Richard A.) 著:《1867年至1917年的俄罗斯中亚: 殖民统治研究》(Russian Central Asia, 1867—1917; a study in colonial rule), 柏克莱,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年。

理查·派普斯 (Pipes, Richard) 著:《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年)》(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

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年。

——: 《苏维埃中亚的穆斯林——趋向和展望》 (Moslems of Soviet Central Asia: Trends and Prospects),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4 年。

凯丝琳·M. 斯达尔 (Stahl, Kathleen M.) 著: 《英国和苏联的殖民体系》 (British and Soviet Colonial Systems), 纽约, 弗雷德里克·A. 普雷格公司 (Frederick A. Praeger), 1951 年。

乔弗雷·辉勒 (Wheeler, Geoffrey) 著: 《苏维埃穆斯林亚洲的种族问题》 (Racial Problems in Soviet Muslim Asia),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年。

斯蒂芬·伍姆 (Wurm, Stefan) 著: 《苏联的土耳其族人民——他们的历史背景和语言, 以及苏维埃语言政策的发展》 (Turkic Peoples of the USSR: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ir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Linguistic Policy), 伦敦, 中亚研究中心和圣安东尼学院 (牛津) 苏维埃事务小组 (Central Asian Research Center and St. Anthony's College [Oxford], Soviet Affairs Group), 1954 年。

瑟奇·赞考夫斯基 (Zenkovsky, Serge) 著: 《俄国的泛土耳其主义和伊斯兰教》 (Pan Turkism and Islam in Russia), 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年。

此外, 还应推荐一本基本的法文书:

芬桑·蒙戴伊 (Monteil, Vincent) 著: 《苏维埃的穆斯林》 (Les musulmans soviétiques), 巴黎, 色依出版社 (Editions du Seuil), 1957 年。

索引

(这里的页码系原书页码, 请按正文页旁所注页码查阅)

- Abdul-Kahar, Mullah (阿布杜尔-卡哈尔, 慕拉), 53, 58
Abdurakhmanov, Y. (阿卜杜拉赫玛诺夫), 103
Afghanistan (阿富汗), 20, 21, 27, 28, 53, 59, 61
Ak Mochet (Perovsk) 阿克·美切特(彼罗夫斯克), 21
Alash-Orda (阿拉希-奥尔达), 37
Alexander I, Tsar (亚历山大一世, 沙皇), 18
Alim Khan, Emir Said (阿利姆·汗, 埃米尔·赛德), 50
Alpamysh 《阿尔帕米希》, 93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美国救济署), 54
Andijan (安集延), 25, Andizhan Case (安集延案件), 139—40
Arifov (阿里福夫), 57
Aulie-Ata (奥利-阿塔), 23
Avesta 《波斯古经》, 90

Babur, Emperor (巴卑尔, 皇帝), 90
Bagirov (巴吉洛夫), 95
Baitursunov, Akhmed (巴杜尔苏诺夫, 阿赫密德), 37
Baku (巴库), 47, 85
Balk (Balsh) (巴尔克[巴尔许]), 15
Baskakov, Mikhail (巴斯克柯夫, 米海依尔), 128
Basmachi revolt (巴斯马奇起义), 39, 51—61, in Eastern Bukhara (and Tajikistan) (在东布哈拉[和塔吉克斯坦]), 53, 55—61, in Fergana (在费尔干纳), 51—54, 59—60, in Khiva (在基发), 60
Bekovich-Cherkassky, Prince (毕柯维奇-契尔卡斯基, 王子), 16
Benoveni, Florio (别涅维尼, 弗洛里奥), 17
Bennigsen, A. (本尼格生), 89, 97, 116, 121, 130, 135, 158
Beria, Lavrenti P. (贝利亚, 拉夫伦提), 95
Bokii, G. I. (博克伊), 45
Bolsheviks during the Revolution (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 35, 36, 41, 42
Bukoev Horde (布凯耶夫帐), 18, 19
Bukhara, description of (布哈拉, 描述), 22—23; first Soviet intervention in (苏维埃第一次干涉), 39—40; People's Republic of (人民共和国), 49, 56 以下; Relations with Tsarist Russia (同沙皇俄国的关系), 15—17, 20, 24; Soviet conquest (苏维埃的征服), 49—50, 53
Bukharin, Nikolai I. (布哈林, 尼古拉), 103
Bukheikhanov, Alikhan (布克伊哈诺夫, 阿利汗), 37
Burns, British agent (本斯, 英国间谍), 20
Butenev, Major (布捷涅夫少校), 21

- Byk, Josif (贝克, 约瑟夫), 48
- Carrere d'Encausse, Helene (加雷勒·唐高斯, 埃莱恩), 133, 135, 158
- Caroe (Sir Olaf Kirkpatrick) (卡罗 [欧陆夫·寇克帕特里克爵士]), 91, 153
- Caspian Sea (里海), 25
- Catherine the Great (叶卡德琳娜二世), 18
- Central Moslem Council (中央穆斯林委员会), 36
- Cheka "契卡", 45
- Chernyaev, General Mikhail G. (契尔涅亚耶夫将军, 米哈伊尔), 23, 24
- Chicherin, Grigorii V. (齐契林, 格里戈利), 56
- Chimkent (奇姆肯特), 23
- Chokay (Chokaev), Mustafa (卓开 [卓开耶夫], 穆斯塔法), 35, 36
- Cholpan (卓尔班), 92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debated in the Party (在党内的辩论), 43—44, 46—47; defended by the Soviets (苏维埃人的辩护), 93—95, 154, 159; in government (政府中), 125, 128—30, 154—55; in industry (工业中), 104—05; in the local and regional apparatus (地方和州的机构中), 105, 109, 132 以下, 144; in the Party apparatus (党的机构中), 120—22, 135, 155; patterns of (类型), 153 以下; prerevolutionary (革命前), 28—32; in the Red Army (红军中), 57, 154; during the Revolution (革命期间), 39, 41
- Commissions for Turkestan affairs (土尔克斯坦事务委员会), 42, 45 以下, 55—56
- Committees of Public Safety (公安委员会), 33
- Confer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stan (土尔克斯坦共产党的会议), 41, 45
-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stan (土尔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 42, 43, 44, 47
- Congresses of Soviets during the Revolution (Tashkent) (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 [塔什干]), 33, 41, 42, 43, 44, 47
- Cossacks (哥萨克人), 17, 18—19, 29, 30, 42
- Cotton policy, opposed (棉花政策, 受到反对), 33—35, 66; prerevolutionary (革命前), 28—29; triumphs (获得胜利), 66;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71
- Cultural policies (文化政策), 85—99; "big brother" policy ("老大哥"政策), 94, 112—14; "Cyrillization" of the alphabet (应用俄文字母), 86—87; "Latinization" of the alphabet (应用拉丁字母), 85—86; linguistic policy (语言政策), 85 以下; opposed (遭到反对), 117—18; Westernization and Russification (西方化和俄国化), 89 以下; 98—99, 114
- Daudov Vasily (达乌多夫, 华西里), 15
- Diushambe (狄乌尚姆贝), 53, 58, 67
- Djulek (居列克), 23
- Djunaid-Khan (朱耐德-可汗), 40,

- 43, 48, 55, 60, 61
- Douglas, William O. (道格拉斯, 威廉), 159
- Dubiicki Jan (杜比茨基, 扬), 96
- Dulatov, Mirzhakup (杜拉托夫, 米尔查克普), 37, 81
- Dutov, A. I. Ataman (杜托夫, 阿特曼), 37
- Dzhambosyn, Abdu Gafar (詹姆波辛, 阿卜都·加法尔), 32
- Dzhangeldyn (詹格尔定), 37
- Dzhany-bek (Basmachi leader) (贾尼-贝克[巴斯马奇领袖]), 54
- Dzhizak (吉扎克), 32, 144
- Dzhumabay (朱马贝), 92
- Economic problems, "blat" (经济问题, "布拉特"), 117—18; cattle breeding (畜牧业), 63—65;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68—64; grain and cotton (粮食与棉花), 65—67; industry (工业), 67—69; land and water reform (土地和水利改革), 63;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农业经营), 108—12, 138—40, 145—48, 150—52; prerevolutionary (革命前), 28—30;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69—73
- Education (教育), 95—97; in Khiva and Bukhara before the Revolution (在革命前的基发和布哈拉), 95; literacy (识字), 96; political (政治的), 137
- Elbek (埃尔贝克), 92
- Eliava, S. Z. (伊利亚瓦), 42, 45
- Enver Pasha, General (恩维尔·帕夏将军), 56, 58
- Fainsod, Merle (费因索德, 茂尔), 136, 138, 147, 150
- Fedotov, Ivan (费多托夫, 伊凡), 15
- Ferdawsi (费道锡), 90
- Fergana (费尔干纳), 52, 53, 54, 59, 60, 65
- Fitrat (费特拉特), 92
- Fort Raim (Aralskoe) (雷姆堡[阿拉斯克]), 21
- Fort Vernoe (Alma-Ata) (凡尔诺堡[阿拉木图]), 22
- Frolov, Commissar (费罗洛夫, 人民委员), 42
- Frunze, Michael V. (弗伦泽, 米哈伊尔), 45, 49, 52
- Galiev, Sultan (Mir Sajit Sultan Oglu) (加里也夫, 苏丹[米尔·萨吉特·苏丹·奥格鲁]), 46, 47, 156, 157
- Gaverdovsky, Lieutenant (加维尔多夫斯基中尉), 20
- Gayet (迦耶), 96
- Geok-Tepe, battle of (盖奥克-特贝之役), 27
- Gochmamed-Khan (果赤马买德汗), 48, 54
- Goloshekin, F. I. (葛洛希契金), 45
- Greater Horde (大孺兹), 20, 21
- Hayit, Baymirza (海伊特, 贝伊米尔扎), 117, 159
- Herzfeld (赫兹费尔德), 37
- Hodja Usman (霍扎, 乌斯曼), 56, 57
- Ibn-Sina (伊本-西那), 90
- Ibragin-bek (Basmachi leader)

- (易卜拉辛-贝克 [巴斯马奇领袖]), 58, 60, 61
- Ikramov, Akmal** (伊克拉莫夫, 阿克马尔), 92, 103
- Imanov, Amangeldy** (伊曼诺夫, 阿曼格尔德), 32, 37
- India** (印度), 18, 22, 27
- Irdjar, battle of** (额尔德加之役), 24
- Irgash-bey (Basmachi leader)** (伊尔加希-贝伊 [巴斯马奇领袖]), 39
- Isayev, U.** (伊萨耶夫), 103
- Isfendiar Khan** (伊斯芬狄亚可汗), 40
- Ishimov, Kaip Gallia** (伊希莫夫, 凯普·加利亚), 19
- Islam, attacked** (伊斯兰教, 遭攻击), 90—91, 157—58; **religious habits** (宗教习惯); 106, 115—16
- Israil (Basmachi leader)** (伊斯雷尔 [巴斯马奇领袖]), 59
- Ivan the Terrible** (伊凡雷帝), 15
- Kabul** (喀布尔), 27
- Kadyri** (卡地利), 92
- Kaganovich, Lazar M.** (卡冈诺维奇, 拉扎尔), 47
- Kaledin, A. M.** (加列丁), 38
- Kalinin Mikhail** (加里宁, 米哈依尔), 113
- Kamenev, Sergei S.** (卡缅涅夫, 塞尔盖), 55, 58, 60
- Karimov, Abdulla** (卡立莫夫, 阿卜杜拉), 103
- Katta-Kurgan** (卡塔-库尔干), 24, 25, 144
- Kaufman, General A. A.** (考夫曼将军), 24, 25, 27
- Kazakhstan, colonization** (哈萨克斯坦, 殖民化), 75 以下; **conquest of** (征服), 17—20, 21—22; **relations with tsarist Russia** (同沙皇俄国的关系), 16—20; **revolts in** (暴动), 19, 22, 32; **"surplus lands"** ("剩余土地"), 30—31; **"virgin lands"** ("处女地"), 75, 78
- Kazakov** (卡扎柯夫), 43, 44
- Kazembek, Mohammed** (卡赞别克, 穆罕默德), 43
- Kenesary** (盖涅萨勒), 19—20
- Khal-Hodja (Basmachi leader)** (哈尔-霍佳 [巴斯马奇领袖]), 52, 55
- Khayyam, Omar** (喀雅姆, 欧玛), 90
- Khiva, conquered** (基发, 被征服), 25; **description** (描绘), 22—23, 40; **People's Republic of Khorezm** (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 48—49, 53—55; **relations with tsarist Russia** (同沙皇俄国的关系), 15—17, 20—21;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conquest** (苏维埃的干涉和征服), 42—43, 48—49, 53, 54—55
- Khodjent** (霍德金特), 24
- Khodzhaev, Faizulla** (霍德查耶夫, 费祖拉), 57, 59, 66, 92, 103
- Khodzhaev, Tursun** (霍德查耶夫, 图尔宋), 43, 45
- Khokhlov, Ivan** (霍赫洛夫, 伊凡), 15
- Khorezm, People's Republic of** (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 见“基发”条
- Khristoforov, Commissar** (赫里斯托富洛夫, 人民委员), 43
- Khrushchev, N.** (赫鲁晓夫), 78, 156
- Khudoyar Khan** (胡多雅尔可汗), 25
- Kirgizstan** (吉尔吉斯斯坦), 67, 75,

- 121; pacified (被平服), 25
- Kiselev, A. S. (基塞列夫), 42
- Klimovich, L. L. (克里莫维奇)
158
- Kobozev, P. A. (科波捷夫), 41, 42
- Kokand, conquered (浩罕, 被征服),
23—24; description of (描绘),
23;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s-
tablished (成立民族主义政府), 36—
37; relations with tsarist Russia
(同沙皇俄国的关系), 21—22; sup-
pression by the Soviets (被苏维
埃人镇压), 38—39
- Kolarz, Walter (考拉兹, 瓦特),
94, 158
- Kolohak, Admiral A. V. (考尔察
克, 海军上将), 44
- Kolesov, Commissar (柯列索夫, 人
民委员), 39—40, 43, 49
- Kombedy ("康别地"), 44
- Korovnichenko, General (克罗夫尼
钦科将军), 35
- Krasnovodsk (克拉斯诺伏斯克), 25
- Kuibyshev, Valerian V. (古比雪夫,
瓦勒里安), 45, 49—50, 55, 56
- Kulambetov, U. (库兰贝托夫), 103
- Kuram-bek (Basmachi leader) (库
兰姆-贝克 [巴斯马奇领袖]), 61
- Kuropatkin, General A. N. (库罗
帕特金将军), 32, 33
- Kur-Shirmat (Basmachi leader)
(库尔-希尔马特 [巴斯马奇领袖]),
53, 54, 55, 59
- Kzyl-Arvat (克孜尔-阿尔瓦特), 25,
27
- Laqueur, Walter Z. (莱克尔, 瓦尔
特), 122, 157, 158
- Lenin, V. I. (列宁), 45, 47, 65
- Leninsky Put «列宁之路报», 152
- Lesser Horde (小嚮兹), 17, 18, 19
- Madamin-bek (Basmachi leader)
(马达明-贝克 [巴斯马奇领袖]), 52,
53
- Makhmudov, Nasyr (马赫慕多夫, 纳
色尔), 133
- Makhram, battle of (麦克拉姆之役),
25
- Maksum, Faizulla (Basmachi
leader) (马克苏姆, 费祖拉 [巴斯
马奇领袖]), 58
- Maksum, Nasrattulah (马克苏姆,
纳斯拉杜拉), 81, 103
- Malenkii, Semen (马林基, 塞门),
16
- Margelan (马尔格兰), 25, 52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93, 151
- Mary Oasis (玛丽绿洲), 27, 42
- Mensheviks during the Revolution
(革命时期的孟什维克), 33, 36
- Middle Horde (中嚮兹), 17, 18, 21,
22
- Mirza-Akhmedov, Mansur (米尔
扎-阿赫密多夫, 曼苏尔), 79
- Manas «马那斯», 93
- Monstrov, Konstantin (蒙斯特洛
夫, 康斯坦丁), 52, 53
- Monteil, Vincent (蒙戴伊, 芬桑),
135, 158
- Moscow (莫斯科), 44, 45, 46, 47, 70
- Moslem Congresses (穆斯林代表大
会), 33—37
- Moslem nationalism, nationalist
practices (穆斯林民族主义, 民族主
义行为), 106—07, 116—18; social

- and religious habits (社会和宗教习俗), 106, 115—116; Soviet antireligious policy (苏联的反宗教政策), 90—91, 157—58; tolerated (容忍), 107; women (妇女), 97—98, 106, 115—116
- Muetdin (Basmachi leader) (牟埃特丁〔巴斯马奇领袖〕), 59
- Namangan (纳曼干), 25, 149
- Nasreddin Khan (纳司雷丁可汗), 25
- National Communism (民族共产主义), 50, 104, 105; in Bukhara (在布哈拉), 56—58;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在集体化时期), 64—65; feared (被惧怕), 156 以下; in Khiva (在基发), 48—49, 54—55; possibility of (可能性), 159—60; purged (遭清洗), 102—04; in Tashkent (在塔什干), 47; utilized (被利用), 113
- Nechkina (尼契金娜), 93
- Negri (奈格利), 20
- Nevai, Ali Sher (纳沃伊, 阿里·舍), 90
-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新经济政策), 54, 59, 63
- Niaz, Shah (尼亚兹王), 16
- Nikiforov Captain (尼基富罗夫上尉), 21
- Nikitin, Afanasii (尼基丁, 阿法那西), 16
- Nurmat-Ali (Basmachi leader) (努尔马特-阿利〔巴斯马奇领袖〕), 55
- Obruchev, General V. A. (奥布鲁契夫将军), 21
- Oglu, Mir Said Sultan: (奥格鲁, 米尔·赛德·苏丹); 见“加里也夫, 苏丹”条
- Ordjonikidze, Grigorii K. (奥尔忠尼启则, 格里戈利), 58
- Orenburg (奥伦堡), 17, 20, 42
- Orlov, General Vasily (奥尔洛夫将军, 华西里), 18
-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 123
- Osh (奥希), 52
- Osipov, Commissar (奥西波夫, 人民委员), 42
- Ospan, Kasym (奥斯潘, 喀西姆), 32
- Palen, Count K. K. (帕伦伯爵), 31
- Park, Alexander G. (帕克, 亚历山大), 159
- Paul I, Tsar (保罗一世, 沙皇), 18
- Pazukhin brothers (帕祖辛兄弟), 15
- Perfilev, Commissar (帕费列夫, 人民委员), 39
- Perovsky, General V. A. (彼罗夫斯基将军), 20
- Peters (Latvian Communist) (彼得斯〔拉脱维亚共产党人〕), 47, 48
-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16, 17
- Pipes, Richard E. (派普斯, 理查), 98, 158, 159
- Pishpek (Frunze) (匹希别克〔弗伦泽〕), 23
- Pokrovsky, M. N. (波克罗夫斯基), 87, 92, 95
-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20
- Pravda «真理报», 113
- Pravda Vostoka «东方真理报», 84, 105, 110, 111, 138, 140, 146, 147,

Purges of the 1930's (三十年代清洗), 103—04

Rakhimbabaev, T. R. (腊克姆巴巴也夫), 47, 103

Rakhman-Datkho (Basmachi leader) (拉赫曼-达特霍 [巴斯马奇领袖]), 55, 61

Rashidov (拉希多夫), 159

Revolution of 1917, anti-Soviet revolts (1917年革命, 反苏暴动), 41—42; February (二月), 33—35; internal difficulties (内部困难), 40—41, 43—47; October (十月), 36—37

Romanov, Michael Fedorovich, Tsar (罗曼诺夫, 米海依尔·费多罗维奇, 沙皇), 15

Rudzutak, Y. E. (茹德祖塔克), 45, 60

Russian colonization, extent (俄国殖民化, 范围), 78—81; importance (重要性), 81—84; justified by the Soviets (苏维埃人的辩护), 92—95; opposed (被反对), 81; prerevolutionary (革命前), 30—31, 75; Soviet (苏维埃), 75—83

Ryskulov, T. R. (雷斯库洛夫), 43, 46—47, 92, 103

Safarov, Georgii I. (沙法罗夫, 乔治), 33, 47, 55

Samarkand, (萨马尔罕), 15, 24, 25, 28, 32, 38, 69—70, 71, 77, 104—05, 111, 133, 142, 144, 149

Sasvokasov (萨斯沃卡索夫), 81

Scott, Derek R. (司谷特, 德里

克), 133

Segisbaev, Soltan (塞吉斯巴耶夫, 索尔坦), 103

Seid-Adulla, Khan (赛德-阿杜拉, 可汗), 48

Selim Pasha (塞林·帕夏), 58—59

Semirechye (谢米列奇耶), 24, 30, 31, 41, 42, 75

Soton-Watson, Hugh (西顿·华生, 休), 133

Shakirov (夏基罗夫), 77

Shamil (夏密尔), 93, 95

Shotemar (萧特玛), 103

Siberia (西伯利亚), 15, 17, 20, 75, 77, 159

Skobelev, General M. D. (斯科别列夫将军), 25, 27

Social Revolutionaries (SR's) (社会革命党人), 33, 36, 41, 42

Sokolnikov, G. Y. (索科尔尼可夫), 47

"Southeastern Union of Cossacks, Mountain Caucasians and Peoples of the Steppes" "哥萨克人、山地高加索人和草原人民的东南联盟", 38

Speransky, M. M. (斯别让斯基), 18

Stalin, I. V. (斯大林), 56, 92, 101, 112, 119, 156

Stevenson, Adlai (史蒂文森, 艾德莱), 77, 79

Stoletov, General (斯托里托夫将军), 27

Stolypin, Peter A. (斯托雷平, 彼得), 31, 75

Sultanbekov (苏丹贝柯夫), 81

Sultanmuradov (苏丹穆拉多夫), 48

Syr-Darya (锡尔河), 24, 28, 31

-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59, 60—61, 67, 75, 94, 97, 121
- Tamyshbaev (塔米希巴耶夫), 36
- Tashkent (塔什干), 23, 24, 25, 33, 35, 36, 38, 39, 41, 43, 44, 45, 48, 57, 68, 70—71, 75, 76, 84, 97, 108, 143, 144, 151
- Tadjen Oasis (捷真绿洲), 27
- Tokmak (托克马克), 23
- Tomsky, Mikhail P. (汤姆斯基, 米哈依尔), 48
- Torabekov (陶拉毕可夫), 103
- Towster, Julian (陶斯特, 裘连), 123
- Tubert, Paul (杜贝尔, 保罗), 97, 158
- Turgai (土耳其盖), 32
- Turkestan, conquest of (土尔克斯坦, 征服), 22—28; conquest justified by the Soviets (苏维埃人替征服辩护), 92—95; pacification (平服), 25—28; Russian frictions with Great Britain (俄国同英国的摩擦), 20—21, 22, 27—28; suppression of revolts (镇压暴动), 25, 32, 37
- Turkestan City (土尔克斯坦城), 23
- Turkey (土耳其), 56
- Turkmenistan (Turkmenia) (土库曼尼亚), 41, 44, 68, 75, 80, 121; conquest of (征服), 25—28; revolt in (暴动), 41—42
- Tynystan (丁尼斯坦), 92
- Udarnik (sovkhos) (乌达尔尼克[国营农场]), 109
- Ukraine (乌克兰), 154, 155
- Ulema “贤哲团”, 33, 36
- Union of Toiling Moslems (劳苦穆斯林联合会), 33
- Ura Tiube (乌拉·秋贝), 24
- Uspensky, G. I. (乌斯宾斯基), 43
-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60, 64, 66, 67, 69—73, 75, 79, 81, 83, 84, 94, 95, 97, 107—08, 109, 119 以下, 154—55
- Validov, Zeki (瓦利道夫, 泽克), 54, 56
- Victoria, Queen (维多利亚女王), 27
- Vitkevich (Polish officer) (维特凯维奇 [波兰军官]), 20
- Wheeler, Geoffrey E. (辉勒, 乔弗雷), 96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31
- World War II, demobiliz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复员), 108; economic effort (经济努力), 69—73; evacuation (撤退), 69; grain and cotton policy (粮棉政策), 71; inflation (通货膨胀), 72—73; labor units (劳动单位), 107, 117; refugees (难民), 69—72
- Yany-Kurgan (亚内-库尔干), 23, 24
- Young Bukharans (布哈拉青年组织), 49, 56
- Young Communist League (Komsomol) (共青团), 66, 115, 131, 149, 150
- Young Khivans (基发青年组织),

48, 55—56
Yusupov, Palvanniaz (尤索波夫,
帕尔伐尼亚兹), 48
Zaamin (扎明), 105, 109, 144, 152

Zhdanov, A. A. (日丹诺夫), 93
Zinoviev, G. V. (季诺维耶夫), 54
Zinoviev, Grigorii E. (季诺维耶夫,
格里戈利), 154